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8年第2期 总第22期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22 期)

顾问: 叶兴国 李邦君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谢丹迎 王群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谢 蓉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08 年第一季度国际经济观察.....	1
农产品出口如何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9
02-03 月权威视点.....	13

二、金融动态

通胀难题席卷全球.....	17
华尔街病人.....	20
IMF 预计信贷危机造成近万亿美元亏损.....	25
谁在增持美国资产?	26
美元与信贷危机.....	29
中国与核心通货膨胀.....	30
重现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31

三、商务英语动态

第七届泛亚语言与语言学研讨会征稿通知.....	33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nd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33
Tagging the Bard: Evaluating the Accuracy of a Modern POS Tagger on Early Modern English Corpora.....	38

四、法学动态

信息安全条例列入国务院今年立法计划.....	50
我国证券服务业开放的路径选择.....	52
大学生要学会追根究底.....	66

五、高教动态

紧密结合高校实际 找准定位 突出重点 做好直属高校巡视工作——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取得成效.....	67
高校改革应以强化“学术权力”为核心.....	70
大学创新的前提与驱动力.....	71
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	75
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精英人才培养规格研究.....	77
湖南大学以生涯教育发展为主线 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80
论高校创新型辅导员队伍建设机制的构建.....	81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命题——哈佛大学的经验及其启示.....	84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本期要目

- 08 年第一季度国际经济观察
- 农产品出口如何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 02-03 月权威视点

2008 年 4 月

第 2 期[总第二十二期]

2008 年第一季度国际经济观察

2008 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美国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结束了 6 年的扩张期，住房市场和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引发消费者与投资者信心遭遇重创，消费与投资出现滑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它发达经济体中，西欧的经济增长也在减速，日本经济复苏近于停滞。新兴经济体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小，但经济活动也出现了放缓。因此，一季度，全球经济出现减速。在此形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此前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认为 2008 年的增长为 3.7%，低于去年 4.9% 的增速，全球性衰退的概率也因此提高到 25%。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

1. 美国经济

2007 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到了衰退的边缘。美国政府虽采取了降息和减税等一系列刺激措施，但经济并未起色。

消费方面，根据现有数据来看，美国居民消费尚未出现大幅的下滑，但消费者信心已经跌至冰点，3 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2 月的 76.4 降低至 64.5，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73.3，是 2003 年伊战以来最低水平。根据以往走势，消费者信心在多数情况下存在一定的领先性，因此，消费领域的大规模修正将可能在若干个月之后发生。

就业市场继续恶化，增添了消费好转的压力。3 月，美国失业率从 2 月份的 4.8% 上升到 5.1%，为 2005 年 9 月份以来最高点，也是美国经济自 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就业机会连续 3 个月缩水的局面。失业率上升是每一轮经济下滑周期出现时的典型现象。

贸易方面，逆差超出预期。2 月贸易逆差意外扩大至 623.2 亿美元，预估为逆差 575 亿，而令人失望的是，除去汽油的逆差也有所扩大，从 236 亿扩大至 298 亿，是近几个月来首次恶化。

投资方面，住房市场调整仍在持续，市场降温仍未触底，企业投资信心受挫。2 月新屋销售量下跌 1.8%，连续 4 个月走低，为 1995 年来最低水平，而标准普尔公司 25 日发布的标普/席勒住房价格指数显示，1 月份美国 10 个主要大城市房价比去年同期下降 11.4%，为历史最大跌幅。受此影响，反映未来新房建筑走势的新房建筑许可证发放量，2 月份比前一个月下降 7.8%，美国新房开工量比前一个月下降 0.6%。在信贷紧缩、市场低迷的背景下，美国独





立企业联盟(NFIB)信心指数降至89.6,创下1980年第2季以来的最低水平,2月为92.9;而未来6个月内准备扩大新设备与工厂投资的企业比例下滑1个百分点,达到25%的水平。

出于对上述数据的悲观预期,白宫发言人弗拉托4月9日表示,一季度美国经济料将零增长,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表现,成为促进美国政府快速推出刺激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

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同样,美联储的各项政策也存在滞后性。正是这种滞后性,为今年的市场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展望2008年,IMF下调了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1.5%下调至0.5%。

图1 2007年之前美国经济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 Bloomberg

2. 欧洲经济

(1) 欧元区整体一季度经济概况

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有所恶化。欧盟委员会3月2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正在增加,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大幅放缓至1.8%,远低于2006年的2.7%和2007年的2.6%。但得益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势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预测,第一季度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仍将微增0.5%。

受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影响,目前欧元区整个金融市场都陷入了信贷紧缩的动荡状态,投资者信心遭受重挫,3月份,欧元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由2月的52.3降至51.6;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投资难有起色。

消费者信心降至长期平均水平以下,消费者与企业信心从2月份的100.2,滑落至3月的99.6,对另一大引擎——个人消费起到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数据显示,2月份欧元区零售销售月率下滑0.5%,创下去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

受次贷危机、美国经济减速和欧元升值的影响,欧元区出口遭受重创,1月份欧元区15国对外贸易逆差达107亿欧元,远高于2007年1月的逆差73亿欧元和2007年12月的41亿欧元,贸易逆差再创欧元诞生以来新高。出口锐减成为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





(2) 欧洲主要国家一季度经济概况

德国：经济走强，GDP有望季增0.6%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德银行发放贷款时审批手续更为严格，德部分企业申请信贷难度加大，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影响。但经过多年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德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已有明显改善”（德国联邦经济部长格罗斯），由于建筑业和生产活动增强，德国一季度经济反而乐观。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吕鲁普(Bert Ruerup)表示，受建筑业和生产活动增强，德国第一季度实际GDP有望走强，第一季度GDP季增率将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0.3%，而可能达到0.6%。未来，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方针依然是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增强德国企业抵御全球经济风险的能力，同时继续扩大就业，保障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其重新就业或转岗的能力，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争取实现国家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

英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

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增长之后，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英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不确定时期。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物价上涨，2月英国通胀水平是2.5%，为9个月来最高。房地产市场继续动荡，3月份，英国3月份房价下跌了2.5%，比2月份下降0.6%，为连续第五个月下滑，也是1992年来之最。与此同时，信贷继续萎缩，3月27日，英国三大抵押贷款供应商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和劳埃德信托储蓄银行宣布收缩贷款发放规模，提高贷款利率和相关费用。这一决定使低迷的英国房地产市场更为雪上加霜。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动荡、信贷萎缩使得家庭消费受到很大影响，2月份英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新低，由1月的81降至78新低，去年同月指数为85。Nationwide调查指出，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的主因是消费者感受目前经济及就业情况的不景气。2月份就业指数由1月的83降至76。

因英国GDP的2/3都来自消费，内需疲软，英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仅0.5%。英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预测，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1%下滑到1.6%，为1992年以来的最差表现。

法国：经济增长下滑

一季度，受欧元强势、油价高企以及欧美经济增长减速等因素影响，法国外贸并不乐观，1月份对外贸易逆差达到33.91亿欧元，高于去年的月平均水平。外需下降的同时，法国消费者已经开始控制对制造业商品的支出，法国国家统计局预计，受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推动，法国3月通胀将达到3%，触及1991年来最高点；由于通胀上升侵蚀家庭购买力，08年初消费者信心已经降至20年低点。同时，法国就业创造疲弱，预计法国失业率仍将稳定在7.5%左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需求。两大需求下降共同造成一季度法国经济出现下滑。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将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由0.5%下调至0.4%，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预期由0.4%下调至0.3%，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为1.4%，低于去年底预期1.7%。

3. 日本经济

尽管受到亚洲整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提振，但日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总体趋势仍较为疲软。受企业设备投资、工矿生产下降等因素影响，日本政府预计，一季度日本经济复苏势头处于停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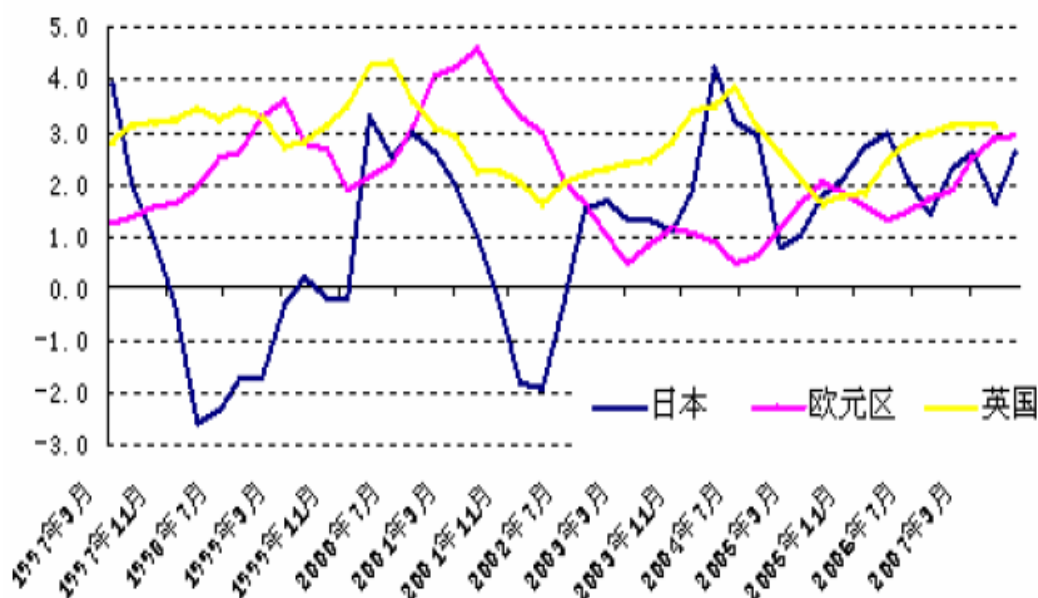


内需方面,消费预期急剧下降。2月份消费者信心的消费者态度指数为36.1,比上月下降1.4个点,为2003年3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内阁府认为,日本股市下跌等因素造成消费预期下降,是导致消费者心理持续恶化的主要因素。反映企业投资预期的企业信心指数也出现了大幅下滑,一季度,日本财务省和内阁府调查数据表明,无论是大企业、主力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体现经济信心的指数(BSI)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均已降至2004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其中,大企业信心指数从去年第四季度的正0.5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负9.3;中型企业信心指数从去年四季度的负2.6变成今年一季度的负14.1;小企业信心指数更是从去年四季度的负18.7降至今年一季度的负30.4。消费者与投资者预期下降,表明一季度日本经济有所恶化。

外需方面,2月份,日本贸易盈余小幅增加为9700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微增0.9%。由于美国经济减速,日本2月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为699亿日元,降幅为13.3%,而日本与亚洲其它国家的贸易盈余达到9222亿日元,增幅为104.8%,为连续第七个月增加。

近期日本经济仍面临以下问题: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可能使贸易收支恶化,企业也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不敢妄加扩大投资,甚至有收缩的可能,劳动力收入增长也受限,消费面临下滑风险。OECD预计日本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0.3%,第二季度为0.2%。

图2 2007年之前日本、英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情况



4. 新兴经济体

尽管美国经济衰退会对新型经济体的出口产生影响,但世行认为,鉴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十分稳健、银行系统和财政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贸易和资金流动多元化,这一影响不会对其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四国仍是稳定世界经济的安全岛。对于新型经济体而言,普遍经历了此前数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剩产能已充分利用,资源供给压力陡增,在目前全球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的背景下,通胀风险加剧,应对通胀可能比应对美国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更具挑战性。

(1) 俄罗斯





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但俄经济增长比较乐观,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石油出口的高价位,俄经济一季度状况良好。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指出,俄罗斯能够避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其08年经济增长预期由6.7%上调至7.1%。

(2) 印度

消费者需求趋缓,通胀上升以及贸易逆差扩大等因素的存在,一季度,亚行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乐观程度有所下降。

据印最新统计数据,1月份印度工业生产的整体增长幅度由去年同期的11.6%降低到5.3%,其中制造业增幅从12.3%下降到5.9%,耐用消费品生产增幅由5.3%转为负增长3.1%,资本货物增幅则由16.3%下降到2.1%。这一数据使得人们对印度的经济前景普遍产生了更多的负面预期。印度政府在2月28日首次承认,印度经济正在降温,并且未来数年在实现增长目标方面将面临重大挑战,在截至3月31日的财年中,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预计经济将实现8.7%的增长,低于上年的9.6%。

(3) 巴西

受美国经济减速以及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不断升值的影响,巴西贸易顺差在一季度出现了下滑,一季度,巴西顺差28.36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的87.21亿美元下降67.5%,为2004年来同期新低。但贷款充足、工资上涨、消费者和企业界信心增强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增加为巴西一季度工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月份,巴西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9.7%,连续第21个月保持增长。头两个月,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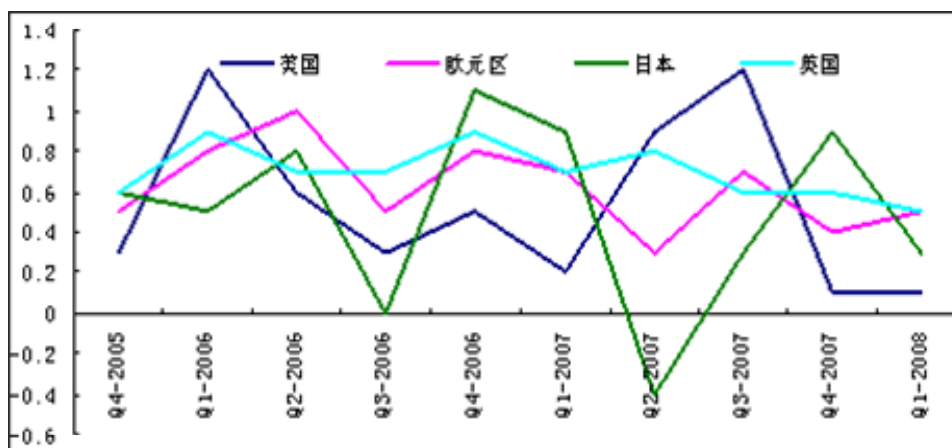
展望2008年,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预测,今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4.2%至5.2%,略低于2007年5.4%。

表1 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及预测表 数据来源:国研网整理

国别	2005	2006	2007	07年1季度	08年1季度 E(OECD)	2008年E (IMF)
美国	3.1	2.9	2.2	0.6	0.1	0.5(1.5[1])
欧元区	1.6	2.7	2.7	3.1	0.5	1.4(1.6)
日本	1.9	2.4	2.2	3	0.3	1.4(1.5)
英国	1.8	2.8	3.1	0.7	0.5[2]	1.6(—)
俄罗斯	6.4	6.7	8.1	3.4	4.8[3]	6.8(6.5)
印度	9	9.2	9.6	9.3	—	7.9(8.4)
巴西	2.3	3.7	5.3	4.3	—	4.8(4.0)

图3 近期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及预测





数据来源：2007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 OECD，2008年一季度数据来源于 IMF

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通胀与利率政策

(1) 欧元区：欧洲央行维持 4% 的利率不变

在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下，3 月份，欧元区 CPI 较上年同期上升 3.5%，高于 2 月份 3.3% 和 1 月份 3.2% 的升幅，为 199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连续第七个月超过央行 2% 的目标上限。

通胀预期上扬，经济增长前景转差，成为欧洲央行面临的难题。一方面，作为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正濒临衰退，且同时，美国连续降息，欧元区与美国之间的息差不断扩大，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已达 17% 之多，打击了欧元区的出口，给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蒙上了阴影；另一方面，油价、食品价格等居高不下，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使得欧元区仍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然而，欧洲央行仍坚持将控制通胀作为首要政策目标，保持其对通胀目标的强硬态度，欧洲央行再次维持利率 4.0% 的 6 年峰不变。

美欧经济面临的不同问题及货币政策“着力点”的不同，也使全球经济的变化更趋复杂。

(2) 美国：三次降息

由于美国经济的减速，美国消费者物价在 2 月持平，预计 3 月出现上涨，多数分析师对核心 CPI 的预估值从上涨 0.1% 到上涨 0.5% 不等，涨幅不足以敲响新的通胀警钟。通胀风险远小于衰退风险。

受制于经济活动的恶化及消费者开支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为提振经济，缓解流动性不足，一季度，美联储分别于 1 月 22 日、1 月 31 日和 3 月 18 日分别降息 75、50 和 75 个基点，至此，联邦基准利率由 4.25% 降至 2.25%，这是自 2004 年 12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降息 75 个基点，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以来的最高降幅。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大幅度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在未来 3-6 个月内显现。

(3) 日本：继续维持现有利率 0.5% 不变

2 月份，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 1.0%，创下 1998 年 3 月份上升 1.8% 以来的最高升幅。该数据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 0.9%。这也是日本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第五个月出现上升。东京地区 3 月份核心 CPI 较上年同期上升 0.6%。这一结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0.5%，为连续第五个月上升。





日本央行目前也同样陷入经济增长放缓与消费者物价水平上扬的两难境地。面对经济由温和增长转变为下滑,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态度更加开放,即不排除未来降息的可能。在利率问题上,新任央行行长白川方明表示,日本经济中生产、收入与消费支出的正向循环仍然存在,但有所减弱,经济成长预计将暂时放缓,在美国经济不确定性非常高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不适宜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抱有预设立场。央行将依据对经济前景、物价与风险走向,来制定货币政策。据此,日央行继续维持现有利率 0.5% 不变。这也是日本央行连续第 5 个月一致投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目前日本的利率水平为七大工业国中的最低水平。

(4) 英国: 英国央行减息 25 个基点, 降为 5.25%

一季度,英国经济数据已显示通胀显著上涨,凸现经济面临的更强通胀压力。2 月英国工业出厂价格大幅攀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升至 2.5%,远高于央行的 2% 目标。

通胀高企的同时,英国经济同样面临着经济放缓的风险。英国央行的政策需要基于以下两个风险做出平衡:从上行风险来看,08 年高于目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引发市场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缺乏闲置产能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升幅可能持续高于目标水平,若单纯应对上行风险央行需要采取加息政策;而从下行风险来看,金融市场的动荡局面可能导致经济增速减缓,从而可能足以将通货膨胀率推低至央行目标水平之下,若单纯应对下行风险央行需要采取减息政策。目前,这两种风险均有所增大,利率政策必须在这两种风险之中做出抉择,这加剧了英国央行进退两难的处境。

然而,由于英国借贷成本位于 6 年高点,在英国房价出现连续下跌、房地产市场信心大幅下挫的背景下,出于避险的需要,贷款机构向企业及家庭发送的贷款一季度明显减少,信贷市场状况恶化。出于对英国经济前景放缓的担忧,再加上服务业活动疲软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大幅上扬,以及经济活动前景恶化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并为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提供一定空间,综合因素的结果,最终促使英国央行倾向于减息。2 月,英国央行降息 25 个基点,利率从 5.50% 下调至 5.25%,希望藉此缓解信贷市场危机对英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5) 印度: 维持基准的回购利率 7.75% 不变

印度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22 日的一周里,印度通货膨胀率升至 7%,远超过市场此前估计的 6.25%,创 3 年多来的新高。同时,3 月印度批发价格通胀率达到了 15 年来的新高——6.68%。印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食用油、粮食、蔬果和部分工业品等价格大幅上涨。印度的宏观经济情形类似于中国,面临着物价走高和经济活动可能疲软的前景,采取数量型的政策工具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可能采取的措施。因此,一季度,印度维持基准的回购利率 7.75% 不变。

(6) 巴西: 第五次维持基准利在 11.25% 不变

一季度,巴西综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1.52%,比 2007 年同期高出 0.26 个百分点。其中,3 月份,巴西全国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0.48%,略低于一月份的 0.54% 和二月份的 0.49%。为遏制物价上涨加快的势头,实现把全年通胀率控制在 4.5% 之内的目标,巴西央行可能在四月份决定加息,将基准利率从目前的 11.25% 提高至 11.50%。

(7) 俄罗斯: 提高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

一季度,俄罗斯通胀率为 4.8%,3 月的通胀率为 1.2%,上年同期分别为 3.4% 和 0.6%。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的主要原因。俄并未面临类似于中国与印度的难题,





因此在货币政策上也可以更为从容。为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俄从2月4号起将再贷款利率从10%提高到10.25%,短期贷款利率也随之上调0.25个百分点。

三、各国应对通胀与衰退的最新举措

美国: 财政退税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鉴于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各项数据指标的不断恶化,为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分别于1月29日和2月8日,通过1450亿和1610亿美元的退税刺激经济方案。振兴经济方案内容包括个人与家庭退税以及企业减税等措施。对于布什的经济刺激方案,市场人士多持审慎欢迎态度,认为该方案有利于促进消费,并刺激美国经济恢复稳定增长。但一些经济学家也担心,由于次贷危机仍在恶化,加上刺激方案还存在变数且要至少1个月才能实施,方案届时能起的积极作用可能有限。

为应对次贷危机以来新的金融形势、改革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财政部于3月31日向国会提交一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内容将涉及大银行、投资公司、地方保险代理以及抵押贷款经纪人等广泛范围。这项改革计划将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俄罗斯: 通过干预手段应对高通胀

为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俄政府两次调高小麦出口关税,将其从零关税升至40%,并将高税率有效期延长至2008年7月初。此外,俄政府还将奶制品、蔬菜和所有食用油进口关税由15%降为5%,有效期为6个月。为增加和保证市场供应,政府还有限度地开放了部分商品进口。

对食品实行了有效的价格干预。将动用150万吨小麦,择机投放市场以平抑价格;支持国内30家大型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签署食品价格冻结协议。

对低收入弱势群体发放了食品补贴,并提高养老金标准。与此同时,俄政府还加大了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先后对40多家“蓄意串通涨价”的企业处以数十万至数千万卢布的“不诚信”罚款,并对部分企业提出法律诉讼。

印度: 下调关税与行政干预

禁止部分农产品出口,同时下调食用油进口关税,并采取冻结关税银行存款制度来减少水泥和铁矿石的出口。政府将毛棕榈油的进口关税从目前的45%下调到了20%。精炼棕榈油的进口关税从52.5%下调到了27.5%。政府还将毛菜籽油的进口关税从75%下调到了20%,将精炼菜籽油的进口关税从75%下调到了27.5%;废除了成品米和半成品米的进口关税;禁止出口任何的食用油,与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一道积极确保国内供应稳定。

巴西: 促进竞争与工资调整

鼓励电力行业进行竞争,促使全国平均电价下降了6.16%;限制汽油、固定电话费和公共服务等行业大幅提高价格;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大幅升值,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

此外,巴西企业每年都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员工工资进行调整,以保护劳动者利益。据巴西官方公布的数字,去年巴西有超过70%的企业对员工工资的调整幅度超过物价上涨水平,工资累计上调幅度达到18.6%,远远高于同期通胀率。





四、影响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全球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客观上拉动了国际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自2002年全球各经济体先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至2007年底,世界经济增长基本呈现了稳步加快的态势。因此,一方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石油、食品等的消费需求增速加快,另一方面,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旺盛的投资需求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刺激下,对各种原材料及大宗商品的需求明显上升,致使其价格不断走高。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经济体积极研制、生产生物燃料,也直接拉高了对玉米等粮食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带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未来几年内,美国玉米产量的三分之一将用于乙醇燃料的生产,而在2002年这一比例仅为11%。

(1) 美元持续贬值

美元持续贬值推动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一方面,这些商品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其价格上涨是对当前美元贬值的一个直接反应;市场对美元继续走软的强烈预期,出于保值增值的需要,黄金、石油和国际原材料及大宗商品成为追求的热点,使得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比美元的贬值幅度要大。美元持续贬值,2002年—2007年,国际原油、黄金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了约240%、130%和100%,而从2007年7月至今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原油期货和黄金价格涨幅均高达55%,玉米期货价格也上涨近45%。

(2) 全球流动性过剩

次贷危机引发的出于避险需要的全球流动性转移和发达国家为避免经济衰退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些因素也推动了全球原材料价格的走高。次贷风波尚未结束,在发达经济体大量注入流动性的同时,银行的信贷紧缩并未根本改变,使得大宗商品市场上投机资金的供给明显增加,全球原材料价格走高仍将得以持续。

(3) 供求矛盾

供求矛盾也是推动本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和原油的供给持续偏紧,供需缺口趋于扩大。而在当前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大宗商品已成为保值增值的一种投资工具,在国际资产配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其金融属性愈发突出,这也是促成本轮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国际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亦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相关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即将处于降息周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乐观,大宗商品供求矛盾未能得以有效解决、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仍将继续高位运行,全球性通胀仍存在进一步加剧的压力

政策 探讨

农产品出口如何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阐明了绿色贸易壁垒及其表现形式,对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应





对绿色贸易壁垒的主要对策,旨在降低绿色贸易壁垒对现行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并推动我国农业朝着可持续性的绿色农业方向发展。

关键词: 农产品, 出口, 绿色贸易壁垒

一、绿色贸易壁垒及其表现形式

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进口国以保护生态环境、有限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以保护本国市场和贸易为根本目的,通过制定、颁布、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和苛刻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以限制国外产品或服务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绿色壁垒”往往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使出口方难以预见其内容及变化,难以适应和应对,是贸易保护中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式,现在被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事件不断见诸媒体:欧盟因氯霉素残留问题暂停从中国进口动物制品;日本厚生省宣布对我国动物产品实施严格检查;英国因发现中国蜂蜜含氯霉素,要求商家停止销售……中国农产品出口在短时间内多次遭遇“绿色壁垒”,再次说明我国农产品出口亟待掌握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并充分利用这种规则来保护自身利益。绿色贸易壁垒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绿色关税制度。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规定。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发达国家制定了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保护环境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1、绿色壁垒削弱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农产品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尤其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但是，近年来随着绿色壁垒的实施，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欧美等国家提出所谓“有机食品”以及类似的“生态食品”、“自然食品”、“健康食品”等，对农产品中化学物质限量更加苛刻，我国农产品往往难以满足要求，被禁止出口、退货和索赔事件屡屡发生，严重损害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形象，降低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2、绿色壁垒制约农产品出口增长。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他们约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80%左右。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属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或活跃分子，他们纷纷设置绿色壁垒，给我国农产品出口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大约每年增长5%左右，但绿色壁垒的扩大和强化，给我国农产品出口带来沉重打击。

3、技术标准直接限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发达国家在实施绿色壁垒的过程中，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的生产、包装、处理等方面进行了技术要求，结果就是欧盟不允许中国的牛肉等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美国不允许中国的龙眼、苹果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农产品因技术要求无法进入国际市场，直接限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

4、环保标准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传统优势。在传统的农产品对外贸易中，中国的花生、茶叶、蜂蜜等产品都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提出自然食品、生态食品等口号，对产品的包装标准也提出要求，中国农产品目前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花生产量本来居世界首位，在对外贸易中曾经与美国、阿根廷一起成为世界三大花生出口国，但是，近几年





来却因为黄曲霉毒素含量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而导致出口量下降,茶叶、蜂蜜也因为含有污染物质出口下滑。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优势逐渐削弱。中国每年有240亿美元出口产品因为达不到发达国家环保标准而间接受到影响。

5、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增加了中国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而又繁琐的卫生检疫制度,防止外国农产品进入本国,而且利用WTO协议中关于环境问题规定的漏洞打擦边球,实行贸易歧视,增加了中国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譬如,美国除了实行进口卫生许可证制度和良好食品生产规范注册认证制度外,又实行了ISO9000系列质量认证和水产品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制度,对所列指标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甚至三位,中国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同时,发达国家还针对中国农业生产中农药的使用设置绿色壁垒。如欧盟宣布禁止茶叶使用的农药标准由旧标准的29种增加到新标准的62种,部分农药的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100倍以上。

三、中国农产品出口应对绿色壁垒的主要对策

1、尽快建立和完善对农产品出口绿色壁垒预警机制。无论是主要发达国家或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对本国贸易伙伴绿色壁垒措施的跟踪报告和研究,有的已建立起成熟的预警机制,赢得了应对绿色壁垒的主动权。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加强通报咨询网站建设,建立国外绿色壁垒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及时向中国涉外出口企业提供WTO/绿色壁垒通报、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技术法规、国际上技术贸易措施的发展动态等有关信息,使他们做好防范工作,采取积极措施,突破外国的技术壁垒。

2、调整出口农产品的产业结构,完善农产品出口经营方式,加强农产品的国际标准互认合作。中国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受绿色壁垒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农产品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经营方式有关。目前,中国出口农产品中初级产品比重大,出口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集团化不高,生产、加工出口没有实现一体化,同世界各国的国际标准互认合作不够。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出口农产品要努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优质农产品生产比重,降低初级农产品生产比重;强化出口经营企业的联合,建立集团公司,提高专业化、规模化、集团化水平,增强市场开拓能力;努力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一体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互认,通过与其它国家签定互认协议,为中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削减绿色壁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消极影响。

3、发展生态农业,走可持续发展农业之路。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生产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主张通过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农业产出,同时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发展生态农业是打破绿色壁垒的有效途径。发展生态农业首先必须掌握充分的市场信息,在此基础上,





要改善环境,保护土壤质量,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的基础条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发展的研究力度,积极给予政策支持;要提高农业品种的产出、抵御灾害能力;要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态农业,促进生态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发展,就能生产出更多高品质、符合国际环保标准的绿色农产品,就可以抵制绿色壁垒的消极影响,增强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竞争力。

4、改革农产品外贸体制,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出口企业能够从生产、加工到包装、销售等各个环节,控制农产品的质量和环保标准。通过培育一批具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专门性绿色农产品龙头企业,尽快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化生产经营者”、“龙头企业+专业化批发市场+专业化生产经营者”等多种形式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贸易一体化的营销新体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绿色农产品交易平台,利用“B to B”进行网上贸易,构建绿色农产品网上营销新模式。

5、企业应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策略,绕过绿色壁垒。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应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跨国经营。对此,中国出口农产品企业可以在外国开办独资、合资生产企业的形式,不仅可以在外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人才,紧跟国际消费潮流,而且可以利用外国在资金、某些原材料上的价格优势,节约运输成本等多项成本。另外,企业还可以采用劳务输出、技术输出等方式,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地生产、加工农产品,变“销地”为“产地”,绕开绿色壁垒。

作者:史明灿 来源:《当代经济》2008年第3期

2008年02-03月权威视点

林毅夫:紧缩性宏观调控应继续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月4日表示,由于最近几个月通胀指数居高不下,今年应继续采取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舒缓通胀压力。

他认为,现在物价指数比较高,若不加息,负利率仍将进一步持续,这不利于宏观调控政策,所以预料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不同时间,透过加息、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及收紧信贷的措施,以舒缓通胀压力。

此前,林毅夫曾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调控部门应更大胆地利用利率调控手段,抑制高通胀风险。对于市场加息可能导致更多热钱流入的担心,他表示,由于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而外来投机者将面临10%左右的交易费用,目前的中美利差还不足以吸引热钱进入。





点评：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我国CPI增速一路攀升。今年1月，我国CPI更是同比增长7.1%，增幅创下近13年来的新高。为了抑制通胀恶化，央行已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厉以宁：宏观调控面临三大难点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3月5日表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三大难点，需要“对症下药”。他认为，货币政策总量调控有一定局限性，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更加有效。

他说，宏观调控的难点在于，首先当前物价上涨有国际因素。由于国际油价、粮价上涨无法控制，如果未来国际油价上涨将让宏观调控陷入被动局面。其次，很多供求矛盾无法靠紧缩信贷的手段解决，如处理猪肉问题还是要靠增加供给的手段；第三，人民币缓慢升值，该如何控制外资热钱，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他认为，目前情况下，首先要调整投资规模，所以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有坚持的必要。但针对不同原因要采取不同对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更加有效。

他指出，目前远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紧”的时候。“双紧”政策曾在1993年、1994年采用过，当时因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而且原因比较单一即投资规模过大，所以政策很有效。现在，物价上涨因素复杂，有必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点评：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物价上涨不同，本轮物价走高的原因并不全赖投资过高。信贷投放过多、雪灾导致农产品供应紧张、人民币升值刺激热钱流入等也是重要原因。因此，需要采取综合举措应对，而不能实施“一刀切”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不能单纯依靠提高银行利率。因为美国在降低利率，而中国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贷款利率，利差加大，外资热钱就会流入得更多。

李稻葵：一季度按年计算的CPI会下降

3月11日，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全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表示，预计一季度末到二季度初公布第一季度(按年计算)的CPI会下降。

李稻葵表示，2月的CPI涨幅达到8.7%，不要过分紧张，这个结果在预料之中，他还进一步分析了CPI涨幅过快的三个原因。

他认为，第一是统计方法的因素。物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上涨，现在的CPI统计的是今年2月份与2007年2月份比较，但2007年2月的时候，物价基本没涨，两者比较得出的CPI数据当然很高，因为体现的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物价变化。

其次，在这一阶段的CPI涨幅中，农村物价的涨幅甚至超过城市是一个重要现象。李稻葵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的影响，其中一部分因素是农民工春节期间回家过年拉动一部分农村物价，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次受灾的主要是农村市场。

导致CPI涨幅很大的第三个原因是供给不足。他指出灾害天气虽然过去了，但农副产品的生产还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供给。





针对这种现象,李稻葵认为,应该给低收入家庭进行补助,但不要“一刀切”,如果提高所有人的补助也是不合适的,应该主要补助农村和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

陈东琪:中国物价涨幅将在下半年放缓

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今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但下半年物价上涨步伐会放缓。

陈东琪说,今年的CPI上涨不是单一的因素,是复合型的。防止通货膨胀有三个办法。一是通过提高利率紧缩需求。但这位经济专家表示,目前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为四点一四,利率上调空间不是很大,是否还可以使用此办法取决于政府的意图,但可以预期的是,前期控制需求的措施,后期会陆续见效。二是增加供给,包括增加生产以及通过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的办法,相对增加国内供给。三是调整商品结构和流通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有几次通货膨胀较为严重,但分析可以发现,每次通货膨胀都与经济快速增长有关,当GDP增幅超过百分之十一,CPI就会较高。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十至十点五之间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但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

这位经济专家表示,今年的宏观调控会有效果,上半年CPI可能还会较高,但下半年会回落。

点评:分析个中原因,首先有国际因素的传递,包括去年全球粮价的猛涨,今年国际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五等。同时,在过去三十年中,CPI上涨主要是需求推动的,而这次CPI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的,其中包括原料成本、环境成本、房地产成本、人工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粮食价格仍然处于高位,由成本推动的CPI上涨是短期以及金融政策很难解决的,这六个成本因素导致今年中国CPI上涨压力很大。第三,需求因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购买力增强,需求提高,增加价格上涨预期。



曹远征:美经济下滑对中国影响有限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3月22日在“中国经济投资高峰论坛”上表示,在未来一年中,虽然美国经济会有所下滑,但并不会进一步恶化出现非常严重局面。尽管目前美国因素还不明朗,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有限。他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维持合理的增长幅度。

曹远征分析指出,按经济学解释,衰退通常是指经济连续负6个月。但目前来看,美国没有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但不排除其有一两个月会变负。所以,美国经济不可能有一个较大的衰退。他说,目前,市场普遍估计,美国次贷问题大概会在今年8、9月得到缓解,最迟会在明年年初可能会缓解。

如果上述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本次美国经济下滑持续时间不是很长。如果单纯从世界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从理论上讲,对中国经济出口不会有多大影响。曹远征分析说,尽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影响有限,但是不排除在个别月份上会有很大影响。因为它改变了美国人的消费,会使其紧缩腰包。





点评：虽然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三驾马车”，但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去年出口对于整个经济的贡献率在下降。假如这一趋势延续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影响不会很严重，且中国经济依然是顺差，加之美国经济下滑也不十分严重，所以市场下滑不会太快。今年中国经济将维持合理的增长幅度，即政府提出经济增长8%的目标有可能达到。

余斌：从紧货币政策要留有弹性

面对物价上涨等诸多不确定因素，今年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又应留有弹性。3月2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分析指出，今年政府还应做好投资项目储备，即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内需，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他分析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在10%左右。

余斌分析指出，政策需留有弹性是因为今年我国经济面临五大不确定因素：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向纵深发展，对全球及我国经济产生影响的确定性。二是国际市场商品的价格（石油、铁矿石、粮食等为主的能源、矿石、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以及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三是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以及灾后重建对经济的影响也不确定。余斌指出，特别是灾后重建对今年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难估算。四是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股市和楼市的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市场稳定的影响。五是虽然房价大幅过快增长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如果房价由涨转变为大幅下降，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利。

人民大学报告：今年GDP增速将达10.5%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日前发布2008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该报告预测，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将延续2004年以来持续增长的势头，总体上仍处于繁荣阶段，但GDP增速较2007年会有所下降，预计全年GDP增长将维持在10.5%。即使考虑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和2007年宏观紧缩政策的滞后效应，预计GDP增速仍将超过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8%的目标。

针对去年我国CPI和PPI持续走高的局面，报告认为，价格水平上升是去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凸现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年仍然棘手。

世界经济增长下滑会导致我国出口增速放缓、美元贬值将加大国内进口通胀的压力、次贷危机正在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冲击，人大经研所报告表示，在上述背景下，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增加了我国经济在2008年不确定性的程度。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08年我国出口增长将会有有一个较大的下滑，进口增长率也会下降，而净出口增幅下降将是导致今年我国GDP增速放缓的一个因素。

点评：在美国经济衰退、世界经济面临减速的情况下，国内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可能性在降低，目前真正严峻的是通胀压力的考验。今年1到2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9%，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20.7%，居住类价格上涨6.4%。CPI的上涨，一方面具有自然灾害冲击的突发因素，也有国际上的传导因素。

来源：国研网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4 月

第 2 期 [总第二十二期]

- 通胀难题席卷全球
- 华尔街病人
- IMF 预计信贷危机造成近万亿美元亏损
- 谁在增持美国资产？
- 美元与信贷危机
- 中国与核心通货膨胀
- 重现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经济脉搏

通胀难题席卷全球

作者：Andrew Batson

几年的相对稳定期过后，价格上涨风潮现已横扫全球。

它来得很不是时候。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连续大幅下调利率，Fed之所以与治理通货膨胀的常规策略背道而驰，为的是防范房地产市场崩溃和信贷危机演化成为经济的长时间严重衰退。这就使得这场针对通货膨胀的全球战役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周三预计，今年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升至2.6%一线，创1995年以来新高。美国2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了4%。而欧元区15国3月份CPI较上年同期的升幅达到了3.5%，创出十年峰值，也大大超出了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目标区间。即便是长时间受物价持平或走低之困的日本也出现了程度尚属温和的通货膨胀。

食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是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扬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尤其沉重的打击，因为相对而言，当地居民采购生活必须品的开销占他们工资收入的比例更高。近几周来，包括越南和埃及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爆发了针对价格上涨的抗议活动，现在前者的物价水平已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9.4%。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周三所做估算，在过去三年中，全球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83%，给此前颇有成效的扶贫减困工作带来了威胁。IMF预计今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心国家的CPI升幅为7.4%，创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但较此前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仍有距离。

各经济体通货膨胀状况的背后成因各有不同，在德国要追溯到工会谈判提高工资，在中国是因为猪肉供应量锐减，在南非应归咎于电力紧张，而在印度则是由公务员加薪所导致。

广告但是几乎各地都出现了物价上涨，这一不争的事实表明通货膨胀多少是由全球性问题引发。粮价因粮食作物进入替代能源领域而猛涨。去年，作为亚洲人主食的大米价格上涨了147%。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推高了原材料价格。石油供应紧张令周三的原油期货合约盘中首次突破了每桶112美元大关，原油价格此番涨势已导致燃油和运输交通成本上涨。

美元走软则是另一个原因。它不仅推高了美国本地进口商品的价格，也令几十个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沙特阿拉伯、香港和蒙古）身受其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钉住政策使得它们不得不跟随Fed的减息脚步，即便自身经济没有衰退的问题。这就给当地价格水平带来了上行压力。此外，本世纪头几年时间里的信贷宽松政策（当时的应对通货紧缩之举）也对后来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球经济发展可能也难辞其咎。近年来全球化





确实为压低通货膨胀作出了一定贡献,因为中国、印度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扩大了全球的劳力构成,并加大了工厂产能,从而对多种商品的价格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但新兴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意味着它们的货币以及物价将保持走高之势,也就是说富余国家将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些较贫穷地区出产的商品。

法国央行(Bank of France)行长克里斯蒂安·诺耶(Christian Noyer)表示,总体来说全球化将暂时失去(或许会变成长期)其反通货膨胀效果。

物价上升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一点在贫困国家中尤其突出。而此时潜藏在人们心中因从前价格飞涨造成的痛苦记忆又会死灰复燃。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会使当前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如果家庭或企业把涨价当做常态,那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会使通货膨胀率维持于高位。通货膨胀遮盖了那些本可以使市场发挥经济功能的价格信号,并使企业制定计划变得更为困难。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IMF 前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一旦通货膨胀预期升温便很难扭转。

食品及能源

眼下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推高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剔除这两项易波动的价格因素后,核心 CPI 升幅不及整体 CPI 那么迅猛。但商品价格的上涨已经渗透到了全球经济各领域。即便商品价格能够止住涨势、停留在当前水平,全球的价格水平还将在此后几个月中保持上行,因为企业需要对此前的价格上涨做出反应。

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已说服客户今年接受 65% 的矿石涨价幅度,这较去年时 9.5% 的涨幅不可同日而语。近几个月来,各大钢铁企业纷纷把自己的产品价格上调了 17% 至 20%,其中就有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集团有限公司(Baosteel Group Corp.)。

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首席执行官吉姆·欧文斯(Jim Owens)近日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将给公司的原材料成本带来很大影响。卡特彼勒是美国一家大型建筑设备及机械产品生产商,该公司正计划从今年 7 月起把产品加价 5%。

位于圣路易斯的 Solutia Inc. 打算将夹层玻璃的

生产原料树脂提价至多 40%,公司将其归咎于原材料、能源和运输成本的不断上涨。公司副总裁卢克·德·泰默尔曼(Luc De Temmerman)表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做出决策的重要关口,公司采购原材料的价格不停上涨,如果不把这层影响转嫁给买家,那么自己的业务将变得无利可图。

家用纸制品生产商金佰利(Kimberly-Clark Corp.)2 月份时将部分产品的售价上调了 4% 至 7%,其中就包括好奇(Huggies) 纸尿裤、以及 Cottonelle 和 Viva 纸巾产品。继 2007 年 4 月提价 4% 至 5% 之后,好时食品(Hershey Foods Corp.)在 2 月份时再次将巧克力棒的售价提高了 13%。拥有 Champion 及 Hanes 品牌系列的服装企业 Hanesbrands Inc. 警告称棉纱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能会带动零售价格上浮。

打车费上涨

在加州蒂梅丘拉, Southwest City Coach 这家只有 4 辆出租车的公司,老板加里·拜勒(Gary Byler)在从业 10 年来首次决定上调车费,其中起价从 1 美元上调至 2.5 美元,而每公里车费从 2.50 美元上调至 2.75 美元。拜勒说,“保险成本已经上涨 40%,而油价更翻了一倍”。

由于各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相差悬殊,日本只有 1%,而拉脱维亚高达 17%,因此各国对此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美国和英国的央行行长关心的是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即便在油价高企的情况下还要降息。而其他国家则试图抑制通胀。包括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南非、瑞典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最近都在加息。

在欧洲,维持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在通胀不断攀升之际,欧洲银行业却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在欧洲央行看来,通胀高企是比美国引爆的信贷危机更棘手的问题。欧洲方面担心能源和食品价格高企将传递至工资和其他价格领域。因此尽管货币市场饱受流动性不足之苦,但欧洲央行始终拒绝降息。预计周四召开的欧洲央行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

导火索

最近德国发生的涨工资潮便是个导火索。上周德国大约两百多万名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人争取到两年内加薪 8%,这是 16 年来他们幅度最大的一次加薪。大约 9.3 万名德国铁路工人在 3 月份得到 5.2% 的加薪,而火车司机的工资将在 2009 年之前提高



8%。

上周六在斯洛文尼亚召开的多国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大约 1 万名来自欧洲各地的工人聚集在会场前要求提高工人工资。然而他们得到的回应却是无情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会后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效仿德国给工人加薪会是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指出,近年来德国的工资水平受到抑制,因此给加薪留出了一定的余地。

在美国,Fed 官员担心的是,尽管经济正滑入衰退的境地,食品和能源价格却在推升通胀。但总体而言,他们仍相信随着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工资会受到抑制,而通胀将因此回落。

应对因通胀而引起的社会压力是件棘手的事情。中国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来缓和通胀对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影响。而中国总理温家宝还承诺,政府会确保今年的平均通胀率不会超过上年的 4.8%。

政府此举旨在缓和像北京导游 Monica Li 这样的普通老百姓的担忧。已入不惑之年的她表示,她女儿上的幼儿园在最近提高了伙食费。而她现在还要为看病、住房的费用问题发愁。她表示,如果眼下主要表现在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价格上的通货膨胀引起连锁反应,老百姓便真要过不下去了。

长期以来,有些国家总喜欢通过多多少少固定住本币兑美元汇率的方式来谋求稳定。而这是这类策略导致了亚洲和中东国家的通货膨胀。在那些本币紧钉美元的国家,央行不得不追随 Fed 降息,否则的话,追逐高回报的投资者便会蜂拥而至,进而推升其本币汇率,威胁到本币紧钉美元的汇率制度。例如香港就不顾本地房地产市场的形势而追随美国降息。今年 1 月份以来,香港房价已经上涨 31%,而房租的上浮也在推升通胀。

而那些本币紧钉美元的商品出口国更是面临通货膨胀的双重考验。在中东各国和蒙古等依靠资源出口的国家,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刺激了本国经济,进而助长了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自己也受到全球粮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当这些国家的央行追随美国降息时,通胀压力便进一步凸显出来。

蒙古的问题

这甚至使蒙古大草原上人们的生活都变得越发复杂,那里的很多人都是游牧民,食品价格往往随

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波动。蒙古的货币图格里克实行松散钉住美元的政策,在价格上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该国铜的出口创汇大幅增加,2007 年末通货膨胀达到了 15.1%。

与此类似,中东在能源出口的推动下,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通货膨胀也在酝酿着不稳定因素。在富余的海湾国家卡塔尔,天然气销售推动了收入的大幅增长,政府支出也因此增加。今年的财政预算较去年增加 46%,较 6 年前增加了 3 倍多。大部分预算都被用于修建公路、机场、基础设施和学校。卡塔尔财政大臣卡迈勒(Yousef Hussain Kamal)说,财政盈余数额巨大。

卡塔尔的通货膨胀也同样可观,2007 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折合成成年率为 13.7%。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因为卡塔尔遵循钉住美元政策,Fed 降息的时候也紧随其后。该区域工资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遭受了严重打击。当地的通货膨胀意味着食品和住房价格上扬,但工人的存款却随着美元的走软一路狂跌。这些工人通常把钱寄给家乡的亲人。通胀甚至还引发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筑工人的罢工和骚乱。

那些结算货币更为灵活的大宗商品出口商能更好地消化价格上涨。石油生产大国加拿大的通货膨胀低于预期,今年 2 月价格较上年同期只上涨了 1.8%。该国央行将此归功于加元的升值,2007 年加元兑美元升值 17%。煤炭和铁矿石出口大国澳大利亚的货币也升值了,该国央行一直在稳步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该国去年 12 月的通货膨胀率为 3%。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经济学家本·辛芬多弗(Ben Simpfordorfer)说,澳大利亚情况不错,因为澳元一直很坚挺,利率又很高;海湾地区如果不是实行了钉住美元的政策,可能会和澳大利亚的情况类似。

消化损失

各国央行,尤其是 Fed,都希望美国和欧洲的增长放缓将减轻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当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开始感觉到经济放缓的影响时。一些经济学家辩称,目前的大宗商品价格高于实际需求支撑的价格,并预计如果投机商们退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价格会大幅回落。Fed 总有一天会停止降息,帮助减缓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副作用。



Capital Economic 驻伦敦的经济学家朱利安·杰瑟普(Julian Jessop)说,在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胀率几都会下降。Fed 有历史为证。他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率将较目前低很多,IMF 新做出的预测也会比目

前低很多。不过他说,通胀前景比过去要更加扑朔迷离。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 年 04 月 10 日

金融观察

华尔街病人

作者:《财经》特约记者:易午、胜寒等,《财经》记者叶伟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在风声鹤唳的华尔街,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的垮台需要多长时间?

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纽约交易所代码:BSC)的答案是一周。从 3 月 10 日到 17 日,美国第五大投行、有着 85 年历史的贝尔斯登,近年来以衍生品创新获利巨亿的贝尔斯登,去年年底仍被评级公司视做拥有充足流动性的贝尔斯登,像被闪电击中一样,迅速坍塌下来。

华尔街五大投行中,贝尔斯登规模最小,但对房屋抵押债券及其衍生信贷产品的风险敞口最大。自 2007 年 6 月其属下两只从事信贷衍生品交易的对冲基金报出巨亏以来,贝尔斯登噩耗不断,在次贷危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与其他华尔街大行相比,该行在补充资本金方面行动迟缓,也是导致其流动性恶化的重要原因。但即便如此,贝尔斯登崩溃的速度依然令人瞠目结舌。

贝尔斯登危机的诱发因素是凯雷资本的清算。该公司是私募股权基金凯雷集团旗下的一只基金,从事房屋抵押证券投资。在此前的交易中,贝尔斯登为凯雷资本提供融资,同时收取房屋抵押证券作为抵押物。凯雷资本清算导致 166 亿美元的损失,贝尔斯登手中的抵押资产变得几乎一文不值,财务状况立刻恶化。

从 3 月 10 日,周一。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口口相传,一些大型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开始拒绝接受与贝尔斯登相关的证券交易。接下来的形势一如山洪海啸,信用危机引发了挤兑和融资困难;加上投机商的做空压力,贝尔斯登的 170 亿美元现金迅速被市场榨干。到 3 月 15 日美联储宣布提供 40 亿美元紧急贷款前,它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只剩下了 10 亿美元。

经过一个周末的紧张谈判,在美联储提供的 300 亿美元信贷支持下,摩根大通宣布与贝尔斯登达成收购协议,价格是每股 2 美元,而在一周前,贝尔

斯登每股股价还有 60 多美元!最终,一周之后,摩根大通宣布将每股价格提高到 10 美元。

在贝尔斯登瓦解所激起市场巨震之时,美联储进行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公开市场操作(隔夜回购协议)、贴现窗口、短期拍卖工具(TAF)、短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和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DCF)(参见本期“美联储非常行动”)。

华尔街被这一幕深深震撼。报章连篇累牍地追踪事态的进展,专家为美联储的救市措施争执不休,甚至激战正酣的美国大选也为之黯然失色。这一情势远远超过了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清盘时的影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前的危机与 1929 年—1933 年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而衍生品的脆弱性也势将引发监管哲学的转向。

在这个意义上,贝尔斯登的丧钟,正是为山雨欲来的金融新变局而鸣。

流动性“窒息”

3 月 10 日,贝尔斯登迎来了噩梦般的一周。挤兑风潮像设定好的程序精确运行,坊间传言和市场操作同步上演,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相互联动,信用危机与支付危机自我循环。

首先是市场传言,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开始拒绝接受与贝尔斯登相关的证券交易,这意味着人们对贝尔斯登的信用出现疑虑。

在股票市场上,针对贝尔斯登的做空力量开始凝结,市场上骤然出现大量 25—30 美元一股的空单,当时其股价约为 60 美元一股。

在债券市场上,对贝尔斯登债券支付风险进行对冲的 CDS(信用违约掉期,Collateral Default Swap)息差急速上升,这被视为贝尔斯登临近破产的标志。CDS 是一种证券衍生产品,相对于对冲特定资产(多为债券)支付风险的一种保险产品,它的价格上升意即表明,市场认为其所保险的资产出现支付困难。





值得提及的是,这种衍生产品近年来在华尔街大行其道,贝尔斯登与力最多。到头来 CDS 将其引入危机,可谓自食其果。

与此同时,信用评级公司迅速将贝尔斯登信用调低几个级别,公司债券此时与垃圾债券只有一步之遥。下调评级意味着贝尔斯登背书的众多衍生品证券合同也将被集体下调评级,影响证券持有者的资产和融资状况。

压力之下,贝尔斯登的融资链条开始出现裂痕。由于担心资金安全,银行和对冲基金们开始在证券回购融资市场(下称 Repo)上拒绝为贝尔斯登提供周转资金。

总规模达 3 万亿到 4.5 万亿美元的 Repo 市场,是高度倚重资金杠杆的华尔街机构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线。在这个市场上,金融机构多以国债等高流动性证券产品作为抵押进行隔夜拆借。据一位接近贝尔斯登的市场人士称,该公司每天在 Repo 市场融入的资金量要在 700 亿—800 亿美元之间。

到 3 月 14 日晚,贝尔斯登在 Repo 市场上已完全无法获得可供周转资金,昔日常相来往的银行和基金,此时甚至连贝尔斯登提出以某些高评级债券作为抵押也毫不动心。“尽管贝尔斯登手中拥有国债,但融资方担心一旦发生破产冻结,这些证券就会被 haircut(减值),因此拒绝接受贝尔斯登的一切抵押品。”前述知情人士解释。

在市场的另一端,出于同样的原因,贝尔斯登的交易客户们纷纷开始撤出交割期未到的交易合同,取消托管账户,从中撤出证券资产或者现金。一些对冲基金甚至需要向投资人公告其与贝尔斯登已经划清界限,没有交易往来,方能安抚投资人。

内外交困之下,贝尔斯登变成了一座孤城,只能坐视手中的流动资金流失殆尽,或者低价抛售手中的证券产品。更糟糕的是,在保证金交易的衍生品交易中,随着贝尔斯登抛售引发相关产品(多为房贷相关证券如 CDO)的降价,触发了更多的交易对手要求补充保证金,这种恶性循环对于贝尔斯登无异于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3 月 13 日,周四。这是贝尔斯登交易对手们集体大规模撤出的一天,也是市场对贝尔斯登信心彻底崩溃的一天。

是日深夜,贝尔斯登高层火速报告美联储,称

公司面临破产威胁。次日,美联储与摩根大通联手向贝尔斯登提供紧急借贷资金,若非当日借到的 40 亿美元,贝尔斯登的账本上便只剩 10 亿美元现金。

阴谋与阳谋

事后看来,贝尔斯登最初的崩溃迹象缘自股票市场上的做空力量。

数据显示,在 3 月 10 日这一周,股票市场忽然涌现出大量有关贝尔斯登的卖空期权,其中每股行权价 30 美元的卖空期权新开合同从几百个剧增到 3 万多个,也就是大量投机者赌定贝尔斯登的股票在十天之内会跌破每股 30 美元。

做空者们的勇敢一搏异常完美。从 3 月 13 日到 3 月 14 日一天之内,贝尔斯登的股价便完成了从 60 美元到 30 美元的自由落体运动。

从当时的市场情景来看,空方对于贝尔斯登股价下跌幅度或者速度的判断都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准确和果敢。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美国证监会(SEC)的注意。有消息表明,目前 SEC 正在展开调查,旨在发现做空的对冲基金们是否合谋搞垮了贝尔斯登。究竟他们是掌握了贝尔斯登的内部消息做出的交易判断,还是通过大肆传播对贝尔斯登不利的传言拖垮贝尔斯登以获利?从法律角度,交易人士虽有权传播信息,但通过散布谣言以得利的行为则不为法规所允许。

“你要么尽量保守,要么规模最大,否则的话,你就是最容易攻击的对象。”一位华尔街分析人士如是解释贝尔斯登遭受围攻的原因。

然而,要在对冲基金这个充斥传言、言行诡秘的圈子里证实所谓合谋的假设,并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贝尔斯登远非无缝的鸡蛋。市场人士多数认为,贝尔斯登在衍生品市场的激进取向注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即使有少数做空力量合力袭击,其成功更多的也是借助了市场的公意。

贝尔斯登成立于 1923 年,近年来大力发展包括与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衍生产品,比如 CDO、CDS、奇异期权(exotic option)等等。在获利颇丰的同时,也将其资金杠杆比率提高到 33:1。

市场普遍认为,贝尔斯登的业务过于集中于房贷抵押债券产品,当高风险业务受到重创,吸纳大量流动资金的时候,整体业务亦受到影响。2007 年 7 月,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关闭后,贝尔斯





登的金字招牌已开始蒙上阴影。2007 年也是贝尔斯登在其 80 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报出亏损的年份。

随着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愈演愈烈, 贝尔斯登承销的大量房贷相关衍生债券失去了重要的买家。同时, 风险极高的次贷相关衍生产品价值本身受到市场质疑。由于过去两三年里宏观经济环境和利率环境的改变引发大量次级房屋贷款者无力还款, 次贷债券变得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市场价格一路下滑。

一旦市场对于房贷相关债券产品兴趣锐减, 作为承销商的贝尔斯登往往不得不自己持有大量流动性极差的债券, 承担这些债券价格下跌的损失。

一位对冲基金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他所在的基金自去年夏天事件爆发后, 便再也没有在 Repo 市场上借给贝尔斯登一分钱。

尽管从报表上看, 贝尔斯登核销的次贷损失并不显著, 经营业绩也无明显下滑, 但其业务结构中的潜在风险要大得多。作为场外交易衍生债券的主要做市商之一, 贝尔斯登交易的 CDS 名义市值就达到 11 万亿美元之巨。这一市场与期货市场相仿, 采用保证金制度, 市场并不显著的价格变化便有可能危及公司的整个资本金。

更重要的是, 对于这些衍生品而言, 它们的风险对冲机制在牛市中似乎屡试不爽, 但在熊市中更多显示出的是风险放大机制, 产品设计中隐含的合同风险、支付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暴露无遗。随着熊市中的所谓解杠杆 (Deleverage Effect) 效应, 这座建筑在高度流动性的衍生品大厦随时面临着被自身重量压垮的危险。

在外界看来, 贝尔斯登的猝死, 与华尔街自身的关系网亦不无关系。贝尔斯登素来独来独往, 1998 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危机时, 华尔街大机构们纷纷伸出援手, 惟有贝尔斯登悍然拒绝; 去年贝尔斯登任其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倒台而不援救, 令不少与其做交易的对冲基金蒙受损失, 也招来不少怨恨。一位基金经理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即表示, 贝尔斯登和其他机构结下的仇恨, 市场并没有忘记。

与同样在次贷债券上损失惨重的雷曼兄弟相比, 这一对比就更为明显。雷曼拥有美国次贷相关债券市场最大份额, 领先于贝尔斯登; 同样大量依赖 Repo 市场短期融资, 同样一度曾遭受类似破产的传言与做空力量攻击, 但却顽强地坚持下来。当然雷曼的资产较贝尔斯登更为多元, 海外业务也更强。

群情汹汹之下, 贝尔斯登董事长杰米凯恩 (Jimmy Cayne) 的“桥牌丑闻”成为了发泄对象。在危机爆发之际, 这位贝尔斯登的最大个人股东之一仍在底特律参加北美桥牌巡回赛, 直到 3 月 15 日并购小组进驻公司才匆匆返回。有报道称, 目前凯恩在公司大厦出没时, 均有保镖贴身防护。

2 美元权衡

贝尔斯登的垮台, 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华尔街人士看来, 重组是惟一选择。

在争议声起之前, 美联储即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措施, 在 3 月 15 日召集多家投资者来洽谈并购事项。闻讯而来的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JC Flowers、KKR, 以及巴克莱银行和摩根大通等, 最终留在位于纽约中央车站旁的贝尔斯登大楼里度过周末的是摩根大通。

据市场人士透露, 作为贝尔斯登的交易清算银行, 摩根大通长期为贝尔斯登代理交易划账清算等服务, 对于贝尔斯登自有交易情况与抵押资产状况的了解,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 摩根大通本身为贝尔斯登业务集中的场外信贷衍生品市场的重要交易方, 若坐视不管, 亦将因贝尔斯登的破产而蒙受巨大损失。

3 月 15 日和 16 日, 摩根大通派出了包括 CFO 和投行部门主管在内的阵容强大收购队伍, 进驻贝尔斯登大楼。此后华尔街与华盛顿连线不断, 进驻贝尔斯登大楼的交易双方以及监管部门的官员们, 分秒必争, 持续工作至凌晨。鱼贯而入的贝尔斯登投行业务人员们被要求提供正在进行中的并购交易单, 贝尔斯登众多的交易账户则被一一梳理。

SEC 监察交易与市场小组、华尔街的自治协会金融行业监管协会 (FINRA), 以及纽约联储官员都派出特别小组, 监控交易异常情况, 防止贝尔斯登事件影响金融机构的合规交易行为; 在同一幢楼里, 贝尔斯登的另一班人马正在紧急准备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文件。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个周末,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与财政部长保尔森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最终美联储与财政部一致同意, 必须促成双方在美国东部时间周日 (16 日) 傍晚亚洲股市开盘前达成交易协议, 避免一场可能的国际金融地震。

美国财长保尔森在 3 月 16 日的电视访问中明确表示: 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护金融市场稳定。当日





下午, 购并交易条款基本拟定, 双方就 2 美元一股的协议收购价达成一致, 摩根大通同时获得联储对贝尔斯登可疑债券资产的 300 亿美元担保。

按照最初的交易条款, JP 摩根几乎不花一文就将贝尔斯登的 prime brokerage 业务(服务对冲基金等大客户的券商业务)收入囊中。除此之外, 摩根大通还将从获取贝尔斯登强势的固定受益部门、股票交易部门与风险套利交易部门而巩固其作为跨越各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地位。

10 美元结局?

美联储和摩根大通提出的方案, 很显然是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做出了区分: 股东受到了严厉惩罚, 债权人则因投鼠忌器受到了保护。

“美联储在处理道德风险与系统性风险做出了尽可能的平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林埃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 向《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看来, 投资者吃够了苦头, 因而不会产生刺激冒险行为的副作用, “美联储的措施是救了机构的同时, 又惩罚了个人, 这应当是一个经典案例。”

然而, 对于持有约 30% 贝尔斯登股票的公司员工们, 这一交易只能是当头一棒。震惊之余, 则是痛心与愤怒。

除去少数包括贝尔斯登最高层在内的大股东, 贝尔斯登的股东中有许多是公司中层员工。贝尔斯登早期大力推行员工持股计划, 使得股票增值成为许多老员工的重要资产, 但这一切皆付诸东流。

《纽约时报》报道称, 当摩根大通 CEO 加米戴蒙 (Jamie Dimon) 冒雨走入贝尔斯登办公大楼, 一位贝尔斯登管理层人员愤怒地问道, “这里都是些一手建起这个公司的人, 眼看积蓄付诸流水, 你怎么保全我们?” 戴蒙的回答是: “你的意思是说, 这是我们的错?”

除了员工, 市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 2 美元交易价格的态度。3 月 18 日, 并购协议宣布的第二天, 贝尔斯登股价上扬, 体现了利益各方开始博弈的结果: 希望重组成功的贝尔斯登债券持有者们大笔购入股票, 争取在股东投票会上投赞成票; 拒绝接收贝尔斯登股权大幅缩水的部分贝尔斯登股东们也在争取投票权, 希望获得更高的出价或者新的竞购方, 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KKR、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也涉足其中。

在多方争执下, 3 月 24 日上午, 收购方案发生

戏剧性转折, 摩根大通同意将收购价从每股 2 美元提高到每股 10 美元。

这个大幅提高的最新出价是在 3 月 24 日早间一个仓促召集的贝尔斯登董事会议上被通过的。根据双方发出的新闻稿, 贝尔斯登董事会同时同意将新发行的 9500 万股股票出售给摩根大通, 使得后者拥有股权达到 39.5%, 这将在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大会上令其占有充分投票优势, 以确保此次收购不致被否。

摩根大通发言人表示, 这一股权收购将在 4 月 8 日前完成, 目前摩根大通采用的是换股形式, 但当购并结束后将回购股票。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 此前公布的并购协议中, 一些仓促写就的条款也被重新推敲。比如原协议中, 有“即便股东大会表决不同意购并, 摩根大通仍有责任保证贝尔斯登的正常交易”等争议条款。与此同时, 关于美联储的角色问题, 纽约联储也做出了清晰的表述, 将接管贝尔斯登账面价值 300 亿美元的某些流通性差的证券组合资产, 但具体条款与最初协议有所改变, 摩根将负担最先发生的 10 亿美元损失, 剩余的 290 亿美元的资金将通过联储开放的贴现窗口的方式给出。

受新协议影响, 贝尔斯登股价在 3 月 24 日上升 89%, 达到 11.30 美元。同时, 当日涌现的大量每股行权价格为 15 美元的买入期权表明, 有大量市场人士认为目前的交易条款仍然存在变数, 认为贝尔斯登股价仍将继续上升。

伯南克难题

市场公认, 无论 2 美元还是 10 美元, 贝尔斯登的股价都被严重低估 (一年前其股价曾高达 170 美元), 摩根大通及其总裁杰米戴蒙甚至被某些华尔街人士视为强盗。而美联储的紧急干预, 不仅为人作嫁的嫌疑, 更被视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公然违背。《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甚至将 3 月 14 日称为“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之梦的祭日”。如何评价美联储的救援行为, 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美联储是否应该干预贝尔斯登?

这是一场典型的金融风险扩散导致的银行挤兑 (Bank Run), 或者流动性危机。但究其根本, 贝尔斯登 2006 年之前从次贷市场上赢利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与次贷相关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 最终





导致一场信用危机或市场信心危机。问题是，贝尔斯登仍是金融市场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参与者，其面临的问题也绝非一家投行独有。如果美联储袖手旁观，可能的后果是什么？

美联储所担忧的绝不是贝尔斯登崩盘前约 100 亿美元的市值，或者是其 1.4 万名员工的就业。从资产规模上讲，贝尔斯登并没有到所谓“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的标准，但是其一级交易商的资质以及在美国债券市场上的地位，决定了它是华尔街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贝尔斯登在信贷违约掉期和利率掉期交易中仍持有 10 万亿美元的名义头寸；如果贝尔斯登清算出局，必然导致整个华尔街的系统危机。这就好比在美国金融大厦的底座上抽掉一块基石，其导致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是美联储不愿看到也无法承受的。换言之，美联储救的不是贝尔斯登，而是以华尔街为核心的整个美国金融体系；这与联储十年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危机中的行为并无二致。

“美联储是救它的银行体系，它扮演的是最终贷款人角色，一定要出来做这个事情。事实上，美国股市目前并没有大跌，所以不能说是用货币政策针对股市，美联储仍然只是在做维护银行体系的工作。”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说。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库珀（Richard N. Cooper）3 月 22 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来都是美联储的重要职责。当美联储看到整个金融体系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必须采取行动。“如果（贝尔斯登倒闭带来的）抛售行为带来的损失非常具有破坏性，美联储就要采取行动来维持整个市场的稳定。这时候，这家濒于破产的私人企业是谁已经不再重要。”

第二，美联储的干预会否引发道德风险？

自始至终，美联储的干预有着非常明确的原则，即贝尔斯登的股东和管理层不能从中受益；如果他们在这场危机中得不到惩罚，势必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即不負責任、不计风险的经营和投资活动卷土重来，其损失最终由纳税人埋单。从交易结果来看，贝尔斯登的股东损失惨重，管理层基本出局，可能有一半的员工面临失业，从这重意义上讲，联储的行为很难被称做救援（bail-out）。摩根大通将收购股价提升到 10 美元，主要为避免相关的法律纠纷，

而美联储对此很不以为然。

当然，美联储的干预无法完全避免道德风险。比如说，3 月 10 日开始的一周，雷曼兄弟的状况同样岌岌可危，正是因为美联储的干预，雷曼及其他华尔街投行才得以转危为安。

此外，美联储从贝尔斯登取得的抵押品，据信有相当部分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发行的房屋抵押债券，等于间接为两家机构提供了风险担保。但归根结底，公共政策从来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公正，而大多是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在危机的情境下，决策者当然首要考虑效率，同时兼顾公平。完全杜绝道德风险的要求无疑是吹毛求疵。

第三，是否有更好的干预方法？

与美联储的做法不同，英国政府对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 PLC）采取了国有化的方案。当时英国政府也曾经考虑通过公开拍卖，将北岩卖给私有企业，但是由于报价过低而放弃。其国有化的方案核心在于政府选任董事会，但保持董事会和公司管理的独立性；在市场稳定之后再将股权售出，重新私有化。

与之相比，美联储实际采取成立特殊目的载体（SPV, Special Purpose Vehicle）或信托公司（RTC,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的办法，独立管理贝尔斯登风险最高的部分资产。按照十年的周期，等待市场走稳，采取资产逐步变现的方法，联储完全有可能收回 300 亿美元的干预成本。这种做法在美国治理上世纪 80 年代储蓄信贷协会危机（Saving and Loan Crisis，简称 S&L 危机）中已有先例。至于贝尔斯登的管理，美联储则完全交给摩根大通，也是相对妥善的安排。

无论是国有化还是成立 SPV，其核心考虑都是纳税人利益最大化，或干预成本最小化。只要实现这一目标，途径只是技术性问题。此外，公共政策决策必须考虑政治成本。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美国的政治环境与工党治下的英国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美联储的方案政治上更为可行，这一点也反映在事后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干预的积极评价上。当然，在这种办法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干预方案，但危机之中很难求全。

第四，美联储是否具备相关的监管职责？

这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美联储的监管职能仅包括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而作为投资银





行和一级证券交易商,贝尔斯登面对的监管当局应该是美国证监会。其次,虽然中央银行应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传统上其覆盖范围仅限于商业银行等其他存款机构,而美联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特别举措,已经涵盖了华尔街几乎所有主要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此外,美联储的干预行为实际上扮演了金融机构的清算人,而这一职能传统上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来完成。因此,从多重意义上,美联储救援贝尔斯登属于超常规的“越位”行为,创下美国金融史上的多项先例。

对于美联储的这一表现,在政府和学术界争议很大。

首先,美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仅就银行业来讲,监管机构就包括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货币监理署(OCC,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美国储蓄机构监管局(OTC, 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四家之多,此外各州政府还有各自的银行监管机构。美联储的举措,大有动了别人的奶酪的嫌疑。

这当然也暴露了美国监管体系长期以来机构重叠、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的问题。一方面,有些机构受到重复监管,导致负担过重,影响效率;另一方面,监管存在空白,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美联储最近的激进行为,本有在危机之下勇于任事的积极意义,但并没有得到政府和国会的授权,因此难免遭到微辞。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的激进行为,很多人质疑:危机之前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到哪里去了?在某种意义上,次贷危机是监管缺位、金融过度自由化的产物,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把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无限放大,导致美国经济今天吞咽苦果。如果说,今天美联储的行为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正当职责,那么就是对此前约 20 年间放任式金融监管的否定。如果不是这样,

危机后从美联储的羽翼下生存下来的金融机构,势必打着“金融自由化”、“自由市场经济”的借口卷土重来,这无疑是最大的道德风险。但是,无论是美联储,还是其他监管机构,以及危机中的华尔街,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监管变局准备好了吗?

对于财务杠杆日益高企的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格林斯潘时代的监管理念趋向于认为不予监管。但库珀认为,应当对财务杠杆设定一个“可以容忍”的限度。“2:1 或者 3:1 的财务杠杆与 30:1 和 40:1 的财务杠杆完全是两回事。资产规模被财务杠杆放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对整个市场造成系统性风险,公众利益和对市场的信心会因此受到损害。所以,对冲基金对财务杠杆的使用不仅仅是少数富人的私人问题,而应该被公之于众并加以监管。”

3 月 26 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发表讲话,称美联储向投资银行开放融资窗口,意味着对于华尔街的监管亦将同步加强。

应该承认,美联储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的一系列行为,履行了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治理危机的职责。相比之下,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金融危机中,从危机爆发到金融机构大量核销坏账甚至清算出局,大概花了六到七年,而美国次贷危机走到今天的调整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这除了得益于美国金融体制本身的灵活性,美联储的公共政策也大有可以圈点之处。

但是,次贷危机仍还没有见底,谁也无法保证不会有第二起贝尔斯登事件发生。伯南克和他的同事们,能够把美国经济最终这艘大船,最终带出次贷危机的漩涡吗?

来源:《财经》杂志,2008-03-31

IMF 预计信贷危机造成近万亿美元亏损

作者:克里什纳*古哈(Krishna Guh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昨日表示,信贷危机可能给金融行业造成近 1 万亿美元的潜在亏损,并警告称,一级抵押贷款、商业房地产、杠杆贷款和消费金融将会出现更多亏损和减记。

IMF 称,按 3 月中旬的市场价格计算,亏损和减记总额可能达到约 9450 亿美元。其中略超过一半的损失将由银行承受,其余部分则落在保险公司、养老金、对冲基金和其它投资者身上。





IMF 相信,各银行已对其大部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进行了必要的减记——已减记约 1930 亿美元,还需减记的仅有约 800 亿美元。但该组织警告,随着美国经济走软,苦难将波及其它贷款形式。

该组织货币事务及资本市场部门负责人杰米·卡如纳(Jamie Caruana)表示:“信贷的恶化已经升级,波及整个信贷领域。”

IMF 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中公布了以上估计数字。自美联储(Fed)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对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实施拯救以来,市场一直较为乐观,而这份悲观报告对此提出了质疑。报告表示,自去年 10 月以来,“系统性风险已大幅上升”。

卡如纳原为西班牙央行(Bank of Spain)行长。他对记者表示,贝尔斯登拯救行动“帮助降低了金融体系出现长尾事件(tail event)的可能性”——换言之,它降低了出现真正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但他表示:“资金压力仍然很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压力依然存在。”

卡如纳表示,“在评估金融系统的杠杆程度方面存在集体失误”,而资产负债表压力可能限制各银行的放贷能力。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8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三

谁在增持美国资产?

作者:高占军(中信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

在当前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经济增速严重放缓而美元大幅贬值背景下,为何还愿意增持美国资产?

2008 年 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报告,讨论了全球失衡问题,认为以经常账户差额占 GDP 比重观察,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状况正在改善。而在美国,由于经济减速和美元走弱,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的比重由 2006 年的 6.2%降至 2007 年的 5.5%,远超预期。外国资本的稳定性也在增强,资本账户 2007 年 7 月以来显著好转。其结论是,全球失衡在 2007 年已达顶峰,并有望继续改善。

在全球金融市场仍非常混乱、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背景下,这篇报告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安慰。

上述报告认为全球失衡改善有多条依据,其中之一是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具极强稳定性。

那么,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何以保持稳定?换句话说,在当前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经济增速严重放缓而美元大幅贬值背景下,谁还愿意增持美国资产?

为说明此问题,不妨先看几组数据。

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拥有 16 万亿美元金融资产,其中,证券类资产 9.77 万亿美元,占比 61.1%。

美国财政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07 年 6 月底,外国持有美国证券资产总量 97720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940 亿美元,增幅 25.64%。其中,长期证券 91360 亿美元,短期证券 6350 亿美元。在长期证券中,权益类 30300 亿美元,长期债券 60070 亿美元;长期债券中,资产支持证券 14720 亿美元,其他长期债券为 45350 亿美元。

从国别看,日本是第一大大美国证券资产持有国,持有美国证券资产 11970 亿美元,中国次之,为 9220 亿美元,英国则以 9210 亿美元排名第三。

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资产,大部分为长期债券,规模 8700 亿美元,另有 230 亿美元短期债券和 290 亿美元股票。在长期债券资产中,资产支持证券为 2170 亿美元,占比 23.54%,其他债券为 6530 亿美元,占比 76.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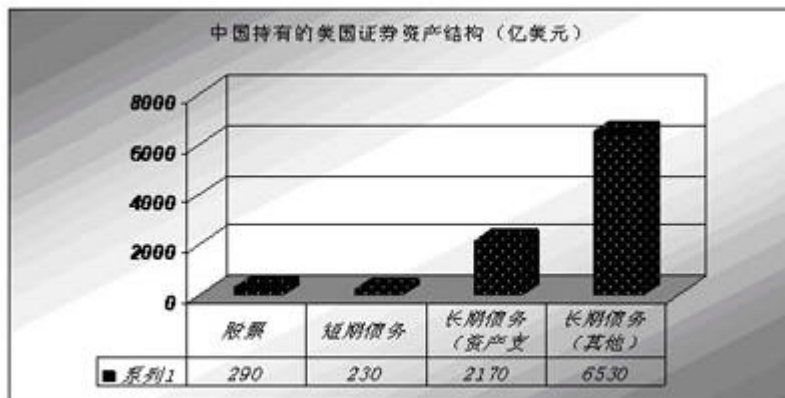
因数据的时滞,我们尚不能完全了解 2007 年下半年以来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资产的整体变化情况。但另外两类资产数据可对此进行弥补:一是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二是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上述数据可分别更新至 2007 年底和今年 1 月。

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长期证券包括期限在一年以上的美国国债、政府机



构债券和企业债券,以及企业发行的股票。2007 年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未能延续前两年的上升势头,当年仅为 10058 亿美元,较上年减少 1374 亿美元。如果减去美国对外国长期证券 2235 亿美元的净购买,则通过长期证券一项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为 7823 亿美元,较 2007 年的 8923 亿美元下降 12.33%。

注:2007 年 6 月 30 日数据。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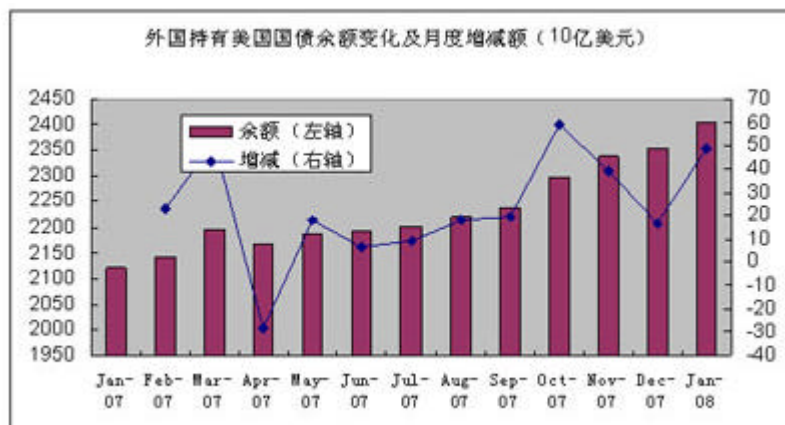


2007 年四季度次贷危机正在蔓延之中,对比此期间的外国对美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和美国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数据,会发现完全不同的变化:前者为 2574 亿美元,保持了当年的平均水平;后者为负 39 亿美元,有相当显著的下降,较当年的季度平均数 559 亿美元有非常大的偏离,反映出当时因信贷紧缩,美国投资者从海外市场撤资的现象。

再来看一下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减变化。截至 2008 年 1 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总量 24025 亿美元,约占外国持有的美国全部证券资产的 24.59%。

自去年以来,常有关于外国减持美国国债的讨论,国别的差异固然有,但从总量看,除了 2007 年 4 月出现 281 亿美元的减持外,其他各月都是增加的,今年 1 月增持的数字高达 487 亿美元。自 2007 年 1 月至今年 1 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共增加 2819 亿美元,增幅 13.29%。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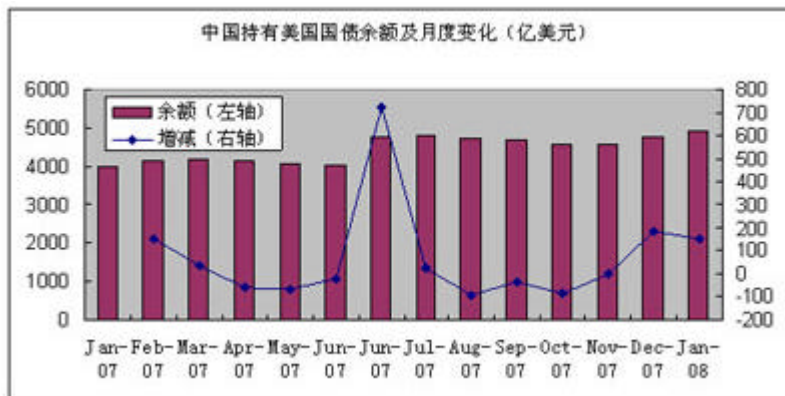


日本是第一大大美国国债持有国,今年 1 月底持有美国国债 5869 亿美元,中国以 4926 亿美元排名第二,英国 1601 亿美元,排名第三,巴西第四,1417 亿美元。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余额由 2007 年 1 月底的 4010 亿美元增至今年 1 月的 4926 亿美元,增加 916 亿美元。在这 13 个月中,有七个月是净减持国债。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美国财政部于去年 6 月调整了统计口径,这一调整使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余额增加了 721 亿美元;第二,

在经过四个月的减持后,中国于去年 12 月起至今年 1 月,连续两个月增持美国国债,共增持 327 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



增持或减持表明绝对量的变化,而相对指标则显示资产分散化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结合相对指标进行分析很有意义。

相对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外国持有美国国债占其持有美国证券资产的比重。国债的增加或减少可能被其他证券资产的减少或增加所抵消,二者此消彼长;二是外国持有美国国债占其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或者外汇资产的比重。前者意味着美国资产的多元化,而后者则是整个投资组合的分散化,涉及到币种结构的调整。

数据显示,这两个指标一段时间以来,前者相对稳定,而后者则略有下降。整体看,外国投资者对于美国资产,一方面在增持,同时也在多元化其投资组合,适当兼顾到资产结构和币种结构的调整。一直以来沸沸扬扬的减持美国国债(资产)的议论,看来只具有时点和国别差异,并未成为趋势。

外国投资者对于美国资产的增持,曾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感到欣慰,其在本文开篇报告中提到的“美元汇率虽贬,但过程较为有序”的背后,大概便含此意,未料到外国资本会如此支持美元。

有评论认为,外国增持美国资产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美元过度贬值,导致其存量资产受损。前不久,高盛全球经济调研部负责人 Jim O'Neill 就表示,外国央行买入美国国债和其他资产可能是变相干预,目的是防止美元大幅走低,以保持稳定。

这一判断模棱两可。若此命题成立,则要点在于:众多美国资产持有国是相互协作,还是自发反应?在这里,美元汇率是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若自发反应,难免存在搭便车行为;而协同操作又很难实施。

何况,从国债的角度看,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并不大,仅占其持有的全部美国金融资产的 15%,占其持有美国证券资产的 24.59%,其略有变化,对美元的影响不至于如此显著。

那么外国青睐美国资产的原因究竟为何?在我们看来,存在如下可能:

第一,美元资产仍很重要。作为主导货币,美元资产是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部分,其比重可逐渐减少,但增量配置的需求还较强。美元贬值风险犹在,但对长期投资,汇率变动具周期性,若不要求高流动性,则风险相对可控。增持欧元资产也有风险,欧元未来存重估可能。

第二,美国在次贷危机中,资产价格大跌,吸引部分外部资金进入。比如,因金融机构大量的资产减值和信用损失,必然要求补充资本;另外,标售利率债券市场出现问题后,利率大幅提升,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在提高。



第三, 债市的避风港效应显现。一段时间以来, 全球资金都在涌入债市避险。当然, 因信用重估, 低信用等级债券大遭冷落, 而高信用等级的债券备受青睐, 尤其是国债。在美国, 2007 年投资国债的回报率高达 9.1%, 今年一季度则为 3%, 债市的避风港效应开始显现。而美联储大幅降息, 及为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 也加剧了国债市场的上扬。

来源:《财经网》, 04-14

专家观点

美元与信贷危机

作者: Ronald McKinnon (斯坦福大学教授, 也是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我们都已熟知随房价下跌而产生的抵押贷款问题。当今金融危机中的一大未解之谜是, 为什么其他一些私人信用市场也陷入了僵局。

金融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报导: 数万亿美元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缺少必要的美国国债以便为周转不灵的银行借贷提供抵押品。而在巨额财政赤字 (2007 年为 2,375 亿美元) 导致新的国债供应量不断增加时, 出现上述短缺就更显得奇怪了。

国债的这种短缺, 以及信贷危机出人意料的严重程度, 与美元在汇市遭到抛售的情况有关。

从 2007 年 7 月到 2008 年 3 月,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将短期利率从 5.25%急剧下调至 2.25%。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提供资金的私人资本流入也出现了意料之中的枯竭。热钱流出美国, 流入货币最有可能升值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

随后, 外国央行 (除了欧洲央行) 出手干预, 买进美元以减缓本国货币的升值速度, 有时干预动作还很大。2007 年, 中国外汇储备增加额最大, 高达 4,600 亿美元。其他国家的央行, 从海湾产油国到俄罗斯、巴西及一些较小的拉美和亚洲国家, 也进行了干预, 增加了美元储备。

这些官方储备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投资美国国债。Fed 今年 3 月的资金流量数据表明, 2007 年, 外国央行买进了约 2,090 亿美元美国国债。但财政部自己的数据有所不同, 为 2,500 亿美元。

广告虽然国债枯竭现象在 2007 年十分猛烈, 2008 年更甚, 不过 2003 至 2005 年也曾有过这样的势头。2004 年初, 联邦基金利率被降低至 1%, 也引发了美元抛售, 不过那时是流入日圆而非人民币。那段时期, 人们可以轻易获得贷款, 利率又过低, 这极大地加剧了 2003 至 2006 年间的美国房市泡沫

以及更为普遍的美国金融系统财务杠杆过高的情况。

2007 至 2008 年, 房市崩盘, 杠杆过高的对冲基金和特殊投资工具也纷纷倒闭, 加剧了大多数金融交易对手方的风险。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无法以有问题的私营债券或贷款做抵押获得资金。由此出现“择优而栖”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令国内民间对国债的需求大幅增加。但恰在这时美元在汇市上被大量抛售, 被迫购入美元的各国央行用所购美元投资美国国债, 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债的市场供应量。

美国国内的国债需求增长加上供应的降低, 解释了为何在美国信贷紧缩、私营金融机构又面临高利率之际, 美国国债的票面利率却下降至不可思议的低水平。虽然美国物价持续上涨, 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涨了 4.3%, 而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6.4%, 但三月期国债收益不到 1%, 两年期为 1.32%, 而基准的十年期债券收益为 3.5%。甚至还有报导说, 某些超短期国债的名义收益实际为负数。通货膨胀保值债券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 的实际收益已经是负数。

这样, 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矛盾。虽然美国陷入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不怎么好, 为了给私营和公共退休金提供担保以及挽救摇摇欲坠的银行而背上了巨额或有负债, 但其资信却加强了。美国政府可以以超低利率发行国债的事实至少为使用财政手段刺激衰退的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理由。2008 年 2 月通过的 1,600 亿美元的退税就是上述手段的一例。

从 3 月 27 日开始, Fed 提出从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向银行和债券交易商借出最多 2,000 亿美元国债,





为期最长 28 天,并接受范围很广的抵押品。Fed 此举是对交易商对银行间拆借市场缺少国债的怨言作出反应,但却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被抛售。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元本位之下,美元走软并不断贬值,导致外国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暴涨,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现在,如果外国央行出手干预,防止其本国货币过快升值,并过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美国面临的通胀威胁可能加剧。

稳定美元汇率并吸引外逃资本回流美国需要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让 Fed 相信,持续降低利率并扩充美国的货币基础并非应对当前信贷危机的良策;相反,这只会引发恶性循环。

Fed 应对信贷危机的方式就是降息,如果经济是封闭式的,可以忽略外汇因素,这种方式理论上讲可能是正确的策略。但实际上经济是开放的,资本不断外流。由于美国居全球美元本位中心的独特地位,作为危机重重的信贷市场首要的抵押品,国债的枯竭加剧了信贷危机,而国外的货币扩张也加剧

了全球通胀。随后, Fed 进一步扩大货币基础,以应对日渐紧缩的美国信贷市场。

强势美元政策的第二大要素是针对汇率采取更为直接的举措。至少,应该停止向中国施压以迫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方式。美国政府也应该与欧洲、日本、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央行合作以稳定节节下滑的美元。

解决当前危机的最佳方案是阻止抛售美元。除了能解除国债枯竭的局面、缓解美国信贷市场危机之外,这样做可谓好处多多。如果让美元贬值而不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确保其对其他主要货币的长期价值,会破坏人们对美元长期购买力的信心。那样的话,还会引发通胀,并很有可能出现 20 世纪 70 年代那样的滞胀局面。

文中表述不代表道琼斯的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 年 04 月 03 日

中国与核心通货膨胀

作者:Stephen S. Roach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洲区主席)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今年 2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8.7%,涨幅创 12 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有理由担心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他们请专家研究讨论如何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可不幸的是,这些所谓的专家提出的却并非什么好建议。

令人痛心的是,最近在北京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就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该论坛自 2000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每次为期三天,现已成为中国公开讨论政策的最重要平台之一。论坛被安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召开,为少数国内外学术界及商界精英与众多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甚至国务院总理)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机会。

与会者大多认为,中国不应应对最近的高通货膨胀率反应过度。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高通胀率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所引起,此类价格反映出的“结构性”势力超出了国内宏观稳定政策的调控范围。该结论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无论是食品还是能源领域,最近的价格上涨都是全球势力

不断增强的结果。于是,中国的通胀问题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很快便成了惯常说辞。

表面上看,各项数据似乎证明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除去食品,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只有 1.6%。也就是说,上述 8.7%的通胀率中约有 90%可以完全归因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如果把能源价格变化也剔除,那么核心通货膨胀率会降到 1.1%。假设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涨势不断减缓、甚至出现价格下滑,于是专家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公众对中国通货膨胀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了。结果就是,专家们敦促政府放弃实施进一步的宏观紧缩政策,比如货币政策。

这一幕我过去曾经见过。那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当时我刚刚开始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担任经济师。今天的宏观经济状况在很多方面都与那时惊人的相似。当时,世界各地的经济都在快速发展,引发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一边是厄尔尼诺在海上肆虐引起破坏性洋流,一边是陆地上农产品价格暴涨。当然





还有 1973 年底的石油禁运，油价因此涨了三倍。听起来有些耳熟吧？

时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的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认为 Fed 在反击外来势力的不断积聚上几乎是无能为力的。他将这些外来势力称为“特殊因素”——这些不会重复出现的态势必会逆转，通货膨胀自然也将放缓。他指示 Fed 的研究人员将所谓的“特殊因素”从 CPI 中剔除，关注于“更纯粹”的美国“实际”通货膨胀率数据。这是现代经济学实践中的一个黑暗时期，正是那时诞生了核心通货膨胀率这一概念。

伯恩斯的致命失误是让核心通货膨胀率成为了美国货币政策的指导，致使联邦基金利率远远低于总体通货膨胀率。结果导致短期实际利率成为负利率，进一步刺激了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不幸的是，伯恩斯并不仅仅将食品和能源这些“特殊因素”从 CPI 中除去了，他最后还剔除了一系列其他“导致失真的因素”，即房屋产权、旧车、移动房屋，甚至还有珠宝首饰，当然可以认为珠宝首饰价格上涨是因为国外因素将金价推高至每盎司 850 美元。

当时的 Fed 不但没有慎重考虑实际利率的概念，而且也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会对以后价格的上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物价与经通胀调整的工资之间的危险关系是造成工资—价格恶性循环的关键因素。持续时间越长，就越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问问 Fed 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就知道了，他最后不得不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 19%，以遏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通货膨胀预期。

如果中国忽视了美国在通胀问题上最惨痛的政策教训，后果将难以想像。当然，眼下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限制了中国的猪肉供应。此外，50 年来最严重的冰雪天气也使中国的能源价格出现了严重失真。

不过，无论是否存在特殊因素，都有理由担心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了。新颁布的《劳动法》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此时正值总体通胀水平不断加剧之际。有报导称政府对贫困家庭提供了特殊补助，帮助他们应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

工资和物价的同时上涨——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应该令任何央行将之视为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征兆并引起关注。对中国央行(PBOC)来说尤应如此，目前该行将 1 年期存款利率保持在 4.1%，1 年期贷款利率为 7.5%，二者都远远低于总体通货膨胀率，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 70 年代伯恩斯和 Fed 实行的负利率。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超过 11%，工业产值增加了近 17%，面对仍旧处于“白热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正确评估通胀危险已是迫在眉睫。经济过热只会使初显恶化态势的通胀预期进一步恶化。央行越早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情况就会越好。即便是在国外需求锐减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增长减慢的时候，这一点依然毋庸置疑。

我在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听到的论调甚是耳熟。类似的建议曾令 Fed 在政策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时间常常会令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过我不会忘记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今专家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和几十年前 Fed 采纳的建议如出一辙。我喜欢以史为鉴，只希望中国的领导人和决策者拥有智慧和勇气来避免重蹈覆辙。

文中表述不代表道琼斯的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 年 04 月 02 日

重现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作者：张巍柏（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

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我们不断看到美联储开着直升机撒钱，不过同时吊诡的是，我们也不断看到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巨额资产减记和信用收缩的消息。这里存在的一个疑问是：美联储撒下来的大把资金都跑到哪里去了？信用收缩的环境下，

原先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环境已经改变了吗？

如果对比次贷危机发生前的利率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在美联储连续降息之后，美国的利率已经跌至 2.25% 的水平，相比去年 8 月，利率大跌 3 个百分点。因此，至少从利率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全





球流动性过剩依然如故。另外从欧元区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发生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市场信用收缩,不过欧元区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仍然惊人。据欧洲央行披露的数据,欧元区去年 11 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 M3 较 2006 年同期增长 12.3%,与 10 月份的增幅持平。更受关注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增幅在 9—11 月期间达到了 11.9%,高于 8—10 月的 11.7%,并且远高于欧洲央行认为与维持物价稳定相符的 4.5%的控制目标。今年 3 月 31 日公布的欧元区 2 月 M3 货币供应增速虽有所减缓,但仍有 11.3%的年增速,与去年的三个月移动平均增幅相差无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数据,尽管有降低美元储备言论的影响,去年第四季度全球美元储备的总量仍然高达 2.6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占到已知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总额的 63.9%,稍稍高于上一季度的 63.8%。换言之,在主要储备货币上,美元保持与欧元几乎等同的增速,甚至更快。这也说明全球美元供应的增速与欧元一样保持了快速增长。

既然美元和欧元的供应都在大幅增长,全球那么多金融市场却在萎缩,西方金融机构的钱难道都趴在账上不动?显然不会,欧美市场遭遇问题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币值正在快速上升,外汇储备剧增,显示全球资金正在大量“挤入”新兴市场。2007 年全球 FDI 流入创下 1.5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新兴市场中,中国、香港、俄罗斯、巴西、新加坡、墨西哥分别达到 827、544、489、374、369、367 亿美元。特别是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新兴国家债券市场,更是增速惊人。据 IMF 的数据,该市场普遍增长在 50%以上。

新兴国家债券市场的快速增长,已经开始引起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据《独立报》报道,俄罗斯经济专家集团“独立分析中心”负责人叶夫谢·古尔维奇近日警告,再过两年,俄罗斯将会遭遇大规模的货币危机,比 1998 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世界

银行驻俄罗斯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热利科·博格季奇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震荡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古尔维奇则认为,2009 年俄罗斯就会发生货币危机。古尔维奇警告:“首先进口的增长及私人债务的不断增加导致两年后经常项目账户亏空,而且这个时候对俄罗斯来说最危险的不是石油价格的震荡,而是资金的外流。”他说,俄罗斯公司的美元外债每年增长 50%,而且已经超过年出口总额。最近 7 年来,外债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额的比例已经增长了 2—3 倍。同时俄罗斯年实际进口额增长了 30%,而实际出口额却只增长了 7%。

另一个引起投资者高度关注的新兴国家债券市场是伊斯兰债券。根据穆迪的统计,包括亚太区在内的全球伊斯兰金融市场方兴未艾,在过去 3 年每年都有大约 15%的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伊斯兰债券,截至 2007 年其全球发行量已达到 973 亿美元。以马来西亚林吉特为单位的伊斯兰债券在 2007 年的发行总额就占到了 644 亿美元。

上述数据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重演当年疯狂借债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当年疯狂借债给政府,现在疯狂借债给企业,如出一辙。未来可以预见的结果也很简单:如俄罗斯的古尔维奇所言,当外资开始疯狂撤资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货币将一落千丈,财富也将被席卷一空。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大量的美元和欧元如今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低迷时,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制造着泡沫,未来出现金融危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中国企业无论是前往设厂还是进行海外证券投资,都应该密切关注这一风险。

来源:安邦分析师博克,2008-04-15



**Guide:**

- ◀ 第七届泛亚语言与语言学研讨会征稿通知
- ◀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nd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 ◀ **Tagging the Bard: Evaluating the Accuracy of a Modern POS Tagger on Early Modern English Corpora**

第七届泛亚语言与语言学研讨会定于2008年12月5—6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由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联合承办。

一、会议主题: 语言学研究(包括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构

第七届泛亚语言与语言学研讨会征稿通知

造语法、对比语言学等研究方向)

二、主旨发言:

1. Shuanfan HU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Thomas LE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Mamoru SAITO, Nanzan University, Japan
4. Jiaxuan S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三、来稿要求:

请提交英文摘要一份,限500字之内。摘要请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所属单位、通讯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论文摘要请在会议网址<http://www.clal.org.cn/panasia> 或者 <http://www.clal.org.cn/panasia/index.htm> 上网上提交。摘要截止日期为2008年6月1日。会议筹委会审查后将于2008年7月15日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四、会议费用: 会务费700元/人(研究生凭学生证500元/人),其它费用自理。

五、联系方式:

1. E-mail 地址: gpphd@mail.gdufs.edu.cn
2. 邮寄地址: 51042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联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第七届泛亚语言与语言学研讨会筹委会

**Abstract:**

A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taught to adults in Ukraine is described, focusing on the classroom approach that incorporates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nd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It is noted that simulations ordinarily in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have two shortcomings: they are disconnected episodes; and the situation, conditions, and purpose are set by the teacher or developer of the instructional material materials used, limiting the learner's creative share in the exercise. An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 represents uninterrupted modeling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invented by the learners. Situations include a



variety of business interview, negotiation, and discussion conditions ranging from getting to know the structure of a company to discussing sales results and targets. The simulation begins with one topic and continues throughout the course until all situations have been addressed. Each situation contains a number of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concern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firm's business activities, including preparation for meetings, business strategy discussions, and decision-making. Students prepare much of their own material for the tasks, and create a group portfolio. The approach is found to motivate students and develop varied English skills.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nd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in Business English have bee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gained in teaching an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The program is aimed at teaching oral everyday English to Russian and and adult students learning their own country-Ukraine. This quite successfully since 1993 in

The program itself is 7-month every week. It consists of 2

The first is a 14-week course with 4-hour long classes 3

developing students' communicative skills necessary for or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situations inevitable for a person on a short business visit to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The second is a 14-week long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proper with 4-hour long classes held 3 times a week. It is aimed at developing learners' communicative skills necessary for participating in business talks on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The course is based on content learning when teach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s done through content matter in the area of business, management, marketing.

It is clear that simulations (Jones, 1982) should occupy the leading position among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business course proper if the goal is teaching o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imary aim of developing skills necessary for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business talks. In fact, simulations do as a rule occupy a very prominent place in programs and courses of this sort – such as simulations of Executive Board's meetings or of annual shareholders' meetings, simulations of negotiations concerning purchasing some equipment, getting loans and so on and so forth. But simulations ordinarily used in oral courses of Business English usually have two shortcomings that make them much less efficient than they could be.

First, these simulations are most often disconnected episodes in 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They stand apart, and are in no way connected either to one another by a common plot, participating personages etc. or to some real of imaginary life continuum. For instance, if in one class we have a simulation of business talks, it may have no meaningful relation to the following simulation of some other business talks in the next class. The idea was to connect all the simulations in the whole of oral business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Ukrainian-speaking adolescent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program has been functioning the city of Dnepropetrovsk.

long with 12 hours of classes principal courses.

Survival of Everyday English times a week. It is aimed at





course by a single plot with the same characters of business people passing from simulation to simulation. All the other communic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course were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is plot. For a business course, the plot itself would be most convenient to concentrate on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ing of some imaginary firm or company. If it is done in this way, all 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turns into some continuous simulation – some kind of an invented business activity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live and act during their English classes. Creation of such an invented, imaginary, fictitious but life-size business activity reality where everything is based o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may serve as a sort of substitute for a professional English-speaking setting. It will in a way compensate for the total absence of such sett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second shortcoming of traditional simulations is the fact that as a rule in each of them the situation of business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nditions, purpose etc. are set either by the teacher or by the author of teaching materials. It puts a limit to the “share” of learners’ own creative efforts in a simulation. This “share” would be much greater if the starting points, the circumstances, situations, conditions and purposes of business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were invented (imagin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 either individually or in group work. It would be especially helpful in continuous simulations described above. First, it would be easier for students to elaborate an on-going, developing plot than to invent something new each time. Second, in that cas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would not only live in invented business activity reality but this reality would be of their own invention and creation, in full accordance with their likes, inclinations, interests and needs. It strongly tasks learner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e abilities but makes learning fully learner-centered (Nunan, 1988).

Now a definition of what is an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 in an ora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may be formulated. It is such an organization of this course where all the teaching/learning process is developing as a practically uninterrupted modeling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 – these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on proceeding in the framework of almost life-like functioning of some imaginary firm or company. The conditions and process of functioning, purposes, everyday life and everything concerning this firm or company, as well as the firm or company itself, are invented (imagined) by students who in every continuous simulation are “actors”, “directors” and “playwrights”- all at once.

What follows is a description of how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re applied in practice – using as an example the o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urse already mentioned. This course presupposes teaching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in a number of business intercourse situations and on a number of topics. They include:

1. Business interviewing – getting to know the structure of a firm or company.
2. Business interviewing – getting information about management in a firm or company and hierarchy in its governing bodies.
3. Business interviewing – getting information about firm’s or company’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goods manufactured by it, touring a factory.
4. Business telephone communication.





5. Business negotiations – entering a business contact and stating purposes.
6. Business negotiations – getting and handling business information.
7. Business negotiations – coming to an agreement, making a deal, signing a contract, planning a joint project or venture.
8. Business discussion – discussing projects, budget and finances.
9. Business discussion – discussing business strategy, business results and competition.
10. Business discussion – discussing sales results and sales targets.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start with the first of these topics and situations and go on to the end of the course. As soon as the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hierarchy in a typical firm or company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teacher suggests to his or her students to organize their own firm or company deciding in what country this firm will function, what it will do, will it be a PLC or a partnership, what its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hierarchy will be, who will occupy what position in that hierarchy etc. It was surprising to see how quickly and enthusiastically the students caught at the idea and entered the game. For instance, in 1996/1997 academic year the students of the group where this approach was tried decided that they will organize their firm in an imaginary small sea-shore East European post-Communist country called Bacardia where market economy had just started developing. They invented the geography of that country, minerals and raw materials it possessed, and decided that their firm would exploit mineral water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and organize tourist business in it.

After deciding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 w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 should be, they organized elections electing people to the Executive Board, making nominations to different managerial positions etc. It was done in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discussing one another's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suitability for a certain job. They founded their conclusions not only on personal observations but also on the data taken from some filled in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uggested by the teacher and based on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Gardner, 1993). When the firm was thus "organized", its day to day functioning started. From now on every student acted in class only in his or her new "official role" of a Senior Vice-President, a Vice-President for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 Personnel Manager or any other.

First, a lot of thing had to be suggested by the teacher (what and how to discuss, in what situation etc.), but when the students, so to say, got the knack of it, all the initiatives became fully theirs. The teacher only set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alks and discussions when introducing new topics and materials, explaining, analyzing and training them.

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simulations every student had to play not only the stable permanent role of some official in the firm they had created but also many other "temporary" roles. For instance, when negotiations on getting loans for the new firm were held, the student who was the Vice-President for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remained in the same position while some other students played the temporary roles of bank managers with whom this Vice-President negotiated the issue of loans.

But more than half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simulations the students organized as meetings (Board meetings, departmental meetings, etc.). There different aspects of firm's business





activities were discussed, reports of people responsible for definite aspects were listened to and discussed, and certain decisions were taken. It is in these meetings that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were born. Such a task can best be described by an example. Suppose the meeting is devoted to developing the students' firm business strategy for the near future. In getting ready for the meeting every participant is requested to prepare her or his set of suggestions as to business strategy – taking into account her or hi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firm. The set of suggestions and their substantiation presented by every participant are to be discussed and criticized by other participants, i.e. critically analyzed. The purpose is finding weak and strong points and developing the firm's business strategy taking the best from different participants' suggestions.



Similar tasks can be found in almost any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 but what is called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here are only those where business information to be analyzed and criticized is supplied not by the teacher or the author of teaching materials but by students themselves. It is they who make efforts to get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store of their background knowledge, from what they have read, heard or imagined. So, the “share” of students' creative efforts in such tasks is much greater than in traditional ones.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can be most efficient, natural and suitabl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 where everything depends on learner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During continuous simulations students prepare a lot of their own materials such as papers for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drafts of meetings' decisions and proceedings, graphs, diagrams etc. They make the group's portfolio,

and on the basis of it the final product of continuous simulations is produced. It may be a firm's detailed prospectus or its annual report etc. So,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re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Project English (Hutchinson, 1994).

Advantages of the suggested approach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advantage that could be observed was the great motivational potential of the approach. Learners became very greatly motivated; their enthusiasm and interest were so great,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ften became so heated and life-like that one sometimes got an impression the firm invented and imagined by the students really existed and was functioning. So, quite a natural business activity setting had been created, and it certainly helped a lot in accelerat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fluency development.

The second advantage was the fact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had become to be largely regulated and controll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with the teacher turning into a facilitator (Rogers, 1983). Thus, learner-centering gets implemented with all it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its results.

Finally, to participate efficiently in imaginative continuous simulations and do critical analysis tasks, students, in preparing for classes, have to find (themselves or with the help of their teacher) quite a lot of supplementary material, to read them, and to do quite a lot of writing in English. Therefore, an oral course becomes a source of parallel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development. All these advantages make the approach a good aid to 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in a non-English-speaking setting.



References:

- ◆ Gardner, H. (1993).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 theory in prac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 ◆ Hutchinson, T. (1994). *Project English. 2. Student's 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Jones, K. (1982). *Simula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Nunan, D. (1998). *The learner centred curriculum: A study in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Rogers, C.R. (1983). *Freedom to learn for the 80's*.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Tagging the Bard: Evaluating the accuracy of a modern POS tagger on Early Modern English corpor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automatic part-of-speech (POS) anno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English texts. Techniques that were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modern English have been applied to numerous other languages over recent years. Despite this diversification, it is still almost invariably the case that the texts being analysed are from contemporary rather than historical sources. Although there is some recognition among historical linguists of the advantages of annotation for the retrieval of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other linguistic phenomena,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forms of annotation by automatic methods is problematic. For example, changes in grammar over time will lead to a mismatch between probabilistic language models derived from, say, Present-day English and Middle English. Similarly, variability and changes in spelling can cause problems for POS taggers with fixed lexicons and rule-bases.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and develop possible solutions, we decid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existing POS taggers, trained on modern English, when they are applied to Early Modern English (EModE) datasets. We focus here on the CLAWS POS tagger, a hybrid rule-based and statistical tool for English, and use as experimental data the Shakespeare First Folio and the Lampeter Corpus. First, using a manually post-edited test set, we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CLAWS when no modifications are made either to its grammatical model or to its lexicon. We then compare this output with CLAWS' performance when using a pre-processor that detects spelling variants and matches them to modern equivalents. This experiment highlights (i)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handling of orthographic variants is sufficient for the tagging accuracy of EModE data to approximate to the levels attained on modern-day text(s), and (ii) in turn, whether revisions to the lexical resources and language models of POS taggers need to be made.

1. Introduction

Annotation of corpora, that is "the practice of adding interpretative [and/or] linguistic information to a corpus" (Leech, 1997: 2), can be applied at a number of levels and by a variety of manual and automatic technique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s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information has a more explicit presence in the language form, the process of adding *linguistic* annotation is easier to automate than the process of adding *interpretative* information: put simply, there are formal traces which a computer can use to work out the category in which to place a chunk of



language. For example, words ending '-ness' are likely to be nouns, as are the word(s) following (though not necessarily immediately) the word 'the'. Complex probabilistic rules can be built up in order to achieve fairly accurate tagging. Social and pragmatic categories such as those presented in Archer and Culpeper (2003), on the other hand, are far less likely to be recoverable from the language form, and thus must be added manually: Archer and Culpeper (2003) have developed a system for adding social and pragmatic information to a text (in respect to the speaker and addressee's age, gender, role and status) utterance by utterance. In contrast, interpreta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soci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speakers 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venance of a written text) is usually given in file headers of corpora such as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The automatic annotation of historical corpora is also problematic: with standardised spelling, any given lexeme can be retrieved by the computer with ease, since each lexeme normally has just one associated word-form. However,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period, including the period in which Shakespeare was writing, each lexeme had word-forms characterised by variable spellings (see, for example Osselton, 1984). For example, for a computer to retrieve all instances of the word 'would' (a form that, in Present-day English, matches the lexeme one-to-one), the computer would have to match an array of forms including: *would*, *wold*, *wolde*, *woolde*, *wuld*, *wulde*, *wud*, *wald*, *vvould*, *vvold*, and so on. This means that any automated tagging program will fail utterly, as such programs rely - amongst other things - on matching words against lexicons. Even regularised editions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texts¹ present potential problems for analysis, such as morphological variants (e.g. 'tellest', 'telletth'), grammatical variants (e.g. 'ye', 'thou', 'thine'), orthographic oddities (e.g. 'wing'd' instead of 'winged', the lack of an apostrophe for the s-genitive, capitalisation practices), and archaic/obsolete forms (e.g. 'becalmed'). Naturally, these difficulties will have a knock-on effect for any subsequent corpus processing tasks,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word frequency lists, concordances, collocation statistics, and n-grams. However, our focus in this paper is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s caused for automatic corpus annotation tools and, in particular, part-of- speech taggers.

2. Background

Many existing historical corpora are available for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period: e.g. the Lampeter Corpus (1640-1740), Corpus of English Dialogues (1560-1760), the Helsinki corpus (Old,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and the Archer corpus (1650-1990, sampled at 50-year periods). In addition, vast quantities of new searchable textual material are being created in electronic form through large digitisation initiatives currently underway: see, for example, the Open Content Alliance², Google Book Search³,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⁴. These initiatives are largely focussed on historical or more recent out-of-copyright material. As well as image-based digitisation, transcription and OCR-scanning techniques are being used to produce text-based materials. Increasingly, researchers will carry out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complex retrieval tasks on this historical data (Nissim et al, 2004).

Part-of-speech (POS) tagging is perhap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corpus annotation: grammatical annotation can be useful in situations where you want to distinguish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particular word forms or identify all the words performing a particular grammatical function. For example,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the usage of the word 'house' as a verb (as in 'the specimens are now *hous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past participle of 'house' (i.e. 'housed') can



be tagged 'housed_VVN', the -ing participle 'housing_VVG', the -s form of the lexical verb 'houses_VVZ', and so on. If you want all the verbal forms of 'house' without doing separate searches, some wildcards will do the trick in principle, e.g. 'hous*_V*'. In practice, the exact query syntax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kind of corpus you are interrogating and the kind of software you are using (e.g. some programs have difficulty with the underscore). Alternatively, one might wish to see what kinds of word perform particular functions and their respective frequencies. Grammatical annotation could be used to retrieve all the verb forms in a particular text, and then one could compare these with the verb forms of other texts.

POS tagging software has been under development at Lancaster University since the early 1980s. The software in question, CLAWS (Garside and Smith, 1997)⁵, works on the basis of:

(1) a lexicon, including words (or multi-word units) and suffixes and their possible parts of speech, and

(2) a matrix containing sequencing probabilities (e.g. the likelihood that following an adjective there will be a noun), which is applied to each sentence to disambiguate words that could be several parts-of-speech, potentially.

CLAWS achieves 96%-97% accuracy on written texts, and a slightly lesser degree of accuracy on spoken texts (Leech and Smith, 2000).

Early grumbles about corpus annotation from a few (historical) corpus linguists seemed to be based on assumptions that the annotations were damaging the integrity – even purity – of the text, and this argument is still voiced for modern data (Sinclair

2004: 191). This is not a serious objection, as one can have multiple copies of a corpus and just annotate one of them, or a computer can easily hide most forms of annotation. However, most historical linguists working with corpora would recognize the value of grammatical annotation. It would enable one to track usage of particular grammatical categories (nouns, complementisers and passives, for instance), and their associated contexts, across time. Fourteen years ago, Kytö and Rissanen (1993: 1) wrote:

At present, the usefulness of our corpus is diminished by the absence of grammatical tagging. This means that all searches must be based on words, or their parts or combinations. Programs suitable for tagging historical text material are being developed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nd we hope to start applying these programs to some subsections of our corpus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obvious, however, that equipping the entire corpus with even a fairly simple grammatical tag system would, with our present resources, be a matter of years of hard work.

Here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Helsinki corpus, which includes Old, Middle as well as Early Modern English. In fact, from that time to the present, there has been much progress in creating POS tagged and grammatically parsed corpora. Kytö And Voutilainen (1995), for example, have back-dated the English morphosyntactic lexicon of the English Constraint Grammar Parser (ENGCG) before applying it automatically to tag a number of texts from the EmodE section of the Helsinki Corpus (e.g. 1500-1710). Durrell et al. (2006) have also adopted the approach of adding historical variants to the POS tagger's lexicon, in their application of the TreeTagger for POS annotation of the GerManC corpus. In addition, Anthony Kroch and Ann Taylor have released syntactically parsed versions of historical corpora, following the basic formatting conventions of the Penn Treebank (Santorini 1990): see, for example, The York-Toronto-Helsinki Parsed Corpus of



Old English Prose (YCOE), The York-Helsinki Parsed Corpus of Old English Poetry, the Penn-Helsinki Corpus of Middle English, second edition (PPCME2) and the Parsed Corpus of Early English Correspondence (PCEEC).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all these cases, parsing has involved a great deal of manual post-editing. Perhaps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tagging effort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earliest periods of English (the entire Old English corpus amounts to about 3 million words), corpora consisting of limited samples, or specific genres. Automated yet accurate procedures would, of course, allow for the tagging of far greater quantities of linguistic data.

Our efforts in this emerging research area centre on the VARD, or Variant Detector, tool, described previously in Rayson et al (2005, 2007). The VARD is designed to assist users of historical corpora in dealing with spelling variation, particularly in EModE texts. The tool, which is under continuing development, uses techniques derived from modern spell-checkers to find candidate modern form replacements for variants found within historical tex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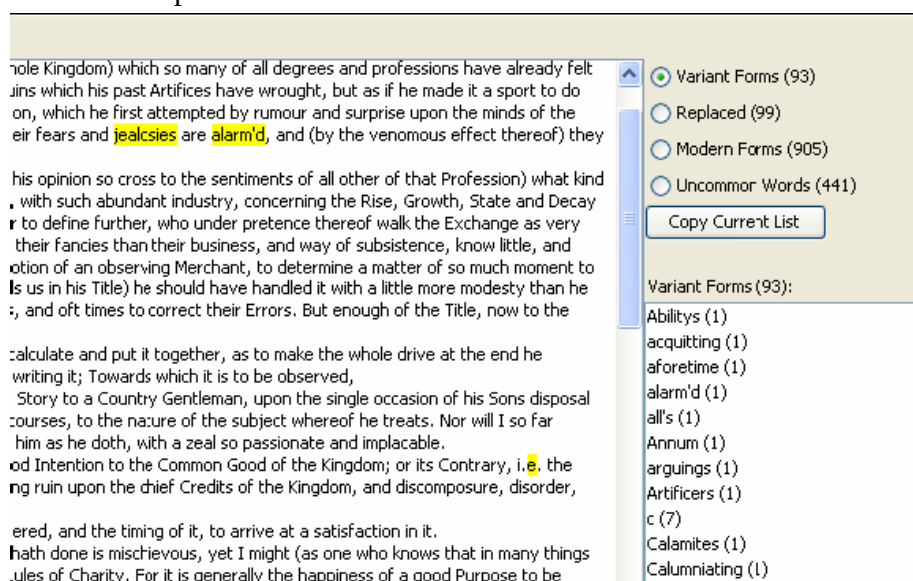


Figure 1: Screenshot showing the grouping of words by VARD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tool scans through a given text and marks any words which are not in its modern English word list as potential variants. In a recent addition, the tool also separates out any words which it considers uncommon into a separate list. This process is based on word frequency in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 (Leech et al. 2001). The search for uncommon words is the first step in finding variants which are graphically the same as a modern word form; future work will involve using context-sensitive information to find more of these variants. Once the text has been processed, the words found within a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variant forms, modern forms and uncommon words. Another group exists for replaced words; this is initially empty and populated during the later editing phase. Each group can be selected and the words within the group highlighted in the text. This is shown in Figure 1.

The VARD produces a list of candidate replacements for each variant form found. To do this, it uses (a) a manually created list of variants mapped to modern form replacements, (b) the SoundEx algorithm, and (c) letter replacement heuristics. Each candidate is then given a confidence measure based on which methods were used to find it, as well as the Levenshtein Distance between the variant and the replacement. The candidates are then ranked by this confidence measure and



offered to the user for consideration. If the confidence measure for two candidates is the same, the replacement with the higher frequency (within the BNC) is preferred.

A user can make their way through a text, right-clicking on any highlighted variant to be presented with the list of candidate replacements. Clicking on an offered replacement changes the variant to the modern form selected.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he variant form is never discarded. In the output file it is placed inside an XML tag, and juxtaposed with the modern replacement form, as follows:

```
my very <replaced variant="lippes" found by="ps" replacementType="pr"
ed="2">lips</replaced> might freeze to my teeth
```

The process of replacing a variant is shown in Figure 2. As can be seen, the tool displays how it arrived at the confidence measure by indicating which methods were used to find the replacement (shown with ticked options in the pop-up wind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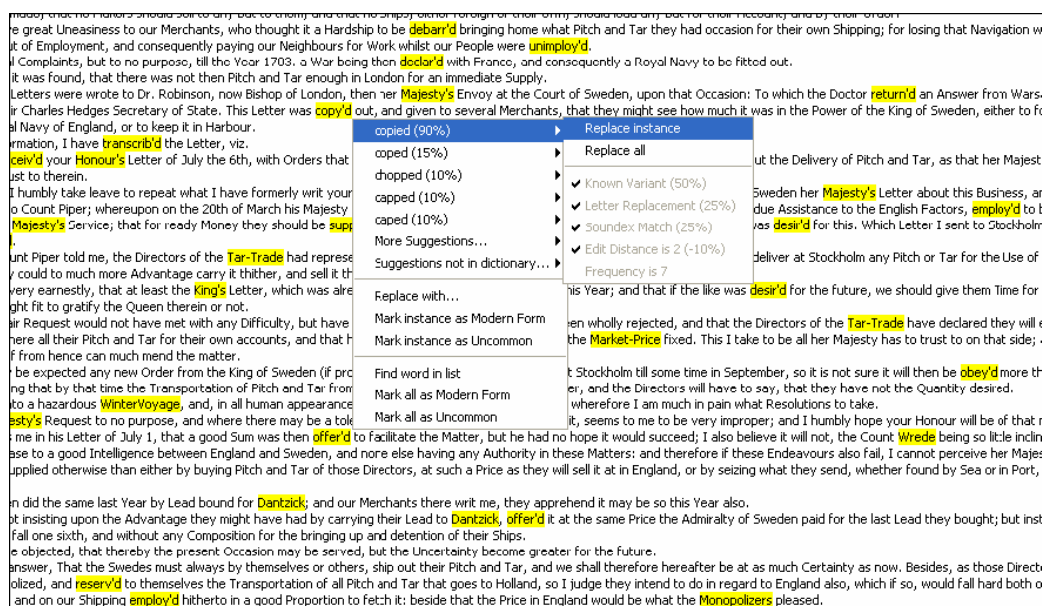


Figure 2: Screenshot showing a user selecting a replacement for a variant

As well as manually selecting and discarding the variant forms, the user can instruct the tool to automatically replace any variant form with its highest ranked candidate replacement. The user can also provide a threshold confidence measure, which is the minimum score the candidate replacement must reach for it to be used. By using this feature with a relatively high threshold, the user can automatically replace the most common variant forms, thereby saving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time.

VARD now has a much larger dictionary than that used for previous experiments. The decision was taken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dictionary (currently 26,071 entries) as, previously, many modern words were being incorrectly marked as variants. The increased size of the dictionary has resulted in some problems, however. Variant forms such as *bee*, *doe* and *wee* (*be*, *do* and *we*) are no longer marked as variants, because the enlarged dictionary now includes other lexemes that happen to share these wordforms as their "standard" form. This, in part,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ncommon words group as described above. A user can scan this list for potential variant forms. It is better to have such words marked as uncommon rather than variants, as it could be the case that

bee, doe or *wee* is the correct modern form. In our future work, we will focus on the use of context-based template rules to disambiguate such "real-word" variants in historical texts.⁶

A further function recently added to the tool, which was not available for previous experiments, is the ability to join two words separated by white space. This allows the user to deal with cases where a variant form of a modern word is split into two separate words (e.g. to *morrow*, *some one*, *your selfe*), and words split over line breaks. Words split over two lines are fairly frequent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as this is one strategy that compositors used to avoid "ragged right".

From earlier tests regularising the spelling of historical texts with the VARD program, we can reasonably expect the error rate to be at acceptable levels. Archer et al. (2003) provide information on POS error rates for two texts dating from 1654, totalling approximately 9,804 words. When the texts were not regularised, 170 POS errors were reported (1.7%), of which 146 were due to variant spellings; when they were regularised, this dropped to 76 POS errors (0.8%), of which 66 were due to variant spellings. However, these figures are not as good, perhaps, as they may sound, since they represent errors reported by the program.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were other errors that went unreported. The study we report here includes careful manual checking of all experimental data, not just the errors retrieved. In addition, one might also argue that, by 1654, the standardisation of spelling was well underway, and so the challenge for regularising spelling is less than that represented by our Shakespearean texts.

3. Data for the experiment

Shakespeare's style might be said to vary along two key dimensions: (1) genre (i.e. the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comedy, tragedy or history), and (2) period (by this we mean the

way in which his style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his lifetime; indeed, it is sometimes considered by scholars to contain four phases). Unfortunately, Shakespeare clearly did not have the corpus linguist in mind when he produced his plays, as he did not write all genres in all periods, allowing one to fully explore both dimensions. We have selected plays from one genre, comedies (as classified in the First Folio),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genre that covers his entire writing career (1584- 1613). The particular plays are *Taming of the Shrew*, *Love's Labour's lost*, *Merry Wives of Windsor*, *Twelfth Night* and *Tempest*. These plays have been selected so as to evenly span his writing career (though the exact dating of the some of the plays is controversial). However, given that orthography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us, the key date is when they were printed. All plays are from the First Folio printed in 1623 (sourced from the Oxford Text Archive⁷). Note that comedies tend to be amongst the most conversational and speech-like historical data, something which is likely to present POS tagging with further difficulties (e.g. ellipsis).

In addition to the Shakespeare data, we selected three files from the Lampeter corpus to provide a contrast and a further test in the experiment. The Lampeter corpus contains transcribed versions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as tracts or pamphle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For each of six domains, there are two texts per decade contained in the corpus. In our experiment, one file was selected from three domains: economy and trade (eca1641), law (lawa1643) and science (scial1644). All three fil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earliest decade sampled in the corpus, i.e. 1640s, to provide a greater challenge than that attempted in our earlier work (Archer et al. 2003). Siemund and Claridge (1997: 64) report that the Lampeter corpus "retains the original

orthography, punctuation and word divisions".⁸

For each of the texts, we selected 1,000-word samples for analysis. Although this is a relatively small amount, it was felt that this would provide a sufficient sample for estimation of POS tagging accuracy while still remaining manageable for manual checking within the limited time available. The word count feature within Microsoft Word 2003 was used for the selection. We used a random line position⁹ in the text to begin the sampling and then selected a minimum of 1,000 running words including up until the following speaker change or end of the sentence. We did not count speaker names and we removed line number markers, which appear in the Shakespeare corpus files. We opted to keep any stage directions in the Shakespeare files to be analysed. Following this process, we selected 5,011 words from the five Shakespeare files and 3,025 words from the three Lampeter files.

4. Evaluation

The experimental set up was as follows. For each 1,000-word sample, we applied the following process, which is represented graphically in figure 3:

1. Apply automatic POS annotation using the CLAWS software with the standard modern-language linguistic resources
2. Manually post-edit the POS tags in the tagged versions resulting from step 1 to produce a gold standard (or baseline) for comparison
3. In parallel to step 2, run the untagged text through VARD, and automatically select modern equivalents over 70% likelihood¹⁰
4. Apply automatic POS annotation to the texts resulting from step 3
5. In parallel to steps 2 and 3, manually check the untagged text and insert modern equivalents alongside EmodE variants
6. Apply automatic POS annotation to the texts resulting from step 5
7. Compare results pairwise from steps 1 and 2 (to check baseline accuracy), then steps 2 and 4 (to check if there is any improvement in accuracy using automatic VARD), then steps 2 and 6 (to check how much improvement we could achieve using a 'perfect' VARD)

The resulting accuracy rates are displayed in Table 1. Compared to the reported accuracy figures for CLAWS on modern standard British English (96-97%),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rop in performance on the EModE data. We have listed the gold standard versions without an accuracy figure since they have been manually post-edited and could be assumed to be virtually free from err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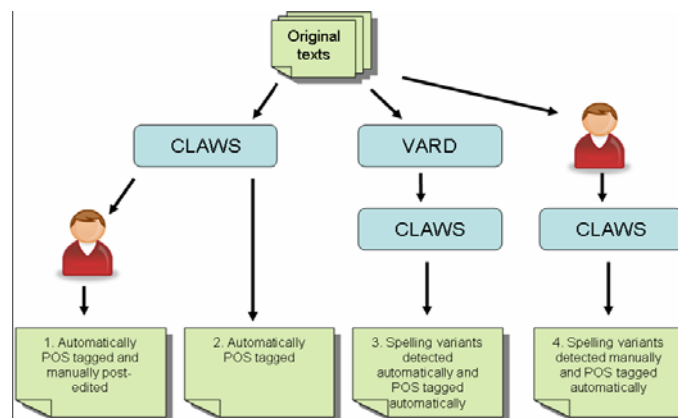


Figure 3: Annotation and manual checking process

	POS tagging accuracy	
	Shakespeare	Lampeter
1. Gold standard (manually post-edited)	n/a	n/a
2. Automatically POS tagged only	81.94%	88.46%
3. Variant spellings automatically modernised	84.81%	89.39%
4. Variant spellings manually modernised	88.88%	91.24%

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 tagging accuracy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nual correction of POS tags, we encountered a few instances where it was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correct POS tag. In the example listed in (1), it is debatable whether *Lunaticks* is an adjective or noun. It is attributive in function, and the complement of a singular verb (in parallel with *this is madde*), suggesting an adj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its inflection suggests a plural noun, and only the plural noun usage is listed in the online OED.

(1) Why, this is Lunaticks: this is madde, as a mad dogg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In (2), *Auant* is almost certainly a variant of *avaunt*, but its grammatical wordclass is less clear-cut. Its meaning essentially seems to be connected to the sense 'to be off, go away, depart' (OED *avaunt* v.2); it could be construed as an imperative form of the verb, or as an interjection (OED *avaunt* adv., int.):

(2) Auant perplexitie: What shall we do, If they returne in their owne shapes to wo?

(Love's Labour's Lost)

The number of unresolved cases was extremely small, representing fewer than 0.1% of all words. These few instances have been excluded from the experiment. For the most part, it was possible to apply our existing set of guidelines for POS-tagging¹¹ without difficulty. This lends some support to the widely held view that – at the syntactic level –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not changed substantially since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n the case of the Shakespeare data, the unaltered text results in a reduction of CLAWS accuracy to just under 82%. With an automatic modernisation of spelling variants using VARD, this increases by almost 3%. There appears to be a ceiling to the accuracy even with manual modernisation of spellings, with another 4% increase in accuracy to just under 89%. At first glance, we might note that this is still around 8% removed from the reported CLAWS accuracy. However, we should note that, given the difference in style/genre, a more accurate comparison would be to CLAWS' accuracy on modern plays, and legal, scientific and business writings.

Examining the results for the Lampeter data, we see that the initial reduction in accuracy is not as striking as it is with the Shakespeare data. The accuracy rate for running CLAWS over unedited Lampeter data was 88.46%. With an automatic pre- processing step inserting modernised forms, the accuracy rate improves by almost 1%. With a manual process of checking for EmodE variant spellings, we observed another 2% increase in POS tagging accuracy.

There are two clear effects at work here which result in the Lampeter data being less problematic for CLAWS than the Shakespeare samples. First, the Lampeter corpus samples date from at least two decades after the Shakespeare First Folio was printed, and thus are more "standardised". Second, there is the difference in grammatical style in the genres selected from the

Lampeter corpus: in general, texts in the latter are written in a form of expository prose that is stylistically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day mainstream varieties of text, i.e. the kind of data that CLAWS' language model has been derived from.

Closer inspection of the Lampeter data highlighted an additional problem facing automatic spelling regularisation for this period, namely code-switching between English and Latin. At the end of one of the Lampeter text samples there appears a passage of Latin, which CLAWS failed to identify with its 'FW' (foreign word) tag. If we were to remove this passage from the experiment, the fourth accuracy figure reported in Table 1 would have been higher still (93.22%)

Table 2 shows some typical examples of mistagging due to spelling variants, as well as correct tagging in spite of spelling variants.¹²

Example	Comments
with your_APPGE sweete_JJ breathes_NN2 puft_VVN out (Love's Labour's Lost)	<i>sweete</i> , <i>breathes</i> and <i>puft</i> are correctly tagged despite being variants for <i>sweet</i> , <i>breaths</i> and <i>puffed</i> respectively
it is leggs_NN2 and_CC thighes_VVZ (Twelfth Night)	<i>leggs</i> (<i>legs</i>) is correctly tagged <i>thighes</i> (<i>thighs</i>) is mistagged as a verb rather than a noun
Be not deni'de_NN1 accesse_NN1 (Twelfth Night)	<i>deni'de</i> (<i>denied</i>) is mistagged as a noun rather than a verb (past participle); <i>accesse</i> (<i>access</i>) is correctly tagged as a noun
I_PPIS1, 't is strong (Twelfth Night)	<i>I</i> (<i>aye</i> meaning yes) mistagged as a personal pronoun
the Razors_NN2 edge (Love's Labour's Lost)	<i>Razors</i> mistagged since apostrophe is missing (<i>Razor's</i>) from genitive
but your_APPGE selfe_NN1 (Love's Labour's Lost)	<i>yourself</i> incorrectly tokenised as two separate lexemes rather than a singular reflexive personal pronoun
Ile_JJ ride_NN1 home to_II morrow_NNT1 (Twelfth Night)	<i>Ile</i> incorrectly tokenised as one word, tagged as adjective, <i>ride</i> tagged as noun (rather than verb); <i>tomorrow</i> incorrectly tokenised as two words: a preposition plus a time noun

Table 2: Examples of mistagging and spelling variants

There we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where CLAWS correctly tagged the word despite it containing some sort of spelling variation. Of the total number of words in the Shakespeare sample, 5.78% were variants which CLAWS tagged correctly. CLAWS is robust enough in these cases to guess the correct tag using its probabilistic model, and heuristics such as common patterns of word endings.

However, as can be seen, for the Lampeter data and to a greater extent for the Shakespeare data,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POS tagging accuracy for both of the historical datasets compared with modern data. We have also shown that a large part of this reduction in accuracy was due to spelling variation. The last example in Table 2 illustrates, moreover, that some of these errors are consequential: it is because CLAWS thinks *Ile* is an adjective (JJ) that it assigns to the word *ride* the tag for singular common noun (NN1). Resolving the first of these errors would naturally eliminate the error on the second.

5. Conclusion

In previous studies that have relied on the automatic detection of problems, we have reported that POS-tagging accuracy (for example in CLAWS) is affected by spelling variants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see, for example, Archer et al. 2003). In the research reported here, we have carried out a more detailed study of variant spellings with a full manual analysis. We have also extended the previous study to encompass data from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period that is representative of an earlier phase 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sation of spelling (i.e. the Shakespeare corpus).

In the Shakespeare data, we observed a reduction in POS tagging accuracy from around 96% to 82%. We also showed that insertion of modern equivalent spellings alongside EmodE variants help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OS-tagging such data. The ceiling for such an improvement is around 89% accuracy. The effect of spelling variation was less marked in the Lampeter corpus samples of expository prose dating from the 1640s.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accuracy to around 88.5% with a ceiling for improvement, if all spelling variants are detected, of 93.2%.

In future work, we intend to continue implementing improvements to the automatic variant spelling detection system (VARD). Crucially, we aim to incorporate contextual rules to detect EmodE variants that are otherwise undetected, since they appear in a modern lexicon (see, for example, 'then' for 'than' and vice versa). We also need to carry out similar experiments on the same data employing higher levels of annotation, e.g. semantic tagging. Our existing semantic tagger is a knowledge-based tool which exploits a large lexicon. As such, it is not as robust as the probabilistic approach used by CLAWS (see Piao et al., 2004). The semantic tagger can not guess the semantic field of a word from its immediate neighbours (using the probabilistic HMM technique) or other surface clues (such as the suffix rules employed in CLAWS).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annotation tools by pre-processing variant spellings, further key considerations are altering the existing taxonomies so that they can be applied in an historical context, by, for example: (i) changing the POS tagsets embedded within our POS taggers to reflect changes in grammar over time (Britto et al., 1999; Kytö and Voutilainen, 1995), and (ii) adapting the sense distinc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of modern semantic tagsets to accommodate changes in meaning over time (Archer et al, 2004).



Acknowledgements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thank Jeremy Bateman for his assistance in the manual post-editing of POS tags. The work described here was partly funded during a small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the British Academy (entitled "Scragg Revisited").

References

- ◆ Archer, D. and Culpeper, J. (2003). Sociopragmatic annotation: New dire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in historical corpus linguistics. In: A. Wilson, P. Rayson and A. M. McEnery (eds.) *Corpus Linguistics by the Lune: A Festschrift for Geoffrey Leech*. Peter Lang: Frankfurt/Main, 37-58.



- ◆ Archer, D., McEnery, T., Rayson, P., Hardie, A. (2003). Developing an automated semantic analysis system for Early Modern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rpus Linguistics 2003 conference. UCREL, Lancaster University, pp. 22 - 31.
- ◆ Archer, D., Rayson, P., Piao, S., McEnery, T. (2004). Comparing the UCREL Semantic Annotation Scheme with Lexicographical Taxonomies. In Williams G. and Vessier 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EURALEX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Lexicography) International Congress (Euralex 2004), Lorient, France, 6-10 July 2004. Université de Bretagne Sud. Volume III, pp. 817-827.
- ◆ Biber, D., Finegan, E., and Atkinson, D. (1994). ARCHER and its challenges: compiling and exploring a representative corpus of historical English registers. In Fries, U., Tottie, G. & Schneider, P. (eds) Creating and Using English Language Corpora. Amsterdam: Rodopi, pp. 1-14.
- ◆ Britto, H. Galves, C., Ribeiro, I., Augusto, M., and Scher, A. (1999). Morphological Annotation System for Automatic Tagging of Electronic Textual Corpora: from English to Romance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Santiago, Cuba, pp.582-589.
- ◆ Garside, R. and Smith, N. (1997). A Hybrid Grammatical Tagger: CLAWS4, in Garside, R., Leech, G., and McEnery, A. (eds.) Corpus Annotation: Linguistic Information from Computer Text Corpora, Longman, London, pp. 102 – 121.
- ◆ Kytö, M. and Rissanen, M. (1993).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issanen, M., Kytö, M., and Palander-Collin, M. (eds.) *Early English in the computer age: explorations through the Helsinki corpus*.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pp. 1-17.
- ◆ Kytö, Merja and Voutilainen, Atro (1995). Applying the Constraint Grammar Parser of English to the Helsinki Corpus. *ICAME Journal* 19, pp. 23-48.
- ◆ Leech, G. (1997) Introducing Corpus Annotation. In Garside, R., Leech, G., and McEnery, A. (eds.), *Corpus Annotation: Linguistic Information from Computer Text Corpora*. Longman, London, pp. 1 – 18.
- ◆ Leech, G. and Smith, N. (2000). *Manual to accompany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Version 2) with Improved Word-class Tagging*. Accessed 22nd June 2007. http://www.comp.lancs.ac.uk/ucrel/bnc2/bnc2postag_manual.htm
- ◆ Leech, G., Rayson, P., and Wilson, A. (2001). *Word Frequencies in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based on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Longman, London.
- ◆ Mueller, M. (2005). The Nameless Shakespeare. *Working Papers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Canadian Symposium on Text Analysis Research (CaSTA)*. Computing in the Humanities Working Papers (CHWP 34).
- ◆ Nissim, M., Matheson, C. and Reid, J. (2004). Recognising Geographical Entities in Scott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at SIGIR 2004*.
- ◆ Osselton, N.E. (1984). Informal spelling systems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1500- 1800. In N.F. Blake and C. Jones (eds.)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tudies in development*. The Centre for English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pp. 123-137.
- ◆ Piao, S. L., Rayson, P., Archer, D., McEnery, T. (2004). Evaluating lexical





resources for a semantic tagger. In *proceedings of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LREC 2004)*, 26-28 May 2004, Lisbon, Portugal, Volume II, pp. 499-502.

- ◆ Rayson, P., Archer, D., Smith, N., (2005). VARD versus WORD: A comparison of the UCREL variant detector and modern spellcheckers on English historical corpora. In *Proceedings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5*, Birmingham University, July 14-17.
- ◆ Rayson, P., Archer, D., Baron, A. and Smith, N. (2007). Tagging historical corpora - the problem of spelling variation. In *proceedings of Digital Historical Corpora, Dagstuhl-Seminar 0649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omputer Science, Schloss Dagstuhl, Wadern, Germany, December 3rd-8th 2006. <http://drops.dagstuhl.de/opus/volltexte/2007/1055/>
- ◆ Santorini, B. (1990). *Part-of-speech tagging guidelines for the Penn Treebank Project. Technical report MS-CIS-90-47*,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 Siemund, R. and Claridge, C. (1997). The Lampeter corpus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Tracts. *ICAME Journal*, 21, pp. 61-70.
- ◆ Sinclair, J. (2004) (edited with R. Carter) *Trust the Text: Language, Corpus and Discour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otes:



¹ For example, the nameless Shakespeare (Mueller, 2005)

² <http://www.opencontentalliance.org/>

³ <http://books.google.com/>

⁴ <http://eebo.chadwyck.com/home>

⁵ CLAWS is the Constituent Likelihood Automatic Word-tagging System. More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full C7 tagset used here, can be found at <http://ucrel.lancs.ac.uk/claws/>.

⁶ A related problem is the frequent interchanging of *then* and *than* in earlier stages of English. Again we intend to apply context-based rules to identity the modern-day equivalent.

⁷ <http://ota.ahds.ac.uk/>

⁸ We also considered using data from the Archer corpus (Biber et al. 1994) in our experiments. However, we found that in this corpus the original orthography is retained for some texts, but normalized (often silently) for others. As such, it is not ideal for our purposes here.

⁹ Generated from <http://www.random.org>

¹⁰ The figure of 70% was selected from earlier trials as a good cut-off point to balance precision and recall

¹¹ Guidelines for wordclass tagging (based on Present Day English) are available on the UCREL website: http://www.comp.lancs.ac.uk/ucrel/bnc2sampler/guide_c7.htm

¹² POS-tags used in these examples are: APPGE (possessive form of personal pronoun), JJ (adjective), NN2 (plural common noun), VVN (past participle), VVZ (present tense lexical verb, 3sg.), NN1 (singular common noun), PPIS1 (personal pronoun, 1sg., nominative), II (preposition), NNT1 (singular temporal noun).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法 学 动 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 立法动态 ✧ 信息安全条例列入国务院今年立法计划 ➤ 法治论坛 ✧ 我国证券服务业开放的路径选择 ➤ 法学教育 ✧ 大学生要学会追根究底
2008年4月	第2期 [总第十九期]

立法动态

信息安全条例列入国务院今年立法计划

- 网络调查显示，九成人遭遇过个人信息被泄露
-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法学专家建议，设立“侵害个人信息罪”

“您好，我是城市酒店联盟的，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贵宾会员，您将可以享受打折优惠……”前几天，记者接连接到类似的电话，使人烦不胜烦。

事实上，遭遇类似烦恼的远不止记者一人：有人买了新居，还没等搬进去，就天天有电话问你装不装修；车险还没到期，若干个保险公司就开始“关心”你……

烦恼之余，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信息是如何泄露的？泄露个人信息，该当何罪？

记者从国务院法制办获悉：与保护个人信息相关的《信息安全条例》已列入国务院2008年二类立法计划，正在抓紧研究制定。

个人隐私成了公共资源

●一些商家或个人出售个人信息获利

前不久，人民网开展了一次有关个人信息泄露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网友曾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有94%的网友认为，当前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据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明蓉调查，个人信息泄露渠道广泛：一些商家或个人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注册、会员登记等方式收集用户信息；消费者在就医、求职、买车、买房、买保险，或办理各种会员卡、优惠卡或银行卡时填写的个人信息被出售；网络登录申请邮箱、注册进入聊天室或游戏厅时填写的个人信息被非法搜索或链接；名片代印机构储存的大量个人信息被泄露；物业泄露业主信息；废旧电脑磁盘恢复数据等等。

记者调查也发现，一些商家或个人专门通过搜集他人信息，用来出售从中获利。他们或是利用自己的朋友网络，请朋友提供单位同事或周围其他人的个人信息，或是自行套取，通过问卷调查、会员登记等方式收集用户姓名、职业、年龄、住址、电话号码等信息。





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兴起的商业信函公司,就是通过收集、买卖用户“名址库”来赢利的。此外,人们在申请电子邮箱、注册进入聊天室或游戏厅时填写的个人信息,也有可能被泄露。

在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被媒体曝光的“分众事件”,揭开的黑幕让人触目惊心:仅一个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就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信息。该公司对机主的信息进行详尽分类,细致到机主的性别、年龄、消费水平等,以“精确”发送“广告”短信到个人。

信息的流失,让个人隐私成了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成了“透明人”。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法律出现空白

●代表委员呼吁打好“补丁”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我们现在的法律也偶有涉及。

现阶段,我国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在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中设置条款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如居民身份证法、护照法、传染病防治法等。

——通过信息控制人的单方承诺或特定行业的自律规范的承诺,对个人信息加以自律性质的保护。

此外,根据《宪法》、《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个人的信息资料属个人隐私,在无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向社会公开和传播。

然而,仅靠这些法律法规的粗略规定,仍然难以落实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犯、不被滥用的权利。打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补丁”,填补立法空白,屡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有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相关建议、议案和提案。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认为,从我国现有的管理格局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停留在各行业内部的规范上,哪个领域问题多就先管、多管。从现实看,当前最需要的是加紧推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的研究和制定。

专家建议加上刑罚处置

●遏制信息发布者的利益动机

早在2003年,国务院信息办就委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课题组承担《个人数据保护法》比较研究课题及草拟一份专家建议稿。经过近两年的工作,最终形成了近8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

据课题组负责人周汉华研究员介绍,在这份专家建议稿中,个人的手机号码、家庭住址、医药档案、职业情况等任何可以确立特定个人的信息都列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如果侵害他人信息可能会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是刑事责任。而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侵犯他人名誉权只能承担民事责任,而且往往是在被对方告上法庭后才会承担民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是一项宪法权利而非普通的民事权利,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要借鉴其他国家好的经验,配置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有机结合的体系。”周汉华说。

提出追究侵害他人信息“刑事责任”的,并非周汉华一人。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学东提出,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设立“侵害个人信息罪”,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也认为,在国外侵害个人信息可能会判2至3年刑,而目前我国对泄露个人信息资料的处罚还停留在数额不高的罚款上。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杨伟程也认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必须明确个人信息犯罪的刑事责任,对各类“泄密”行为,如泄漏股民信息的恶劣事件,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不管怎样,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曙光已现:《信息安全条例》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保障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的“电信法草案”也已列入国务院2008年一类立法计划,成为力争年内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

来源: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记者:石国胜 发布时间:2008年04月16日

法治论坛

我国证券服务业开放的路径选择

蔡奕 副研究员、法学博士、西方证券法博士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法学研究员

一、路径选择的核心:外资准入的待遇标准

东道国对外资进入本国证券服务业持何种待遇标准,直接关系到行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和效果:持严格准入待遇标准(如保护主义)的国家,其产业对外资开放的力度较小,开放的步骤选择较为审慎,对外资准入和持续经营的监管较为严厉;持宽松准入(如单方优惠)的国家,其产业对外资开放的力度较大,甚至达到“门户洞开”的不设防状态,对外资准入和持续经营的监管较为宽松;持平等准入待遇标准(如国民待遇)的国家,对内外资准入基本一视同仁,适用同等的待遇标准,奉行非歧视原则,内外资在准入和持续经营监管标准上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一) 外资准入待遇标准综述

目前国际化通行的外资准入待遇标准主要有保护主义、单方优惠、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对等互惠五种,分别介绍如下:

1. 保护主义

所谓保护主义准入待遇,是指在对证券服务业的准入监管中,将重点放在保护本国证券服务业免受外来控制或干扰上,从严审核,限制准入。保护主义分为绝对保护主义和相对保护主义(有限保护主义)。前者对外国投资者持排斥态度,完全禁止其进入,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之门外的极端作法,所受国际压力极大,也阻碍了本国证券业的对外交流与发展,故采取这种准入标准的国家越来越少;后者采取务实的态度,仍以保护本国证券服务业为主旨,有限度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辅之以严格的管制、限制措施,以避免外资对本国证券业造成冲击。采取相对保护主义的国家多以地域试点、股权比例限制、业务限制或金融管制等手段来抵消外资对本国证券业的负面影响。

2. 单方优惠待遇

与保护主义相反,单方优惠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其境内的外资证券服务机构单方面的优惠待遇,不以受惠国对等互惠为条件,也允许外资证券机构从事国内证券机构所不能从事的某些业务,或在其它方面给予优惠。这种待遇是东道国为了吸引先进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利用外资发展本国金融业而采取的优惠措施。

3. 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又称平等待遇,是指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与本国资本相同的准入待遇标准,即在进入证券服务业、参与证券业务问题上,奉行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标准。国民待遇奉行非歧视和竞争机会均等原则,





有积极意义,但国民待遇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如果内外资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则国民待遇非但无助于平等竞争,反而会对东道国本土证券机构的成长造成威胁。

由于证券业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处于劣势,发展中国家普遍设置了准入“安全阀”,限制外资的准入,同时对本国资本进入国内金融市场业务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国民待遇意味着外资可与东道国国内资本一样,以同等条件获得东道国资本市场的准入资格,并享有同等的权利。外资势必如洪水猛兽,大举进入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证券机构难以匹敌,必然在竞争中遭受巨大的损失,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准入待遇问题上多对国民待遇持排斥态度。

4. 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一项技术性待遇,不涉及内外资待遇的比较问题,而是强调外资之间待遇的平等,通常出现在国际条约中。最惠国待遇又称非歧视待遇,通常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投资、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最惠国待遇可分为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最惠国待遇两种。前者指缔约国的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第三国的一切优惠,应无条件地、无补偿地、自动地适用于缔约国的另一方。后者指缔约国的一方现在或将来给予第三国的优惠,缔约国的另一方必须提供同样的补偿,才能享受。

5. 对等互惠

对等互惠待遇是一项常见的国际法待遇准则,一般是指一方国家或国民在受到另一方国家给予的一定待遇时,也给予另一方国家或国民同等的待遇,如此即可以保证双方从对方获得的利益处于均衡状态。对等互惠待遇在准入问题的处理上,有形式对等待遇和实质对等待遇之分。前者表现为,在考虑外资进入本国市场时,只要他国愿意或者已经允许本国的资本在其境内建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无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开展何种业务,则来自该外国的资本便可以被允许进入本国的证券市场。后者则表现为,对外资的进入数量、组织形式、地域限制及业务范围等各方面一律采取严格的对等条件,即所谓的“镜像互惠”(Mirror-Image Reciprocity)标准。

(二) 构建我国外资准入待遇标准的建议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普遍适用互惠待遇、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则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及开放程度、国内金融体系的发育程度、金融监管的完备程度和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等诸方面的考虑,多采用保护主义、单方优惠及其组合。

我国证券业“新兴加转轨”的特殊发展态势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背景决定了我国对待外资进入证券服务业也应该采取一种混合的待遇标准,即兼采保护主义、单方优惠、国民待遇、对等互惠等众多的待遇标准。

1. 保护主义:按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证券服务业无疑属于“弱质产业”,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予以适当的保护。这些保护措施可以通过业务试点、股权比例限制、业务限制和较高的监管要求来实现。

2. 单方优惠:为了吸引外资进入某些金融业务领域(如不良资产处置、劣质公司重组)或国内机构所不愿参与的业务领域,有必要给予其某些优惠待遇,如放宽准入条件、给予税收优惠等。

3. 国民待遇:国民待遇是我国证券服务业开放的发展方向,但只能渐进式的实现。在内外资竞争比较充分,内资有能力与外资抗衡的领域,如基金业,可以考虑实行国民待遇。在机构的登记设立、信息披露、监管处置等程序性环节,也可以考虑实行国民待遇。

4. 对等互惠待遇:我国证券业开放不仅面临“请进来”的问题,也面临着“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问题,在这一环节上,对等互惠待遇可以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如果东道国给予我国证券机构不公平的准入待遇,我国可以“对等互惠”为由拒绝该国证券机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准入申请。





二、证券业开放的组织路径：准入机构组织形式的比较与选择

证券业开放的组织形式，特指外资以世贸组织规定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方式进入东道国提供证券服务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包括分公司、子公司、合资公司、代表处等组织形式。

（一）准入形式的具体分析

代表处、分公司、现地法人和合资公司是外资准入的主要形式，四种准入形式各有其特点，现分析如下：

1. 代表处

代表处是外资机构驻在东道国的代表机构，只从事调查、咨询、联络和情报收集工作，不从事任何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因此对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没有实质性影响。外资代表处不得从东道国境内获得任何收益，代表处的一切费用必须由其总部从国外汇入。因此代表处是外资进入东道国证券业的最低形式，东道国允许设立代表处往往意味着东道国金融开放步伐的启动，具有政策性的标志意义。作为外资而言，代表处的设立也有助于其了解当地市场情况，为其营业性证券机构的准入做好准备。

2. 分公司

分公司是最受外资青睐的准入形式，其原因有三：首先，外资对分公司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可通过分公司顺利实现其全球经营策略，而无需担心因股权比例配置所产生的控制力减弱问题；其次，分公司是跨国公司全球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营上可获得总公司的鼎力支持，突出表现在分公司可运用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的资金，而子公司或合资公司只能动用其自有的资本金；再次，分公司不是东道国的法人，可拥有自身的经营技术和管理诀窍，并在某些方面可规避东道国的法律管制，是从事综合证券业务的理想形式。

而东道国对证券分公司的态度则不同。分公司是外资机构在东道国开设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因此分公司只是外资证券经营机构在东道国的实体延伸，其法律责任全由外资机构总部承担。分公司的生存能力和经营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两个条件：一是总公司的经营状况，二者具有一体化的利害关系，若公司整体运营状况良好，则分公司就能有长足发展的后盾；反之，若总公司经营失败，分公司亦随之倒闭。二是母国的有效监管，分公司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母国对总公司的监管程度，若母国监管不力，则总公司和分公司均会陷于莫名的风险之中。以上两个因素都是东道国所无法控制和预防的，因此，东道国总体而言对分公司持从严准入的态度。

3. 子公司（现地法人）

子公司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在东道国内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东道国可将其纳入本国法制的调控范围，可以采取适用于本国其它证券公司的监管手段如资本要求、检查、审计、业务限制等措施以确保子公司的安全稳健经营。与分公司不同，东道国不甚关心外资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母公司的破产倒闭会导致子公司的股权变更，但对子公司的安全稳健经营不造成实质性影响。鉴于上述原因，与分公司相比，东道国对子公司一般持宽松的准入态度，子公司的经营待遇也明显优于分公司。

4. 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是由东道国金融机构和外国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合资证券公司，具有东道国法人资格。合资公司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子公司，由于有东道国金融资本的参与，许多东道国对其施予特殊的优惠待遇和法律保护。

合资公司是一种折衷的准入形式，对外资和东道国均有不少好处。外资以合资方式进入东道国证券市场，有助于了解当地情况和利用当地便利条件，开发和占领新市场，还可享受东道国给予合资企业的多种优惠待遇；东道国以合资方式吸引外资进入，有助于减少因外国金融资本过于强大而引发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对国内证券市场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还有助于引进外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增强





国内证券业的竞争力。因此,合资公司形式得到了东道国和外资的共同青睐,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采取投资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差额注册资本金等)以鼓励外资以合资形式进入该国金融市场。

(二) 各国的规定与实践经验总结

我们主要从各国在世贸组织项下的《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附录所作的证券服务贸易开放承诺和各国的国内立法来分析各国对外资准入机构组织形式的选择(各主要国家证券业开放组织形式可详见附表1),可以将所研究的国家大体分为三类:

1. 准入形式“不设防”

这些国家又可细分为两类: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前者如英国、美国,后者如波兰等东欧国家。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对证券业开放的准入形式没有特殊的法定要求,也没有明显的先后次序。外资进入东道国后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完全由其自己根据经营需要决定,东道国法律对此没有强制性规定。

但两类国家对证券业准入形式“不设防”的历史背景却不完全一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奉行“自由经济”,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干涉较少,在外资准入环节适用国民待遇,并强调竞争机会的公平与均等,加之发达国家本土金融业发达,来自外资的有力竞争不仅不会对其形成产业威胁,而且有助于提高其金融业的竞争水平和效率,因此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决定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外资进入其本国证券服务业没有组织形式上的限制。而对波兰等东欧国家来说,其对外资准入形式没有特殊要求,实际上是其政治上完全依附西方国家和“经济殖民地化”的必然产物,由于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命脉完全被外资所掌控,外资准入组织形式这个形式问题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

2. “代表处、合资公司—全资子公司、分公司”的渐进开放模式

所研究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准入形式开放问题上均采取了“审慎渐进”的思路,一般均以代表处的开放为先导,鼓励外资以合资形式进入证券服务业,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再逐步放宽合资企业的股权比例,最终允许外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印度、韩国、新加坡、泰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莫不如此。

在渐进开放模式中各国差异比较大的是分公司的准入问题,总体而言,在发展中国家中,分公司的准入次序落后于合资公司和代表处。一些国家是在开放合资公司形式相当长时间后,才允许外资设立证券分公司,如印度;另一些国家或地区虽然在开放合资公司后不久即允许外资证券分公司,但对分公司附加了许多严格的准入条件。例如韩国规定外国证券公司在韩国设立分公司的标准是:在韩国设立办事处2年以上;在其母公司所在地经营证券业务10年以上;近3年来没有受到母国监督当局的处分。台湾《证券商设置标准》规定:须对申请许可的业务种类具有国际证券业务经验;最近三年在其本国未曾受到证券有关机关的处分;最近三年总资产,在其本国证券商排名前十名内。还对外国证券商的资产总额、实收资本额等作出了较高的要求。

3. “分公司—子公司”的日本模式

在所研究的国别中,日本的案例比较独特,其对分公司的准入优先于子公司。1972年,美林在日本成立了第一家分公司。此后,日本引进外资证券公司的重点一直放在分公司上。1998年,外国证券分公司接近60家,达到历史高点。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对子公司却一直以“执照制”的要求加以严格限制。1999年才完全放开对现地法人的限制,2000年以后,分公司逐渐减少,而现地法人逐渐增多。

日本模式是一个特殊但却不成功的个案,实践证明日本的分公司准入形式对其本国资本市场的助益并不大,反而加大了其监管机构对外资证券公司的监管难度。由于日本战后采取了亲美一边倒的对外战略,成了美国庇护下的“政治侏儒”,其对外开放的谈判受制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而分公司的准入形式是欧美跨国公司最青睐的金融机构准入形式,加之日本开放时间较早,经验不足,才因此造就了特殊的“分公司—子公司”模式。





总体而言,在三类开放模式中,第一、三种均属于特殊模式。采用第一种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均属于政治转轨的东欧国家,其准入形式上的放任自流是其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殖民地化的现实体现,对我国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第三种的日本模式实践证明并不成功,采用的国家也少,参考价值也不大。

第二类的渐进开放模式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模式,印度、韩国、泰国、台湾的经验表明,渐进开放模式以合资企业为先导,逐渐放开股权比例,进而引入全资子公司和分公司,对本国市场的冲击较小,本土产业也能从合资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对外资监管的压力也不致过大,渐进开放的组织形式也保证了政策的灵活弹性,是较为成功的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三) 外资准入形式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选择

由于代表处没有经营实绩,对我国的证券业和证券市场不造成实质影响,因此我国在开放进程中关注的焦点是对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选择。我国目前共有7家外资证券公司、23家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全部采用中外合资公司的形式,在进一步开放中监管层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合资公司、分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三者间各有何利弊?是否有必要放开对外资设立证券分公司的限制?能否进一步放开合资公司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甚至设立全资子公司?

1. 各外资准入形式的利弊分析

合资公司、分公司、现地法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是三种主要的外资准入形式,我们可以通过下列表格简要分析其利弊。

我国目前的7家证券公司无一例外采用了合资公司的形式,这实际上是在考虑分公司和现地法人综合利弊的基础上作出的折衷选择,我国在准入形式上进一步开放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是否有必要放开对外资设立证券分公司的限制?(2)是否有必要实现合资公司向现地法人的逐渐转化,即允许外资扩大股权比例,并最终设立全资子公司?

2. 我国是否有必要放开对外资设立证券分公司的限制?

国别研究中发现,如果存在分公司和子公司的选择,大多数外资会倾向于选择控制力和执行力更强的分公司,而由于分公司并非东道国法人,虽然东道国可以基于属地管辖权对其进行检查和监管,但在现代跨国公司全球运营体系下,这种监管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因此,东道国普遍对分公司的形式较为忌惮。

我国证券业尚处在对外开放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证券业相比,我国的证券业是不折不扣的“弱质产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并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粗放经营模式。这样的背景和条件决定了我国吸引外资进入证券业,并不是简单地引进竞争对手和竞争机制,而是要引进外资先进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管理技术。

证券经营技术包括市场营销、产品创新、客户服务、资金运用等方面,可大别为两类:一种是模仿技术,即通过模仿加以传播的技术(如市场营销、展业和客户服务技术),模仿技术扩散速度较快;另一种技术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够掌握(如产品设计和开发技术),也称为授受技术。而在这一点上,分公司具有其先天的缺陷:分公司对外自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完全由其母公司掌控,因此国内同业难以接触和掌握其核心的授受技术,只能模仿和学习其外围的一些经营理念和营销手段,在经营技术上始终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在“学习效应”方面,分公司模式的效果要远逊于子公司尤其是合资公司。

从国际上考察,印度、韩国等证券业相对发达的国家,是在开放相当长时期后才放开对外资设立分公司的限制的,我国的证券业发展水平与印度等国仍有较大差距,对证券业尤其是证券公司的开放试点还未全面铺开,风险和问题还未充分暴露。从监管角度而言,普遍认为分公司的监管难度要大于子公司和合资公司,目前国内证券业和证券市场的监管压力还很重,对外资分公司的监管需分流大量的国内监管资源,因此在进一步开放中我国应暂缓考虑对外资分公司的准入申请,而将重点继续放在子公司和合资公司上。

3. 我国的外资股权比例能否放宽,放宽多少?





为了履行入世承诺,规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问题,证监会于2002年发布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要求境外股东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外资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资参股的基金管理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累计(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不超过33%,在我国加入WTO后三年内,该比例不超过49%。

我国目前的中外合资券商和基金公司从形式上看,基本符合上述股权比例要求,但形式上的股权比例限制并不能消除外资在许多证券机构事实上的控制权。

因此,即使固守入世承诺的股权比例,也不能有效避免外资掌握实际控制权的情形发生,股权比例对外资的约束作用正在日渐削弱。更重要的是,股权比例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有效保护国内产业,提高国内证券业的竞争水平。市场竞争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范畴,在市场竞争中,落后方的后发优势不能低估。在对外资的评价中,人们往往人为地放大了外资侵夺市场份额的负效应,却淡化了国内业界因引进外资而产生的技术升级和观念更新。其实,我国许多金融市场的迅速成长,都离不开外资的“鲶鱼效应”,例如我国的寿险市场就是因为1992年友邦公司带来的寿险代理人制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我国的基金市场之所以成长迅速,也与开放力度较其他证券业务大有直接的关系。对本国企业的保护,不能依靠行政性和封闭性的家长式呵护,而应该将其放到丛林中接受“丛林法则”的检验,只有企业壮大成长了,才能实现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日本、韩国、印度、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开放后数年内都实现了股权比例的完全放开,允许外资设立控股或全资证券子公司。这些国家和地区股权完全放开后外资对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严重。以印度为例,2004年底印度外资银行存款和贷款份额占印度商业银行的5.4%和7%,在证券业务方面,国内承销市场外资机构没有实绩,经纪业务占约12%的市场份额,资产管理业务比重略高,达40-50%。在需要销售网络和客户积累的证券业领域,外资全面进入后分得的“蛋糕”并没有人们想象中丰厚,外资机构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可怕。

从宏观政策角度而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有一定的政策暗示意义:5%以下意味着外资开放试点性的启动;5%-30%左右意味着外资初步开放格局的形成,但仅限于少量参股;30%-49%表示外资战略性作用的增强,但并没有绝对话语权(可能有相对控制权);51%-75%意味着对外资开放的成熟阶段;75%-100%意味着对外资的完全开放。从开放进程来看,我国证券业开放已超出了30%-49%的战略引入外资阶段,应当进入51%-75%的成熟阶段,甚至在某些条件允许的领域(如基金业),准许外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具体开放举措上,可以仿效有些国家的做法,根据不同的控制权程度,设定外资机构的实收资本额,股权比例较低的外资机构,其最低实收资本金稍低,股权比例高的外资机构,设定较高的最低实收资本金额。

三、证券业开放的业务路径:业务开放的先后次序

证券业务大致可分为发行承销、自营、经纪、资产管理、财务顾问、衍生品和其他业务等范畴,在实行综合经营的国家中,银行业务的范畴就涵盖了上述证券业务。

(一) 证券业务开放先后次序的比较分析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证券承销业务是各国最早开放的业务。证券承销可以分为国内承销和国际承销两块业务。在国内承销业务方面,由于需要销售网络支持和客户积累,国内的券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资机构难出其右,因此开放后对本国证券服务业的冲击并不大。在国际承销方面,外资机构无疑是一枝独秀,但即使国际承销业务不开放,东道国的上市企业也会到国际市场上寻找国际大券商,为其提供承销服务。因此无论开放前后,国际承销的蛋糕多数均为外资机构尤其是摩根、花旗、美林等国际大投行所垄断。

经纪业务一般也是各国较早放开的业务,经纪业务最先开放的是外国人投资本国证券的中介业务(如日本),而后逐步开放本国证券经纪业务。与国内承销业务类似,国内经纪业务是一个需要经验、技术和





客户积累的行业,而且在网点设置上有特殊的要求,作为本土成长的企业,在这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从国际范围来看,即使在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外资机构在经纪业务方面获得市场份额也不大。

在财务顾问和投资咨询业务方面,由于外资机构无论是实力、研究能力和实践经验方面都较东道国国内机构有强大竞争优势,东道国在开放这一业务领域时往往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全面开放该业务领域,外资机构势必凭其实力全面占领该领域市场(如台湾);如果不开放该业务领域,则本土财务顾问和投资咨询业只能在低水平上运作,无法真正成长壮大起来。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由外资与国内机构组成合资公司,从市场化运作中真正提高本国券商在该领域的竞争水平(如印度)。

在资产管理(含基金)业务方面,外资的优势在于国际市场多年运作的经验、娴熟的投资技巧与组合理财经验、国际化的理财品牌、成熟的理财团队、全球化资源和网络、技术及资金优势等,但东道国本土机构在这一领域也并非不堪一击。由于本土机构在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方面存在相对的竞争优势,在投资技巧和管理经验方面也存在后发的“学习效应”,因此在基金业已有初步发展的国家,即使在全面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外资也无法垄断全部资产管理业务。在开放步骤上,东道国倾向于外资以合资形式进入资产管理业务,而后逐步提高外资股权比例,成立独资公司或分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从国际范围考察,自营业务是东道国较晚开放的证券业务。这主要是因为自营业务是证券公司业务中风险权重较大的业务种类,其风险可能包括超比例持股、集中持股、市场操纵、证券资产托管等,更重要的是自营业务的对外开放,还涉及本土定价权、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管理等诸多复杂因素。稍有不慎,可能会对东道国的金融安全造成严重损害,在这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前车之鉴。因此,各国对自营业务的开放都比较审慎,除了英美等发达国家以及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外,大部分国家是通过“合格投资者”的形式实现自营业务的开放的。

在开放次序中,衍生品业务是东道国最迟开放的业务之一。衍生品由于存在着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多种风险,并且存在风险的杠杆放大效应,贸然开放可能对东道国的金融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尤其在衍生品发展时间不长的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步骤更加审慎。因此,各国对衍生品业务的开放均从严掌控,开放的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通过特许注册的形式允许一定数量的知名外资衍生品交易商从事衍生品交易(如泰国);二是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从事衍生品交易(如印度)。

(二) 证券业务开放先后次序的国别经验

我们撷取了英国、美国、日本、印度、韩国、泰国、波兰等国进行较为深入的国别研究,发现除英美实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证券业务开放上没有明显先后次序外,其他国家均区分具体证券业务设定了开放次序。其主要经验有:

1. 机构准入优先于资金准入

在这方面,印度的经验值得借鉴,印度的证券业开放是从1991年从零起步的,只用了短短的5年时间,就实现了对外资机构准入的全面开放。1996年之后,印度就允许外资通过自动途径(无需审批)对以下证券经营机构进行100%的投资:投资银行、证券承销、投资组合管理、股票经纪、资产管理、存管服务、信用评级、投资咨询、财务顾问、融资租赁、住房金融、信用卡和货币兑换业务等。但对资金的开放则较为审慎,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自营业务的资金额度 and 时间限制,是在1999年《外汇管理法》颁布之后才完全放开的,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虽然外部的压力和舆论的呼声很大,但印度政府始终没有作出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决策。

资金跨境流动的业务之所以滞后,是因为从投资监管角度而言,东道国对于资金的监管难度要远大于对于机构的监管难度,如果允许资金的完全进出自由,实际上将本国市场处于一个完全不设防的状态下,在本国金融体系和经济结构存在缺陷或是出现重大经济变局的情况下,资金的迅速流动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隐患。但对于机构的监管则不然,外资机构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进行运营,东道国可以通过法律政令的制定颁布,实现对机构权能的有效监管。如果外资机构在东道国所占的市场份额过





大,东道国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和不公平竞争法等法律加以规制;在外资机构的准入上,还有条件和资质的限制,在特殊情况下,东道国还可以以GATS的审慎性原则否决外资机构的准入申请。

2. 资金流入优先于资金流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信息跨国界的传播、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及社会生产力的高效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电子化的辅助下,资金的流量和流速激增,进一步刺激了金融交易的发展。但是,大规模的资金快速流动和证券业的交叉经营,增加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艰巨性。这使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出现严峻的特点: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联动蔓延,具有很强的突发性;资金的国际流向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资金净流出的局面;心理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信心的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化。

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资金的流入利大于弊,资金的流出弊大于利,因此在金融业务开放次序上,发展中国家对于资金净流入业务的开放要明显早于可能导致资金净流出业务的开放。在从所研究的国家来看,对于那些需要在东道国境内建立常设机构或投入大量储备和建设资金的证券业务(如投行和经纪业务),东道国开放的顾虑较小;而对那些可能在短期内导致资金外流的业务(如自营和衍生品业务),东道国往往疑虑重重,步履维艰。即使在开放资金外流业务的情况下,也努力采取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如汇兑限制、期限限制等)来遏制资金外流的危害。

3. 风险低或易于控制的业务先开放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对外开放首要考虑的不是收益问题,而是风险问题,因此,在具体业务开放先后次序上,率先开放东道国认为风险较小或风险可控的业务领域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开放举措。大多数国家首先开放的业务领域,有些属于风险权重较小的业务,如证券承销、经纪、投资咨询业务,有些虽有风险,但风险透明可控,如资产管理业务,而自营业务、衍生品业务则由于风险权重较高,风险难以控制,对东道国证券市场冲击较大而开放次序较为靠后。

4. 本国竞争力高的业务优先开放

由于国际分工和资源禀赋的存在,各国在证券服务业各领域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外资虽然强大,但并非在所有的业务领域均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本土证券业虽然弱小,也并非在所有业务领域均不堪一击。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过程,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本土证券业可能通过模仿、学习、融合、提高,有效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和竞争水平,并在竞争中处于均衡或领先态势。

但是,由于产业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国均倾向选择本国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的业务领域加以开放。这样作有两个考虑:一是直接应对外资竞争的冲击较小,本国竞争力较强的业务领域在开放过程中抗击外来冲击的能力较强;二是本国竞争力较强的业务在竞争中提高得更快,成长更迅速,这是因为此类业务与外资的相对差距较小,竞争水平有望在短期内得到比较大的提升。

(三) 我国对证券业务开放次序的选择

与银行和保险相比,入世当时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承诺较为保守。这是因为相对于国际同业,我国证券市场及证券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水平更显脆弱,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保护。

根据目前我国的开放进度,我国目前已开放合资公司的证券承销、基金管理业务,开放外资证券类机构的财务顾问和投资咨询业务,对这些业务今后可进一步深化开放(如在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上作出放宽);A股的证券经纪业务风险较低,国内相关证券业务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不弱,对国内证券产业安全的影响小,监管难度不大,可考虑逐步对外资机构开放;对于自营业务和衍生品业务,由于业务风险较大,国内相关证券业务发展水平和竞争力较弱,对国内证券产业安全的影响大,业务监管难度大,因此只允许外资通过合资公司从事限定范围的自营和衍生品业务。

四、证券业开放的国际化成长路径:我国证券服务业的跨境发展





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范畴,我国除了吸引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外,还应积极向外拓展国际生存和发展空间,只有参与国际竞争,汲取国际惯例,才能真正培养起我国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一) 主要国家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经验总结

通过考察美国、英国、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证券服务业的跨境发展经验,我们总结出如下一些经验和教训:

1. 券商跨境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证券业大发展和实力提升的基础之上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发展和开放渐成主流,WT0等国际组织的多边规则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为各国本土券商的跨国经营提供了条件。但从所考察的国家来看,券商跨境发展并不是一个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的目标模式,而是各国本土证券业大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产物。美国、韩国、印度等国家都是在本国证券服务业发展已达到相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条件下,才逐步开始跨国经营的。

发展与开放辩证统一,开放对发展虽具有促进作用,但发展才是开放的基础。开放的步骤要与发展的程度相适应。与其他行业和领域的跨国经营类似,券商“走出去”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是一个根据本土证券业发展进程而不断嬗进的过程,在本土证券业竞争力受损、发展水平滞后的情况下,跨国经营的步伐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英国在金融“大爆炸”后本土券商几乎全军覆没,其在海外的经营便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海外分支机构和营销网络被接管或兼并。因此,跨国经营的时机、程度、方式和战略进程必须严格受制于本土证券业的发展步伐,超前或滞后均会给本土证券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 券商跨境发展与国内证券业的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相协调

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本国证券服务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后提出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目标的。这主要是因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应对外资在本土的竞争冲击,其难度要小于应对本土券商在海外面临的竞争压力,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首先在国内竞争中发展、壮大、完善本土证券服务业,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国际化的战略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的国别研究资料表明,券商跨境发展不仅与本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协调,而且也受制于本国证券服务业对内资开放的步伐。印度、韩国的经验表明,证券服务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主体多元化、竞争多样化的基础上的,金融产业通过对内外资的同时开放,培育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私营金融机构,原有的国有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也不断改革,从而形成了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升,使其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并可能在某些业务领域获得比较优势,在国际证券业务份额中掠得一席之地。

3. 多选择本国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业务开展海外运作

许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海外运作,均奉行“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竞争策略,避开欧美券商具有竞争优势的业务领域,而专注于发展本国券商具有相对优势的业务领域。例如,韩国证券公司在海外的机构往往选择代理交易韩资企业股票的经纪业务作为其主营业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印度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也不盲目上马新业务,而率先选择自己的优势业务,当优势业务取得成功后,才去考虑拓展新业务的问题。

4. 通过合资企业形成的品牌效应和营销网络扩展国际发展空间

大多数国家对合资券商中的外方参与者均有严格的资质审查,对其财力、资信、知名度、影响力、公司治理等均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遴选出的合资伙伴多为国际知名的大投行。这些国际大投行无论在资金、技术、经验,还是国际营销网络、国际影响力、名牌知名度方面,在国际竞争中均有独到的优势。许多国家的本土券商通过在合资企业中与外资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战略合作协议和利益分成安排,利用合资伙伴的品牌效应和营销网络实现跨国经营的战略安排。如此,既可以降低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的竞争风险,又可以充分利用合资伙伴的既有资源,节约跨国经营成本,并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客户群和商业信誉。





5. 选择适当的投资目标国开展跨国经营

目标国的选择对实现券商的海外经营业绩至关重要,印度、韩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券商在“走出去”过程中并不是大面积撒网,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的扩张,而是有重点地选择适当的投资目标国开展海外经营。它们选择投资目标国的主要原则和经验有:(1)首选文化或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也包括选择印度裔或韩裔较为集中的国家进行海外经营;(2)首选竞争比较充分或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开展海外经营;(3)在跨国经营中,保持海外营销区域的适度集中,以降低运营成本,获得规模优势;(4)选择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5)选择与本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海外经营,尤其是在证券业形成稳定合作关系(如组建合资企业、签订证券监管合作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

(二)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法律政策的明晰和我国证券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券商已经具备了跨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必要性

从证券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国证券服务业如果仅仅局限于在本国领域内为本国机构和个人提供证券服务,缺乏国际竞争和跨国经营的思路和实践,则长期来看其必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影响到本土证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我国证券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必要性凸显在以下几方面:

(1) 跨境发展有助于汲取国际竞争的经验,发展和壮大我国证券业实力。

中国正在成为崛起中的金融大国,但与银行等其他金融行业蓬勃兴起的国际化经营态势相比,我国证券业的国际化发展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这主要受制于我国证券业总体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107家证券公司总资产4400亿元,累计营业收入405亿元,实现利润180亿元,不及美国一家大投行的资产和盈利水平。随着我国证券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和金融大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做大做强”已经成为我国证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除了依靠深化改革,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之外,还必须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提早布局。证券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漫长的竞争过程,我国的券商不可能等到本土市场资源耗尽,无潜力可挖的情况下再进行跨境经营,而应未雨绸缪,在发展初期或上升阶段就开始进行海外经营的尝试,从而有效汲取国际竞争经验,为将来的国际化经营夯实基础。

(2) 跨境发展有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资金和技术两类资源,全面提高我国券商经营水平。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的一体化和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在这方面,从事跨国经营的证券机构具有很大的优势:跨国券商能够为企业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做通盘考虑,以最佳的方式、最低的成本、最小的风险、最快的速度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本市场的支持;跨国券商能够为其国内客户从国际市场中获取金融资源,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其客户改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跨国券商可以在跨国经营和竞争中潜移默化地学习和掌握各种先进的业务、管理和营销技术,也可以和境外大投行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有助于开阔视野,全方位地提高其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3) 跨国发展有助于实现利润多元化,风险分散化,改变国内券商“靠天吃饭”的粗放经营作风。

2006年中国券商终于实现全行业盈利,但从32家券商2006年年报的统计结果来看,来自经纪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仍然高达49%,自营业务收入占比为35%,两项收入总和占到总营业收入的84%。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的收入规模与市场行情高度相关,这说明去年券商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市场的好转,说明券商“靠天吃饭”的盈利模式依然没有改变。

利润单一化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风险集中化,这除了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有关外,还与中国券商普遍缺乏国际视野,“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的生存心态有关。金融业改革开放虽历经多年,但与其他金融领域(如银行业)跨国经营蒸蒸日上相比,证券业的跨国发展还处在踟蹰起步阶段。





这使得国内券商将风险集中在单一市场(A股)的单一业务模式(经纪加自营)上,加之券商自身的内部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落后,在大势趋淡的情势下市场风险在券商内部大为放大。

因此,券商跨国发展是实现其利润多元化、风险分散化的一条有益途径:首先,不同区位的投资和经营可以有效地规避单一市场股价下跌的风险;其次,券商在海外运作的业务开拓和盈利增长,可以有效拓宽其利润来源,增加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再次,券商可以通过跨市场的套利或对冲机制,来有效减轻单一市场经营的风险,还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建立有利的投资产品组合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此外,券商还可以通过在国际上寻找合资或合作伙伴,以合资、联营、合作等方式分散大额投资的风险。

(4) 中国企业大批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客观上需要本土券商完成国际化转型,为其在国际市场上提供优质的中介服务。

截至2006年年底,通过IPO或买壳到境外资本市场挂牌的国内企业数量高达733家,中国企业大批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这些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发行上市,还是再融资或并购环节,均需要熟悉国际业务的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专业服务。而目前这些国际中介服务基本为国际大投行所垄断,本土券商未能分享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盛宴。而实际上,中国券商并非在此类业务上全无竞争力,由于国际投行对中国企业的法律性质、行业地位、营销环境、经营前景等因素的认识不如国内券商充分,将本土企业的定价权交由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国际投行,显然并不合理,韩国等国券商国际化的经验表明,为本土企业的海外上市和后续经营提供中介服务,是本土券商国际化的一条捷径。此外,由于海外上市企业往往筹资额巨大,承销费可观(一般达到募资额的3-5%),中国券商如能尽早实现国际化运作,努力获取该市场份额,也能获得不菲的收益。

(5) 券商跨境发展有利于为自身培养和储备专业人才。

人才培养是中国证券业发展的“短板”,也是制约本土券商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才培养尤其是国际型人才培养与券商跨境发展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才力量的匮乏使得券商不能进行有效的跨境发展,而国际型人才又必须在券商跨境发展的实践中,通过海外业务运作,熟悉国际惯例,学习掌握知识技能而潜移默化地成长起来。券商不进行有效的国际化运作,不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其本土人才就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国际型人才的“短板”就会加剧,从而不仅制约其国际化发展的步伐,而且会在国内竞争中丧失人才储备的优势。

2.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可行性

随着法律政策的明晰和我国证券业的快速发展,我国证券业跨境发展具备了法律、政策、经济的可行性。

(1)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有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

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29条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允许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或者参股证券经营机构,这为我国证券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有力的法律保障。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机构和人员到境外从事与资本市场投资相关的服务业务。2005年8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证券公司创新与发展研讨会”上表示,鼓励证券公司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调整组织结构、创新经营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在境外设立、收购、参股证券类机构,为其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些法律和政策为证券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

(2) 一些优质券商已经初步具备跨国经营的实力。

经过证券市场多年历练,我国有一些券商已初步成长起来,具备在某些业务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初步实力。在综合治理和市场化竞争的洗礼下,国内券商的基本面得到根本扭转,涌现出了一批综合实力强、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券商,如中金、中信、广发、国泰君安、申银万国等,它们在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用人机制、市场营销和市场化运作等方面均大有进步,并初步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其中,





中金等公司的海外承销业务,招商、申万、国泰君安在香港的证券子公司业务等,均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国内的优质券商已经基本具备了“走出去”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对外扩张的能力。

(3) 通过在海外的试点练兵,一些券商积累了跨境发展的有益经验。

香港是内地券商海外试点的“桥头堡”,目前已有中金、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国元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等多家公司在香港拥有分支机构,而东方证券、海通证券、光大证券等也均将设立海外机构列入今年的重点工作。许多券商分支机构经过在海外的多年发展,已经在当地市场上缔造了不俗的业绩。例如,较早进入香港市场的国泰君安(香港)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均衡的业务结构,经纪业务占公司收入40%,投行、利息收入、资产管理、投资收益各占公司收入的15%。2004至2006年三年间,公司年均实现利润9000万港元,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公司净资产达到4.3亿港元,是1995年成立时3200万港元注册资本的13.4倍。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国泰君安(香港)公司的触角已经延伸至香港以外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亚洲主要市场和地区。

(4)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海外并购和QDII制度的实施为券商跨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外资券商和国际投行在企业海外上市、并购上有着先发优势,但由于国内券商熟悉企业情况和国内行业背景,在发行定价、协调国内各方关系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因此,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并购的热潮无疑为国内券商的海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商机和业务资源。实际上,国内券商和外资券商在中国企业海外上市问题上也并非全是竞争关系,还可能结成战略性的合作伙伴,例如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惯常合作模式是:国内券商负责“上游业务”,帮助选择企业,并协助其在股权状况、财务结构等方面达到境外上市要求;海外投行则作为内地企业的上市推荐人和股票承销商,负责向海外交易所报送材料和后续的上市事宜。国内券商可以通过这种合作模式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并逐渐承担起财务顾问、保荐机构、承销商的角色。

2006年4月17日起,我国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积极推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开展境外投资业务。虽然目前QDII的范围仅局限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少数基金管理公司,但随着券商的规范化运作和理财能力的提高,证券公司有望获得从事QDII业务的资格。这为券商开展国际化投资运作,丰富全球产品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银行、保险公司相比,券商从事QDII业务有其自身的优势:银行和保险公司拓展境内银行代客外汇境外理财业务,只能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而券商则可在一定额度内集合境内机构和个人自有外汇,用于在境外进行的包含股票在内的组合证券投资,投资范围更为广泛,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同时,券商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将为券商开展QDII业务提供交易清算、投资渠道、投资研究等方面的支持,可以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提高收益率水平。

(三)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路径选择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路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根据国际投资学的原理,可以分解为组织形式选择、业务选择和区位选择三项内容。

1.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组织形式选择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组织形式有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资公司等。这三种组织形式各有其特色:

分公司不是独立的机构法人,因此总公司对其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对于希望在海外发展过程中控制节奏、不希望过度扩张的国内券商而言,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跨境经营组织形式。但分公司的缺陷主要在于,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一旦分公司违规经营,风险扩张,造成恶果,依据国际法,总公司将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1995年的巴林银行案件就是前车之鉴。

全资子公司与分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是独立的法人,母公司与其主要是资本控制关系,即通过公司治理程序选任子公司管理者,并不直接干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由于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全资子公司仅以其自身资本为限承担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母公司一般不对子公司的经营失败承担除出资额以外的法律





责任。因此,全资子公司的模式较为适合希望有效控制风险的稳健型券商。我国目前在香港运营比较成功的券商分支机构,大多采用全资子公司的模式。

合资公司是一种折衷的准入形式,由于寻觅合作伙伴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合资谈判的过程冗长繁琐,因此合资公司组建的成本要高于分公司和子公司。但合资方合作融洽的合资公司有助于较好地发挥合资双方的互补优势,在当地市场上打开局面。因此,合资公司较为适合券商进入陌生市场或东道国对合资公司给予优惠待遇的情况。

因此,组织形式的选择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券商跨境发展的战略思想和进入的市场情况。一般而言,对于所进入市场风险不大,券商内控机制较为完善的情形,可以选择分公司形式进入;对于进入市场风险较大,券商希望保持完全控制力的情形,可以考虑以全资子公司形式进入;对拟进入市场较为陌生或东道国有政策倾斜或有较为理想合作伙伴的情形,可以考虑以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

2.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业务选择

前文分析过我国券商的主要业务种类,在发行承销、自营、经纪、资产管理、财务顾问、衍生品等业务中,我国券商基本都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但可能在具体的业务领域相对于东道国证券业具有比较优势,例如在发行人为中资企业的情况下,券商具有争夺发行承销和财务顾问业务的优势;可以为在海外市场交易的中资股票提供经纪或信息服务;在一些与中国市场有关的衍生品交易中,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等等。

从韩国、印度等国券商“走出去”的成功经验看,在其本国开展的比较好的业务一般也是其进入国际市场率先开展的业务。我国券商业务主要由自营业务、承销业务及经纪业务三块组成,这三部分业务是我国券商的主要利润来源,也是我国券商开展得较早较为成熟的业务类型,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盈利模式,因此这三大业务是我国券商进军国际市场的首选业务。至于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业务,由于技能和经验与海外同行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对国外市场和产品结构并不熟悉,不宜贸然进入;衍生品业务由于风险较大,也应审慎进入。

当然,在具体进入自营、承销、经纪哪些业务的问题上,各券商应充分考量自身的情况,遵循四大原则:

(1) 强项原则,即拟进入的海外业务最好是券商的优势业务,是券商拥有最多资源的业务,因而也是券商最易成功、效益最好的业务。强项可以体现在业务经验、特殊背景、研究优势、财务资源、现金或融资渠道优势等诸多方面。

(2) 低成本原则,券商低成本战略的目标是努力降低进入海外市场的成本,并将低成本地位转化为高收益,从而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券商海外经营成本优势的来源包括追求规模经济、特殊资源(如与当地政府或当地企业的良好关系)、特殊产品或服务及创新能力等因素。

(3) 差异性原则,券商应谋求在产品或服务的某一领域独树一帜,具备其他竞争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券商应努力在海外经营中为客户提供创新的差异化的产品,或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要求,并依靠这种独特的地位而获得超额报酬。差异性战略的基础是创新能力、产品本身或服务、客户种类及地区分布、销售服务体系等因素。

(4) 关联性原则,在海外运营中,券商各业务单元应相互支持,彼此共享资源,分担成本,这种业务的整合和关联也可转变为券商在海外的竞争优势。业务关联源于共同的客户、销售渠道、技术和其他因素,并可能在下述领域创建关联关系:研究、信息等后勤支持活动;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及上市公司等客户服务网络;研究、投行、自营及经纪业务间的纵向支持系统等。

3. 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的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与企业的竞争优势息息相关。一方面,不同的区位选择意味着对自己的不同定位,另一方面,区位也可以成为企业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来源。区位选择对企业发挥、保持和更新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影响我国证券服务业跨境发展区位选择的因素多种多样,如市场大小、增长趋势、雇佣成本、税收制度、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和政府政策等。不同因素在区位优势中的权重取决于券商海外经营的目标和动机。

区位选择与进入模式选择也紧密联系,如果投资环境陌生而且隐藏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找到一个能起到资源和能力“杠杆”作用的当地合作伙伴组建合资企业可能是明智的选择。

考察韩国、印度等国券商海外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两条迥异的区位选择路径:

(1) 选择地理上邻近、地缘文化上接近的发展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经营。这一点反映了对外投资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趋附性。地理上的邻近意味着便捷的运输交通、快速的人员调配,文化上的相近则意味着顺畅的信息沟通和市场角色的迅速适应。两者都会有助于降低券商管理成本和提高投资信心。

(2) 选择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虽然存在激烈的竞争,但对市场主体的发育和成长具有直接的刺激作用。进入上述发达资本市场可以充分利用“学习效应”,对于券商提高经营技能,培养市场意识,拓展全球视野,锤炼核心竞争力具有直接的助益。

由于我国证券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相对于国际投行而言,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因此区位选择对于海外经营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在海外经营的早期阶段,不宜过于分散地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开设分支机构,而应选择一两个最适合投资的地点建立我国券商海外经营的“滩头阵地”,待经验、技能和资源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再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海外经营。

因此,我们应综合考量各类因素,总结出最适合我国券商海外发展的区位。既要充分考虑地理、地缘文化上的因素,同时又不能选择资本市场严重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还必须考虑到客户资源、市场竞争、前期积累等诸多因素。既要充分发挥“学习效应”的优势,在海外发展中培养券商的核心竞争力,也要顾及投资的安全稳健性,争取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大的收益,并在当地市场站稳脚跟,拓展资源。

综合上述因素,我们认为,亚洲地区的香港和新加坡可以作为我国券商海外发展的首选目的地。理由主要有:二者人口构成均以华裔、华人为主,地缘文化接近;二者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有助于内地券商的成长;地理邻近,便于商业存在的组建和后续经营;在两地证券市场均存在大量上市的中资企业,为券商开展海外经营提供重要的业务和客户资源;两地证券界与内地券商往来密切,有着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监管机构之间也签订有《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过半数创新试点类券商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许多券商在当地的运作卓有成效,颇具竞争力,已经成为除少数国际大投行之外的“第二梯队”,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

4. 防范券商跨境发展的监管套利和违规经营风险

除了通过组织形式、业务、区位选择解决投资风险问题之外,监管层还应关注因券商跨境发展因内地和海外监管制度不同所引发的监管套利和违规经营问题。法律和监管的差异使一些券商可以在管制相对宽松的市场从事违规活动,并利用市场的关联性和波动性寻找套利机会,海外市场的跌宕起伏也增加了违规行为的市場风险。

虽然我国券商的跨境发展尚未形成规模,但从防范跨境风险,健全制度设计的角度,还是应该提早布局,建立跨境监管的协调和合作机制。由于监管套利涉及监管的制度性差异,我国不能在短期内对监管制度作出根本性变革,制度性差异只能通过与国际标准和惯例的逐渐接轨循序渐进地加以消除。我国可以通过如下三条途径完善对券商跨境经营的制度性监管,实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监管标准的趋同和衔接:

(1) 多边途径,即立足本国,充分借鉴国际标准发展本国市场,并在具备一定规模和实力的基础上加入国际组织制定的相关规则体系,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基本对接。我国证监会2007年4月11日加入有113个成员方参加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多边谅解备忘录》,就是借鉴国际标准完善我国监管规则体系的良好开端。

(2) 双边途径,即与主要投资目的国达成双边的监管合作协议,就双方关注的监管问题定期加以磋商,必要时可以对问题券商展开联合的检查或监管,并在调查、处置或制裁环节予以对方必要的配合。迄





今为止,中国证监会已与33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37个《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加强双边的监管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

(3) 单边途径,即作为证券经营机构的母国,实行以母国为基础的统一并表监管。无论以分公司还是子公司开展海外经营,其母国均有义务对分公司和子公司的稳健经营承担监管责任,并采取一系列辅助措施如现场检查、信息收集、报表检查等保证并表监管的实施。母国并表监管已成为跨国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我国对跨境经营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可以比照适用该原则,以全面衡量证券经营机构海外运作的业务风险,及时察觉、制止或纠正海外机构的违规行为。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info.com/> 发布时间:2008年4月17日

注:此文经过编辑,有删改。

法学教育

大学生要学会追根究底

范忠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

大学生必须钻研问题、思考问题,这是大学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大学生,就必须比别人多问一个为什么,学会追根究底。我们以法律学科为例,我们大学生可能应该对两种课题特别关注:

一是要特别关注当代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瓶颈式问题”。你作为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生,就应该思考社会问题。你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大学生,你就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生活面临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中央所常讲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社会科学,就是解决社会种种问题的科学,是思考社会问题原理的科学,是要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一定方案的科学。怀着这样的观念去求知去思考,更有实质意义,更能取得成功。中国的当代社会重大疑难问题很多,比如法院的有法不依的问题、执行难的问题,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民间某种方式来干预司法的问题。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应该在老师的引导下,形成探讨这些艰难紧迫问题的风气,对照这些问题去读有关的书,收集有关资料,组织真正的讨论。这样一来,学生今后到社会中去应付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也会很强。

二是要关注科技革命对当今社会的法律秩序、伦理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冲击问题。比如2002年黑龙江省人大立法承认单身妇女独立自主的生育权,可以通过一种人工生殖方式来进行单亲生育。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且不说这个立法是好或坏,但不能不思考这样的决定对我国的法律秩序、伦理秩序会造成哪些影响。这一立法实质上是允许法律上的原创单亲家庭,原创单亲孩子,从法律上讲那孩子永远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社会科学就是为社会医病的科学,科技新问题,好像某种放射性元素已经造成了社会肌体的某处红肿,我们不赶快研究它的机理,提出治疗方案,对症下药,那么就是我们社会科学学习和研究者的严重失职。不仅仅是学法律的,就是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的等等,也应该各自从各自的角度把这类问题的原理机理搞清楚,找解决方案。这种研究态度归结起来就是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这是经世致用的态度,不是玄而又玄的玄学态度。

来源:正义网 <http://www.jcrb.com/> (节选自《法学家茶座》2008年第1辑,总第19辑《问学当善》一文)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4 月

第 2 期[总第十八期]

本期要目

- 部属高校巡视工作取得成效
- 高校改革应以强化“学术权力”为核心
- 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
- 湖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哈佛大学的经验及其启示

新闻
动态

紧密结合高校实际

找准定位 突出重点 做好直属高校巡视工作

——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取得成效

巡视工作是我党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制度创新，这一工作制度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机制，提高领导班子的战斗力，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几年来，教育部党组一直在思考并筹划如何在直属高校建立和完善巡视工作制度，又如何通过巡视工作促进直属高校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从 2006 年开始，部党组决定对中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开展巡视工作试点，在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2007 年起全面开展直属高校的巡视工作。一年多来，在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在中央巡视办的指导下，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先后完成了对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19 所直属高校的巡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在巡视工作中，初步探索形成了适合高校实际的工作模式、做法和特点，直属高校巡视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巡视工作的基本情况

2006 年，对 3 所直属高校进行了巡视工作试点。2007 年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分 4 批进行，每批 4 所学校，每个巡视组由 7-9 人组成，驻校工作时间一般 3 周。各巡视组围绕以下六方面的情况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和了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领导班子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及落实；巩固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干部选拔任用的情况；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党风廉政建设等。在巡视过程中，各巡视组分别听取学校党委及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列席有关会议，个别谈话共 2764 人次，召开座谈会 51 次，调阅资料，受理群众来信来电 523 件次，接待来访 192 人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各巡视组还经过综合分析、集体讨论，分别形成了巡视工作报告和巡视反馈意见，向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作专题汇报。



二、巡视工作的主要做法

1. 部党组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始终在部党组的领导下进行。成立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下属的巡视工作办公室，并设立部直属高校巡视组。部党组书记、部长周济担任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四位部领导担任副组长。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办公室作为工作机构，主要承担直属高校巡视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和日常事务。

部党组高度重视直属高校巡视工作。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部署巡视工作，认真审阅各校巡视报告，听取各巡视组的巡视工作报告，研究解决巡视报告中提出的学校存在的各类问题，部党组成员、驻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同志亲自主持巡视办日常工作。

部党组十分重视巡视工作的制度建设。结合直属高校的实际，先后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专员工作规则》、《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办公室工作规程（试行）》、《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组参考工作流程》等文件，基本覆盖巡视工作的各个环节，从制度上确保巡视工作的规范化，保障了巡视工作的成效。

2. 紧紧围绕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找准工作定位，突出工作重点

部党组提出，巡视组的基本工作定位是对高校领导班子“定期体检、发现问题、排除隐患、促进发展”，巡视组既不是干部考察组，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作组、专案组；开展巡视工作既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也是对学校事业和领导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各个巡视组认真把握这一原则，在履行巡视职能的同时，还为学校的班子建设、发展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帮助学校向上反映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取得了学校领导班子的理解和支持，赢得了广大教职员工的拥护和信任，保证了巡视工作顺利进行。在工作过程中，各巡视组始终紧紧抓住工作重点，避免陷入具体事务中，提高了巡视工作的成效。

3. 紧紧围绕提高巡视工作水平，精心挑选、配好配强巡视工作队伍

部党组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反复斟酌，聘任了30位近期退出领导岗位，党性观念强，具有丰富高等教育领导工作经验，熟悉高校情况和工作规律，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的同志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专员，聘期三年，巡视组的组长全部由从中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岗位退下来的同志担任，同时特邀地方高校（教育）工委的中层干部参加巡视组。

4. 紧紧围绕巡视工作的根本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

巡视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反映真实情况。巡视组主动深入到干部群众中，深入到学校基层单位中，综合运用听、问、查、访等方法开展调查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获取了大量真实情况，也逐步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工作模式和做法。

一是做好巡视准备工作，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各巡视组出发前，都要在京进行行前集中培训，由部领导作动员，重申巡视工作要求和纪律，相关司局领导介绍被巡视学校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巡视组抵达学校后，即向被巡视学校党政一把手通报巡视工作意图和工作安排、纪律，就巡视工作方案和党政一把手进行沟通；同时开好两个见面会，即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见面会、中层干部及教师代表动员大会，通报巡视工作安排和要求，进行巡视工作动员，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取得学校领导和广大教职员工的的支持。巡视组还利用校内平面媒体和校园网等发布巡视工作公告，公告巡视组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时间安排以及办公地点、办公电话、电子邮箱；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巡视工作的目的、意义，进一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营造巡视工作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宽松的工作环境。

二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全面掌握学校情况。为了全方位了解情况，各巡视组分别听取学校党委及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列席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和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调阅近年来的会议记录、规章制度、党员先进性教育材料等相关资料，召开师生代表座谈会，主动走访学校所在省





(市)高校工委,听取他们对学校领导班子的情况介绍。同时,巡视组特别注重个别谈话这一环节,把它作为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性工作抓好。在谈话前,巡视组根据学校实际和谈话对象分别拟定了谈话提纲,确保谈话扣紧巡视工作主题。在谈话对象安排上,既注意普遍性又兼顾重点,确保充分听取各层面的意见,基本保证了谈话范围的代表性和覆盖面,有的学校个别谈话近300人次。

三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集中了解重点问题。在全面了解学校改革发展稳定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和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及问题,巡视组进一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干部群众中调查研究,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掌握各类有价值的信息,基本摸清了这些问题的症结和矛盾的真实情况。

四是综合分析各类材料,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巡视组采用集体讨论、分工负责的方式,对学校的情况和问题进行认真的梳理,对各类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对一些问题继续做进一步的了解。经过巡视组充分讨论研究,形成巡视工作报告提交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在巡视报告中,既对学校的改革发展稳定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又重点对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隐患进行了客观分析,并提出预防和解决主要问题的建议和意见,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学校的真实情况。

5. 认真用好巡视成果,推动直属高校工作深入开展

部党组十分重视巡视组提交的巡视工作报告,召开专题会议,分别听取各巡视组的汇报,对巡视过工作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有些问题由部领导分工亲自解决,有些转送部内相关司局落实办理,有些要求学校进行整改,着力解决班子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巡视组还撰写巡视工作反馈意见,由巡视组组长在学校领导班子会上进行集体反馈。对其中涉及有关领导班子中个别成员的问题,采取向党政一把手单独进行当面反馈,并要求学校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整改方案,并将整改情况报部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大多数被巡高

校已经把整改情况报来,这些学校结合巡视组的反馈意见,认真开展整改,有力促进了学校发展,师生反映积极。

三、巡视工作的主要成效

19所直属高校巡视工作的实践证明,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具有制度比较全面规范、工作定位比较准确、工作方式温和灵活、驻校时间比较适当、接触层面较为广泛、发现问题真实全面、反馈意见中肯有建设性、整改措施比较到位的优势和特点,符合直属高校实际,符合高等学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巡视工作及其成效受到了学校上下的广泛欢迎和认可。

1. 全面深入了解掌握被巡视学校的情况

通过巡视,巡视组基本掌握了学校整体情况,提供给部党组的报告有根据、有观点、有分析、有建议,使部党组对学校改革发展及运行状况和党政领导班子及其主要成员有了全面、准确、真实的了解,帮助部党组了解了过去没有掌握的一些情况,包括学校存在的一些隐患和问题,为部党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巡视工作正成为部党组在新时期指导直属高校工作的有效抓手,是非常有效的工作方式。

2. 促进了被巡视学校领导班子建设

巡视组在基本把握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状况的基础上,也对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作了比较全面、客观和深入的了解,找出了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党委书记、校长在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一些不利于班子建设的不实传言,巡视组也适时给予事实澄清,该使用的大胆使用,收到较好的效果。通过巡视,发现了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相关建议,进一步加强了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增强了班子凝聚力,提高了班子战斗力;同时,也增强了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主动接受监督,自觉维护班子团结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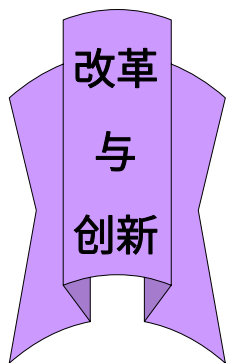
3. 促进了学校事业发展



在巡视工作中, 巡视组一方面总结学校好的办学经验, 并给予充分肯定, 让学校在原有基础上更好发展。另一方面也掌握了学校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 巡视组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梳理; 有些问题提交部党组和部内相关司局帮助学校研究解决, 有些意见和问题提供学校进行整改, 促进了学校事业健康发展。许多被巡视学校在整改报告中指出, 巡视工作实际上是在全面指导帮助学校的工作, 在促进学校发展起到了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有些学校向教育部主动提出, 希望早日派巡视组到学校去帮助学校的工作。

教育部直属高校巡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巡视工作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 巡视工作制度还需逐步完善, 工作方式方法还要进一步创新, 巡视成果的运用还需进一步总结规范。当前, 要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导下, 紧密结合高校实际, 找准定位, 要按照部党组的要求,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进一步突出加强领导班子领导学校科学发展的能力建设这一重点, 进一步总结研究巡视工作的经验、规律, 不断完善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制度, 保证直属高校巡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为推进高校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做出贡献。

来源: 教育部网站 2008 年 4 月 15 日



高校改革应以强化“学术权力”为核心

2008 年春天, “大部制”成为“高频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首次明确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其实, 高校同样需要进行‘大部制’改革, 压缩管理部门数量, 减少管理成本, 真正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内部管理体制。”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日前表示。(4 月 16 日《人民日报》)

有这一认识的不仅是刘经南校长, 近来, 诸多舆论都表示同样看法。这种对“大部制”改革的期望, 反映出公众对于当前高校管理机构林立现状的不满。

高校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 “校级领导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如果说, 这只是基于感性的, 那么一组数据表明, 重点大学校级领导一般有 10~15 名, 处级干部一般在 300 人以上。以西北某大学为例, 该校共有教职工 2300 多名, 行政人员占一半, 其中, 校领导 12 人, 校级管理部门和各院系的处级以上干部加在一起, 共有 300 人左右; 而在北大, 很凑巧的是, “管理机构”有 27 个, 与国务院的机构一样多。

机构林立, 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挤压有限的教育经费。还以西北某大学为例, 假设行政人员每人每年需要 5 万元开支, 一年下来就是 5000 多万, 这相当于 1 万多名学生的学费 (以每人 5000 元学费计算)。而且机构众多, 还带来了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一背景下, 提出高校“大部制”改革不无积极意义。

但从高校自身出发, 仅仅推行“大部制”改革还是不够的。“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加强权力, 提高效率——姑且把这当作是“效率化”。与“效率化”的要求相适应, 当前高校最需要的应该是淡化“行政”, 而还原“学术化”。

世人皆知, 过度“行政化”是当前高校的一个“痼疾”。由于过度“行政化”, 教育家成了政治人物, 教授成了官员。于是高校中本应有的学术纯洁度少了, 一些教授无心于学, 高校大师少了而大楼多了……



可以说,当今高校的诸多问题,与高校的过度“行政化”不无关系。国家行政机构的“大部制”其目的是强化“行政效率”,而高校的痼疾,“学术化”的渴望,显然不是单纯的“大部制”所能改变的。

正如刘经南所说,“大学靠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组成的二元权力结构,来维系整个系统的运行。”而“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学术权力才是大学的核心和内在逻辑。”高校改革应该逐步去除过度行政化的影响,让校长成为教育家,让教授的价值真正在学术上体现。

如何办好大学,让大学多出名师、名学生,中外历史上有很多好经验可资借鉴。可以说,只有把不利于高校发挥学术影响力的机构去掉,让高校成为学术圣殿,让校长们安心教育,让教授们安心育人,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果能如是,则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并非难期之梦。

作者:毛建国 来源:大众日报 2008年4月17日

大学创新的前提与驱动力

摘要:大学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与有效的激励制度安排,是我国大学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大学之用与大学之趣并存,则是大学创新的根本内在驱动力。

关键词:创新 开放 激励制度 大学之用 大学之趣

欲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先有创新型大学。何谓创新型大学?简言之,即在知识传承、发展,人才培养、施展等方面,能不拘一格,引领时代。大学存在的意义在于创新,对于一个尚未被复杂化的常识性问题,不妨先探讨一下创新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驱动师生创新的动力又是什么?

一、前提之一:大学的进一步开放

“开放”与“比较”对观念的影响,一位学人有一番精辟的见解:“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清楚地找到自己国家的‘坐标’,才会发现比自己国家更为先进的坐标,才会承认自己的落后。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激起模仿和追赶的冲动,诱导出发展的欲望。有了这种欲望,才可能反过来用新的标准(或榜样)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价值哪些是合潮流的,哪些是需要改变的,从而就能按新的利益坐标来修正传统的价值观念。这就像水一样,只有放开让它流动,才会产生‘落差效应’,落差愈大,水流愈急。”国家如此,大学亦如此。

历史反复昭示:决策者之所以有时会铸下大错,常常并非是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其原有的思想没有受到新观念新思想强有力的挑战。最强有力的影响既非书本,也不是身边的“智囊”,是现实环境,是对世界的开放与比较。自近代以来,中国大环境的每一次巨变,不论是被迫开放还是自觉开放,都造就了一代风流人物;没有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也就没有“奋起直追”这句话!

但发现机遇与能否把握机遇仍是两码事,社会制度以及建立其上的政策是决定性的。今日改革开放的成就已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够促成开放与比较,更可以用政策来保障新观念的普及与升华。



但大学的开放并不顺利。这一计划经济“最后堡垒”二十年来发生的变革是十分有限的。说到底,“过度”开放可能使国家对教育规模、教育导向失去控制,导致在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发生混乱,或造成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上述担心是导致大学发展难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深层次原因。

培养什么样的人,不完全取决于办学者的主观意愿。今日中国的性质、地位决定了任何学校都必须依照其法律从事各项活动,进一步的开放有利于更多的院校突破单调的办学模式和办学风格。在管理体制和课程结构上,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实际的知识结构体系去竞争有限的资源。在办学中存在某些教育价值观差异也是正常甚至是必要的,这只会促进教育繁荣与社会和谐。只要是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必会作不尽相同的追求,这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特别值得提倡。

实践也已证明,要促使“老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发展新模式的新办院校也是一个重要途径。新兴院校的崛起,有助于提高“老大学”的效益。要改变一个难以撼动的运行轨迹,只能从外部树立起新的标杆。国外大学教育发展的有关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其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出现的新兴力量只是不断地加强传统的办学力量,而不是取而代之。以个别大学为例,典型的如剑桥对牛津;以一场“运动”或一种现象为例,如美国的州立大学的崛起对“常青藤”大学;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新大学运动”对牛津、剑桥等传统名牌大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大学的进一步开放,不仅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也是大学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二、前提之二:有效的激励制度安排

近年来,“二八”之说在高校也流行开来。所谓“二八”说大致是指一个团队(群体)通常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做了百分八十的贡献,所以必须特别重视(用、奖)前者。这在平均主义长期盛行的中国,似有振聋发聩的效应;不过人们甚少注意到,在西方管理层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当事者并未无条件肯定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不仅如此,当时即已提醒人们注意过于关注“关键人物”已经并还可能继续导致的消极后果的出现。不可忽视的是,当我们热衷于“马太效应”这类理念之时,这种国际上一度出现的势头早已减退。从实际意义上讲,无条件的“二八”说可以视为是“救世主情结”的现代版。现代科学创新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共生现象”的存在。

在植物界里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显得枯萎,单调,缺乏生机;而与众多的植物一起生长时,它们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植物学家把植物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共生效应”。事实上,在人才群体中,也同样存在“共生效应”。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能够成为各国莘莘学子向往的圣地,就因为它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人才群体,并因此造就了许许多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八十年间,先后有25位学者荣获诺贝尔奖)。丁肇中博士在与我国研究生谈话时,曾多次谈过,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主要得益于同行间的启发、帮助。《学记》就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



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剑桥大学副校长莱斯利在演讲中阐发了一个关于“临界质量”的观点,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他的定义是,临界质量就是集中资源,提供一个可实现充分互动发挥效益的环境。在此情况下,最明显的资源集中就是人员的集中。这适用于大学内的各个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若干大学、大学所在的地区以及各大学的联合。在一个地区内,所有的智力资本都为临界质量服务。他解释说,智力资本的临界质量能进一步吸引智力资本;一连串企业活动围绕着优秀



的大学开展起来,事实上,智力资本能够进一步吸引投资和服务。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看,达到莱氏说的“可实现充分互动发挥效益”这样一个“临界”点,就是一种“共生效应”。

无可置疑,科学创新过程离不开人才资源的合理使用,它可以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文化知识,并把它物化在受教育者身上,从而产生出高效率的生产力。一个时期来,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价值及其实际意义与所谓“二八说”一样,被夸大了,尽管人力资本的确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近年来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国,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教育、资本等因素本身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特定的制度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框架,规定了人们的选择集合,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制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机会,从而影响经济绩效。有效的制度安排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激发了人的潜能,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使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同理,有效的大学激励制度安排才能产生帕累托改进的结果,而不是资源无谓消耗的一种零和博弈。要实现这样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安排,必须实现办学领域的创新,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制度的本质就是一套规范个人行为、给人以刺激并且使人能够从中获得好处的规范性安排。如果“从中获得好处”的仅仅是组织中的部分人,这个制度就不是“创新”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发展的实践证明,传统中陈腐的东西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因此必须先清除它赖以生存的土壤,而能够做到的,只能是由于不同模式院校的出现,它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即趁旧的东西尚未扎根之机,以新的制度去取代它。否则,旧体制一旦复归,要想变革,则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之难,争议之大,就是一例。一些院校的实践也说明,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好的学校管理制度的消化和引进,难度上与“独一无二”的“创新”实际上并无多少区别,换言之,适时适度的“引进”就是创新与变革。

有效的制度安排,其相对理想局面的出现,都要经过一个不可避免的非议、责难期,成就越大,困难与阻力也越大,与立竿见影无缘。今天的改革家虽无“车裂”之虞,但能坚持者寥寥,就因过不了那“周公恐惧流言日”。这也是大学创新的悲哀。

三、驱动力之一:大学之用

一百年前,中国的科举考试被终结了。清政府下这个决心并不轻松,但科举支配的教育对国家之“无用”,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今日大学师生而言,能否激起研究或学习的欲望,其“兴趣”似乎已不是课程或专业本身。对教师来说,是大量量化考评后的结果,即“研”可否得(加)分;对学生来说,则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就业前景,即“学”可否致用(财),这样的“兴趣”在扼杀天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更加短促的“兴趣”。对大学之用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据报载,一名北京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在工作3年后,又来到一所工业学校报名入学,成为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一名中专生。这当然会成为许多人视大学“无用”的一个典型案例。

有一个说法,在一个国家的科技人才中,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应占15%,而其余的85%都应该是具有不同技能的技术工人。那些“技术大王”、能工巧匠们所发明创造出来的许多“窍门”和“绝活”,不但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还能在关键性的地方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国正处于产业与产品结构更新换代、不断升级的重要关头,急需大量中高级技术工人。企业领导常感叹:“找一个顶用的技工比找一个工程师还难!”高素质的技工不足,迫使企业不得不将未受过系统训练的员工推上了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关键性生产岗位,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安全事故不断,给正常生产和经济效益带来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舆论习惯于抱怨“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导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事实上,在期望子女成才这一点上,没有哪个时代的家长会有不同,区别的只是“才”在百姓心中的大致标准,父母首先考虑的总是子女能否在现实社会“安身立命”,因而也不会愚昧到认定非要上哪所大学,或今后非要从事某个职业不可,如果孩子也可拥有一个不错的前程。

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曾风趣地说,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凡是“企业家”与“教育家”在如何办大学观念上的对立,胜出者总是前者。可以相信,如果社会上真的普遍出现如媒体多次宣传的某一类技工的收入大大高于一个硕士,不需要什么观念的转变,能够培养出这类人才的高校,一定会吸引到一流素质的师生。

大学必须有用,有用才有可能激发起强烈的学习与研究的兴趣,但兴趣能否持久并产生无穷的创造力,则大学又必须是有趣的。

四、驱动力之二:大学之趣

如何使师生充分感受到大学之用,又不被市场的手盲目牵着走,实现“有用而又有趣”的结合,既是办大学的真谛,也是大学创新的源泉。关于创新,莱斯利教授也有自己的话:“所谓创新就是以新的方式应用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这与知识的原始性的创造完全不同。就是说,知识可能早些时候就已经产生,但却会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应用,对知识的这种新应用就是创新。”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亦然。以新的方式应用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结果总是出人意料且魅力无穷。历史与文学在当下并不是特别受人关注的学科,科班出身的历史学、文学教师最初基于“稻粱谋”的动机,转而从事旅游、管理、新闻、法律等专业已不是新闻。一则《易中天何以成“如日中天”》的报道既可证“物极必反”之说,也可证得“以新的方式应用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

“年近花甲,或可称‘夕阳无限好’,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如日中天’。然而,即将退休的易中天教授却创造了这个奇迹。一辈子默默无闻,眼看着就要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他却突然大红大紫起来,热得让人不敢相信。不论赞成他还是批评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北京签售《汉代风云人物》时,不仅书店出动大批保安来维持秩序,警方也出动了15辆警车,几千人的长队把书店围得水泄不通,一口气签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签完。他在上海签售时,和他一起参加活动的众多名人、明星完全被他压住风头,他一枝独秀,成了名人中的名人。……”

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易先生是这样回应主持人自己是如何走上一条“另类”的学术道路,那就是当年在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后感到震撼,“学术论著可以这样写”。无独有偶,若干年前也有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头成了年轻人的偶像,那就是写下《大淖纪事》、《受戒》等作品的汪曾祺。“小说可以这样写”,也是当年不少人发自心底的赞叹。再看一看李敖、余秋雨、王鲁湘等其他史学出身(余曾专攻戏剧史)者在频频在亿万观众面前气定神闲地指点江山,与其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如说是史学与文学的骄傲。从根本上说,从李泽厚到易中天都走了一条“以新的方式应用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一位家长对沉溺于网络游戏的儿子因看《品三国》节目又重新捧起了书本而称颂易中天“功德无量”,这已不仅是一个教育工作者需要反思的问题,而是可以回到本文的主题,即针对形形色色责难之时,人们应该有勇气问一句:“大学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或“大学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办?!”





大学伟大,因为有用;大学美丽,因为有趣。丘成桐先生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数学的文章,因为作者有名,可成为美谈,否则,就是笑谈。有人批评易中天品来品去,曹操仍是“奸雄”,没有新观点。但他的方式产生了比“戏说”更轰动的正说效果,他的课学生爱上,他的讲座电视观众爱看,这才是“实际问题”。

有趣就是力量。对一有时间就泡在实验室的师生,世俗的眼光通常是透着崇敬甚至怜悯,但个中之趣,痴迷程度可与“瘾君子”相当者,或许也不在少数。大学之趣,趣味无穷。

当年孔子衡量一国一地最高的善治水平为“远者来,近者悦”,意思是远处的人愿意到这里来,当地的人不愿离开。实践亦证明,提供相对优厚的生活待遇固然是大学吸引优秀人才的法宝,但如果另一手软,即缺少真正的乐趣,便难以留住优秀人才,即使能够留住,也难有创新成果,天才可能成为庸才,这样的案例,在今日中国,仍然鲜活。

作者:汕头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教授、博士 秦国柱 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08年第2期



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这一目标,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为此,肩负人才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要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第一要务,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大力发展创业教育。

创新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教育及其实施过程的基本主张,通常表现为人们对有关教育的信念、价值及活动准则的认识。所谓大学生创业教育理念,就是高校在培养创业型人才中对创业教育信念、价值及活动准则所持的一种认识。在构建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时必须树立以下理念:一是创业教育既要针对大学生中的精英分子,更要考虑到所有在校大学生;二是创业教育既是为社会培养创业人才,以便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培养创业型人才,使大学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推动力;三是创业教育不仅仅是大学自身的任务,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四是创业教育不是对现有的就业教育、择业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现行就业模式的深化与提升,是对就业教育与择业教育的辩证的否定;五是在构建创业教育模式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使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既符合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也能体现各个高校办学的自身特色,既具有科学性,也具有可操作性。

构建大学生创业教育特色模式

创业教育虽然有其一般性,但由于各高校办学类型不同,承担的主要任务也不同,由此不同高校大学生创业的领域与层次、方式与方法也就不同,为此,大学的创业教育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必须在坚持创业教育





一般模式的同时,结合各自的办学层次与特色,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

(一) 研究型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特色从社会职能方面看,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的大学;从组织目标方面看,是“以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的大学;从办学水平方面看,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

研究型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应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在培养目标上,侧重培养的是高层次的创业与创业型人才。我国研究型大学有国内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实验室,研究型大学在国内不仅科研是一流的,教学也是一流的。这诸多一流,必然要求研究型大学创业教育也是一流,即要培养国内科技界、管理界等领域一流创业与创业型人才,引领国内、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第二,在课程设置上,在研究生和本科课程中设置创业内容,有助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规范化。在这个方面,许多高校已经作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来说,要以学科渗透原则、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原则、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原则为基准,拓宽专业教育,淡化专业方向。加强基础,实施整体优化,在基础教学中尤其要加强学生利用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培养实践能力方面,要避免实践能力就是简单的操作技能的误区,重点应该是建立在思考基础上的动手能力、应用能力。第三,在培养的方式上,在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原则前提下,坚持以学生为本和个性化的培养思路,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的差异,设计一种多样化、模块化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和弹性化、柔性化的教学运作机制,因材施教。同时,结合研究型大学承担科研项目多、科研成果层次和转化比例高得特点,为学生的创业素质培养提供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和爱国奉献精神的重要载体。

(二) 教学型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教学型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量大面广、层次多、类型多,是培养应用型创业人才的主要力量。它和研究型与服务型大学相比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办学层次上,以本科教育为主体;二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为主;三是在服务社会方面,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主。

教学型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应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在培养目标上,教学型大学要紧密自身的学科优势与办学特色,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培养大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业与创业型人才,防止盲目攀比现象的发生。教学型大学是培养中等创业与创业型人才的主力军。第二,在课程设置上,调整课程设置,淡化专业设置,增加创业教育的相关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注重通识教育,培养复合型的、实用性的创业与创业型人才。第三,在培养模式上,要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强化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心理与能力,提高学生创新、创业的可能性。

(三) 服务型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

服务型大学是目前我国高校数量最多,招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根据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要求,服务型大学要“以就业为导向,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实行多样、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服务型大学创业教育模式的构建应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在培养目标上,服务型大学应该以创业为主线,





以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为重点,以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素质塑造为基础,以学生主体性和个性潜能的实现为根本,通过全过程、多方位和多种形式的学习、实践和指导,使学生能够成为是相对比较专业、单一的操作性的人才。服务型大学是主要为社会培养最基本的创业与创业型人才的高校。第二,在课程设置上,要从未来社会每个人应得到的学术性、职业性和证明个人事业心与开拓技能的三本“教育护照”为基本结构,把课程划分为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创业教育特色课程四大板块,形成适应创业人才培养要求的新课程体系。特别是课程要紧紧围绕所学专业的成熟技术由点到面的放射。第三,在培养的方式上,一是依托专业实践基地,加强创业实践训练;二是通过对学生单向技术的传授与训练,使学生能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社会的创业与创业型人才。

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必须有自身的特色,包括特色教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管理模式、管理风格、教育教学组织运作形式、校园文化等等。只有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才能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朱先奇 来源:光明日报2008年4月10日

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精英人才培养规格研究

摘要: 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分类分层发展对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改革创新的要求。在梳理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借鉴国外大学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提出了精英人才的培养规格。

关键词: 大众化 精英人才 培养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已在2002年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2007年毛入学率达到23%,在校生数超过2300万,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施以优秀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精英教育与以满足社会经济多样化需求为目标的大众化教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

一、大众化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的分层化趋势

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看,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机构出现多样化、分层次的趋势。美国是典型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和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并存的成功国家,约占3%左右的研究型大学保持着精英高等教育模式,人才选拔标准很高,而约占50%以上是二年制的社区学院,承担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功能,中间层次的四年制院校则担负着硕士和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美国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规划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启示。面对二战后生育高峰引起的高等教育入学“浪潮”和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政府后对高等院校的期望,高等教育快速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转变,高等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加利福尼亚一些原先以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想要成为州立大学,有些社区学院想要成为4年制学院。大学面临着是继续成为博士学位和高层次专业训练以及基础研究的惟一提供者,还是继续负责本科生、特别是本科生低段的教学困境。以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为组长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规划,总体设想出一个分层次办学的计划,州立大学从招收15%的中学毕业生下降到12.5%,州立学院从招收50%的中学毕业生下降到33%。新的规划使州立大学的一部分优秀生源转移到州立学院,而州立学院把较多的学生让给社区学院。除此之外,建立起社区学院、州立学院和州立大学问的人才培养立交桥,即社区学院的优秀学生可以转学到州立学院或大学,州立大学则和州立学院之间建立了联合哲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从中不难发现,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不仅避免了各层次大学间的无序竞争与盲目升格,而且让州立学院主动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州立大学进行的精英人才培养职能。

潘懋元教授认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大众化高等教育必须包含一定数量的精英教育,两者朝不同的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规划中可以看出,精英人才培养与精英教育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层次大学精英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各不相同。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系列发展问题,教师资源匮乏比较严重,许多高校办学类型和层次不清,一些水平不高的地方院校盲目升格,一味追求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加,使研究生教育大众化。而在美国,即使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很少。2000年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公布的数字表明,美国博士授予单位只有261个,占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6.6%。而2002年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245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12.23%,远远高于美国。因此,随着高校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的“轴心”,在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层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如何培养出既能完成院校使命,又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英人才,是高校办学需要明了的问题。

二、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内涵

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是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不仅需要为其输送大量职业型、技能型人才,也需为其培养一批学术、经济、管理、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精英型人才。与传统精英人才培养相比,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有着其独特的内涵:其一,并非是指精英教育阶段少数人享有的教育,而是一种培养人才的高层次高标准教育,是质的规定性,而非量的要求;其二,它培养的并不是专指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性人才,而是指各类高校为社会培育出的政治、经济、管理、学术等各方面英才;其三,它并不简单等同于如研究生教育这样一个层次的教育,而是各个层次根据院校使命和社会需要对部分学有余力、有较佳天赋或潜力及浓厚兴趣的学生进行的因材施教、分层教育。可见,精英人才培养是一种以培养各阶层精英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大众化教育背景下高校进行分类、分层次培养人才的选择和趋势。它既符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也能体现出“以人为本、教育公平”的需要。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教育观念、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培养方式多层面有机结合的产物,涉及专业设置、课程设计、教学管理和质量控制等多个过程环节。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亦有其自身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规格、特点等。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研究型大学因其拥有较强的师资、较好的生源、优越的硬件设备、相对充足的经费等优势,始终担负着培养精英人才的使命。在我国现阶段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需要各层次、各类型大学来共同承担。一些地方综合型大学在师资、生源等条件上与研究型大学相比虽较为薄弱,但作为某一地区经济、教育、科技、社会等各领域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输出基地,及考虑学生需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等多种需要,改革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有选择、有重点地抓好精英人才培养工作,探索出一条符合院校发展的精英型人才培养路径势在必行。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先行探索为本科教育提供了发展思路,从国内一流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实践比较中可以归纳出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共性特征:(1)追求卓越,培养高质量、高素质人才是其培养目标的共同特征。国内知名高校的精英人才培养实践正是围绕这种理念所进行的课程体系,培养方式方法、手段,管理制度改革探索等一系列过程和活动。(2)逐渐重视通识教育。本着“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或“宽口径,厚基础”的指导思想,各校以学分制为核心,进行课程体系改革。一、二年级,为使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生按大类进行培养,以学习通识教育选修课和学科大类平台课为主;增加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要求和选择空间。(3)探索文理交融,理工渗透途径,增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类专业互选学分要求,推行转专业、主辅修制,培养复合型人才。(4)创新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多规格培养拔尖人才。(5)注重学生科研,设立大学生科研训练专项项目和基金。





(6) 实行本科生专业导师制。通过导师对学生个人专业学习、人生发展规划、科研能力的培养等予以指导。(7) 因材施教、分层教育。在整体精英教育基础上,设立专门的“精英班或学院”。

三、精英人才的培养规格

纵观国内外高校的精英人才培养,尽管有其培养目标、规格、特点和社会适应面的差异,但仍存在某些精英人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的共性特征。早在20世纪初叶,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就曾提出过,大学教育应培养社会的精英,他们应具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探究问题的兴趣、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推进各种具体事务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也曾指出,21世纪受过良好教育个体的特征是“理性、知识和智慧”,“应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理性的推理能力,懂得科学方法和其他探究方法,能利用获得的信息解决复杂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应具备与最优秀人类相适应的精神与品质;敏锐的判断力、良好的审美力、很强的适应性和自信心;还应有历史知识,理解人类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能将这些知识与判断力结合起来去认真细致地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同时还应有优秀的表达能力与交流能力”。哥伦比亚大学在目标中也列出教学对学生能力的三大考虑要素,即灵活的知识能力、社会能力、职业能力。精英人才可通过教育培养的素质和能力规格大致可归纳如下:

1. 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哈佛大学校长在北大百年校庆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演讲中指出,“大学要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特性,而且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重视通识教育,提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融合,富有集体精神、责任意识和相瓦宽容的能力,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是精英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

2. 宽厚的知识基础和较好的适应性。学校通过建立跨学科的综合型课程体系,如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牛津大学的复合专业,使学生知识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能够做到目光远大、视觉敏锐、灵活多变,有一定的分析、概括、归纳能力,也为后续人生较好地判断处理各种复杂事务、较好地适应社会,以及终身教育奠定基础。

3. 富有探索、合作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通过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与导师共同探索学术前沿领域,在自主学习与合理引导、合作交流中探究、创新,提高学生科研兴趣和热情,养成较好的组织和理解知识、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多角度看世界的能力,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才干。

4. 清晰思维,较好的协调、表达、沟通、思辨能力。“斯坦福导读”、“新生讨论课”、写作、外语等课程既密切师生关系,开阔学生视野,在合作性的环境中探究式学习,也锻炼学生言语表达、交流沟通的技巧,提高了自信、自我开放以及领导力。

5. 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通过国际交流,国际性课程的开设,让学生思想得到更多的激荡和碰撞,更具开放性与国际化。

总之,探索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人才培养,而是一种上至理念、观念的思想层面,下至运行实践的操作层面。如果说“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的精神质量来衡量,而不是他的寿命的长度”,那么大学的基业长青“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培养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精英人才必将继续成为高水平大学的追求。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吴向明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陈煜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08年第2期



思想政治
教育

湖南大学以生涯发展教育为主线 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为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湖南大学坚持以生涯发展教育为主线,围绕目标、贴近学生、全程覆盖、整体推进,着力构建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建立完善的心理测评—心理访谈—心理咨询—心理素质训练服务体系

为让学校每一位学生都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学校从2002年开始,连续六年对大一新生开展大规模心理健康测评,建立学生心理档案45000余份。根据测评结果,对测验指标明显偏离常规的学生,邀请心理咨询老师和精神科医生进行心理访谈,通过访谈判断学生是否存在心理困扰,并确定重点关注对象。与重点关注对象建立心理咨询关系,实施重点跟踪、重点辅导和重点干预,并及时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在新生心理普查的基础上,针对学生的普遍心理问题,学校开设了《大学生心理素质修养与训练》、《社会心理学》、《心理学与人生》等一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每学期还定期举办潜能开发、自信心培养、情绪控制、压力管理、挫折应对、人际关系、恋爱心理、心理疾病预防等主题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学校这种建立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基础上的心理咨询与辅导服务,作为“生涯发展教育”为主线的辅导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从新生入校开始,贯穿大学生活始终,注重各环节的完整衔接和有机结合,有利于掌握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学生缓解心理问题,化解心理困惑,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二、实施科学系统的“认识自我—规划自我—成就自我”大学生生涯规划辅导计划

学校自2002年起就开展了大学生生涯发展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形成了以“生涯发展教育”为主线,实施科学系统的认识自我—规划自我—成就自我的大学生生涯规划辅导体系。

新生一入校,学校就在全体新生中开展“我的大学生涯我做主”主题讲座,旨在引发大学生生涯责任自主意识,激发学习生活动力。为帮助大学生提高生涯规划和生涯决策能力,每学期还定期举办各种生涯规划专题讲座和论坛,邀请李开复、柳传志等知名人士来校为学生解答生涯困惑,指点生涯迷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涯规划观念。为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大学生合理规划大学生涯,学校编著了《特别礼物—大学生生涯规划与辅导》手册,发至每个新生手中,并制定了大一学生“生涯规划辅导计划”。学校率先在全省高校开设了《大学生生涯规划与发展》课程,从生涯意识、生涯探索、生涯规划、生涯准备、生涯管理等五个方面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系统的生涯辅导。

同时,为增强学生生涯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学校还建立了“导师制”和“生涯导航师”,健全了特聘、特邀、常任、专职四支“导师”队伍,随时对学生的问题开展咨询服务,对学生的生涯方案进行指导建议。



三、建立全覆盖、全程化发展性生涯辅导长效机制

学校根据学生素质提高和成才发展的需要,将“生涯发展教育”、“大学生素质拓展”、团体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分层次建立长效机制,实施全覆盖、全程化生涯辅导。

为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生涯规划的主体性,做到人人谈规划,个个有方案,实现生涯辅导全覆盖。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尝试推出团体辅导训练活动,实践证明,团体辅导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心理辅导,而且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活动。2005年湖南大学将团体辅导纳入到面向全体大一新生开设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课,使大学生“在团队中认知,在团队中成长”。2006年学校在2006级全体新生中开展了“生涯探索”班级团体辅导,提出了“没有规划的大学生涯是不值得过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做到生涯规划辅导四年不断线,学校每学期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举办不同专题的生涯辅导讲座,如针对大一学生的“如何规划我的大学生涯”,针对大二学生的“学业规划及学习心理辅导”,针对大三学生面临考研、就业、出国艰难选择的“三岔路口的抉择”,针对大四学生的“求职业前的准备”等。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和需要,分年级、分层次实施针对性生涯发展教育。具体方案为:一年级是专业认识、养成教育,侧重生涯剖析,心理素质普查;二年级是丰富自我、完善知识结构,侧重生涯设计,提高心理素质;三年级是强化实践、创新教育,侧重生涯诊断,优化心理素质;四年级是就业指导、职业导航教育,侧重生涯导航,心理素质实践。四个阶段互相贯通,有机结合,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发展性生涯辅导长效机制。

实践证明,学校以生涯发展教育为主线来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很好。生涯发展教育顺应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更加明晰、内容更加具体、方法更加丰富,切实解决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许多难点,具有很强的实效性。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08年4月18日

论高校创新型辅导员队伍建设机制的构建

摘要:高校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因此,加强高校创新型辅导员队伍建设,要从人才引进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等多方面着手,构建系统的建设机制,着重培养辅导员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使创新型辅导员不断涌现。

关键词:创新型 辅导员 机制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要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高校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而在此过程中,作为与大学生朝夕相处的辅导员,他们的地位尤为特殊,作用尤为重要。

一、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型辅导员人才引进机制





1. 引进不同类型高校学生担任辅导员, 优化学缘结构。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 都有自己独特的育人理念和环境, 他们的学生风格也就不尽相同, 但都有自己独到的一面。因此, 在引进人才时, 要避免“近亲繁殖”, 有意识地引进不同高校、不同地方的学生来做辅导员, 形成文、理、工优势互补的良好组合。

2. 构建辅导员梯队。随着近几年高校的大规模扩张, 辅导员队伍有年轻化的趋向。这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 然而, 辅导员过于年轻化, 生活阅历浅, 工作经验缺乏, 在处理学生问题时工作方法就容易简单化, 同时, 大学生们也往往对这些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辅导员表现出信心不足, 有些大学生认为, “辅导员可以作朋友, 不能当导师, 但我们缺的是导师, 不只是朋友。”“从年龄结构看, 青年人朝气蓬勃, 富有创造热情, 但由于他们从学校步入社会实践的时间较短, 故缺乏一定的经验, 遇事常欠深思熟虑, 中年人各方面已成熟, 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能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但对事物的敏感性和探索精神不如青年人。老年人久经考验, 遇事深谋远虑, 但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偏于保守和谨慎。因此, 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特点, 按一定比例合理配置人员结构, 工作开展就会十分协调。”因此, 在引进辅导员时, 要有层次意识, 注意构建梯队, 可以考虑聘请专家做辅导员顾问或从事专职辅导员工作, 使得年轻型辅导员和经验型辅导员相结合, 从而形成创新的合力。

3. 创新考核办法。通常辅导员的引进都有笔试和面试两种形式, 要建设创新型辅导员队伍, 必须注意考核的针对性, 打破通常的考核办法。除了一般的基本考核外, 更要注重对其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考核, 可以考虑在笔试和面试的基础上使用情景模拟考核法, 即设置一定的场景, 在特定的场景中考察应聘者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4. 适度扩大辅导员规模。从现状来看, 大多数高校都存在辅导员不足问题。辅导员也大多是忙于各种日常事务, 没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就难以深入思考问题, 也就谈不上创新。《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 “高等学校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科学合理地配备足够数量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专职辅导员总体上按 1:200 的比例配备, 保证每个院(系)的每个年级都有一定数量的专职辅导员。”然而, 很多高校并没有配备到位, 从实际情况来看, 要想培养创新型辅导员, 至少达到教育部 1:200 的比例。

二、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型辅导员培训机制

创新型辅导员队伍重在培养和建设, 应建立系统的高校创新型辅导员培训机制, 着重对其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方面建立健全岗前基础理论培训机制。只有拥有宽厚知识的积累, 才能及时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形成创新的理念, 依据创新的思想 and 理论正确处理问题。辅导员的来源较为广泛, 所学专业也不尽相同。各高校新招录的辅导员大多未经专业培训即匆忙上岗, 缺乏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专业素质。某些高校为了扩招或是应付检查、评估等, 大批量引进辅导员, 致使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很难保证。同时, 人们对于辅导员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误区, 认为辅导员只是做些学生日常管理工作, 很简单, 很容易, 谁都能做。事实并非如此, 辅导员承担着重要的育人职责, 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拓展、职业规划、心理疏导、就业、创业、创新指导等多方面的教育。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来做支撑, 因此, 必须对辅导员进行岗前培训, 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课程, 这种培训有别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教师资格培训, 具有辅导员工作的具体针对性。有可能的话, 可以考虑设立辅导员资格认证机制, 对培训合格的辅导员发放资格证书, 资格证书可以分等级, 这是辅导员走向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训机制。首先是创新精神的培养。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创新精神品质的内核可归结为求真、质疑和立新三个有机联系的层面。要在培训中,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工作和学习实践,科学阐述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思维要求我们:要打破思维定势、思维惯性和思维封闭。因此,要采取多向思维法。在培训过程中可以尝试专业的创新思维锻炼。要了解头脑思维的模式,学习创新原理,学会如何打破原有思维的框架和束缚,学习激发创新思维、运用创新思维、训练创新思维的方法,学会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三、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型辅导员的激励机制

如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人才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是对辅导员评价仍带有传统的固定思维定势。一是对辅导员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满足于“不出问题就是成绩”,而不看其工作是否有创造性;二是要求辅导员高学历,忽视对其创造性解决学生思想工作中新问题的实际能力的考察;三是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只是传统理论灌输和课堂传授,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面临新问题、新形势、新情况的创新性要求。因此,必须转变观念,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型辅导员激励机制,为培养更多的创新型辅导员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学校应高度重视创新型辅导员队伍建设。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是高校的重要工作内容,历来为各高校党委所重视,并形成了高校上下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局面,扩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调动了辅导员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也有高校对辅导员队伍建设认识还不到位,没有足够重视辅导员的作用,对辅导员队伍建设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培训、奖励、晋升、管理等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安排。如果辅导员的工作得不到重视和认可,其积极性就难以发挥,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建立和完善创新型辅导员的物质激励制度。要提高辅导员的社会地位和调动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就要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与提高辅导员物质待遇结合起来。既要提高辅导员的收入水平,使其与同期毕业的教师相当,又要切实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遇到的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双肩挑”的辅导员,其辅导员工作量也要与教学工作量同等对待。同时,要积极鼓励创新,包括工作方法的创新、工作内容的创新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对创新突出者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再次,建立和完善创新型辅导员的精神激励制度。全校上下要形成积极创新的良好氛围和导向,对于表现突出的辅导员,不仅要在物质上进行奖励,还应辅之以精神激励。具体来讲,对于创新型辅导员的典型,可以通过橱窗、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对其事迹或创新工作方法进行宣传,号召大家向其学习。同时,对于综合素质较高的创新型辅导员在选拔、培养、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或破格提拔等,以强化激励效果。

此外,理顺科研、实践和创新的关系,鼓励科研和实践。科研能力、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可能有所发现和创新。只有具有较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科研方面才可能有所突破和发展;而只有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才能真正提高创新能力,也才是真正的创新,实践是创新的源泉。因此,应鼓励辅导员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科研,切实提高研究问题能力;鼓励辅导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切实提高实践能力。

作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吴绵超 来源:《江苏高教》2008 年第 2 期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命题

——哈佛大学的经验及其启示

摘要：哈佛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主要是得益于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探析哈佛大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实践，将对我们有些许启示，比如，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构建“指导性教授与主动性学习”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重在启迪智慧，引领探究；使学生学会学习；为学生的发展营造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

关键词：哈佛大学 自主学习能力 教学质量 启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出现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提高教学质量也就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主要的任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要求精英教育并存的背景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命题理应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外在要求以及高校学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哈佛大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实践是基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分析其实践，借鉴其经验，可以为提高我国高校教学质量提供些许启示。

一、哈佛大学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哈佛人认为，只有学习才能读懂《圣经》，才能领会“真理”。同时认为，仅仅通过死记硬背是无法真正理解和体会宗教信仰的，他们强调要用一种积极的、双向的思维方式来领会《圣经》的圣意。这就无形中培养了受教育者自主学习、积极思考的习惯。正如1650年哈佛学院“特许状”所规定的宗旨所言，“哈佛致力于克服各种限制，使学生全面参与，以探索能力、发展兴趣、开发智力潜力，哈佛的教育应该使得学生自由探索、创造、挑战、领导，学院提供给学生的是一种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生要自我依靠，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

（一）教学理念：注重独立思想的培养

教学理念是教学活动的先导，对整个教学过程起着导向、调节、监督等作用。哈佛大学的教学理念在于注重大学生自觉精神的培养，积极倡导独立思想。独立思想是哈佛大学的第一教育原则。100多年前，哈佛毕业生、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就培植自主及独立思想的苗床而言，除了哈佛大学，无出其右者。哈佛的环境不只允许、而且鼓励人们从自己的特立独行中寻求乐趣。相反地，如果有朝一日哈佛想把他的孩子塑造成单一固定的性格，那将就是哈佛的末日。”哈佛大学至今仍然严格恪守着这一原则，学生一入校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这样的话：“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发财的。你们到这来，为的是思考、并学会思考！”这种独立思想也体现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绝非等级关系。在课堂上，教师的讲授主要是提供思考的线索和参照，基本不提供答案，即使有答案也不惟一。教师视自己为引导者、推动者和共同思考者，与学生平等地讨论。哈佛大学的教师们早已习



惯了学生尖锐直率的质疑和批判,他们最喜欢的、也是得分最高的都是那些敢于并有能力挑战教师的学生。此外,这种独立思想还表现在对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高度重视上。抄袭、剽窃、改头换面的做法,是哈佛大学教学、研究和学习的大忌。学生们所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不是因迟到旷课、夜不归宿或者打架斗殴、损坏公物,而是学习上的剽窃等行为。这些都使学生们形成了非常严谨的学风,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教学模式:使学生主体参与

哈佛大学打破了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非听即记的教学模式,教师提前布置课堂讨论题目,并在课堂教学中起着提示和引导作用。课堂教学有赖于学生的参与,教学过程中不重视是否得出正确答案,而是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哈佛有一套严格的评分办法,在学生成绩中,课堂发言占总分的25%~50%,因此,为了争得发言机会,学生们往往唇枪舌剑,竞争激烈。而发言的质量如何,与学生课外所作的准备是否充分有关,参与的质量将决定着学生考试分数的高低。这种学习环境和氛围可以抓住学生的整个身心,在教师和学生一起投入大量精力讨论争辩的过程中,为能取得好成绩,学生必须发挥主动性,发掘潜能,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时,甚至在缺少足够和必要信息的情况下,培养自己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哈佛重视培养学生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去寻找更好的解决答案,而不单单重视结果。这种重视过程不重视结果的教学方法,能够鼓励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自己,增强自信,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哈佛大学经常把学生置于实践环境中,使他们用他们以往学过的理论及积累的经验,回答和解决他们不知道或不熟悉的问题,迫使他们不断挑战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极限,最后经过总结,获得宝贵的知识和亲身体验,并形成一种面向实战的思维定势。哈佛人认为,处理问题并不存在惟一最好的方式,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风格才是真正关键所在,预见力的高低是区分一个人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实战模拟法、案例分析法以及在课堂中的敏捷性分析都是哈佛在培养学生判断力上的努力。所以,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指出:“在大学,最明显的需要是停止对传授固定知识的强调,转而强调培养学生不断获取知识和理解知识的能力。这个转变意味着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方法,强调论述和演讲以及掌握基本语言的方法,掌握这些方法是获得大量知识的途径。”

(三) 教学方法:独具特色的案例教学

哈佛大学在教学中注重实践,其案例教学独具特色。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师引导与学生参与相结合的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形象化的教学方法,它提倡“亲验式”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在逼真的模拟情景中感悟与从事实践。其中案例指情况、事例及根据事实作出的客观描述,案例宛若一篇篇故事,有人物、有情节,也有细节,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与具体问题。学生通过案例教学可以巧妙地变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哈佛大学有5万个案例供教学科研使用。案例教学重在研讨,妙在“引发思索,集思广益”,巧在学生现身说法,亲历现场,进入角色,简便易行又能持之以恒。正是这种课堂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师生尤其是每个学生的积极性的教学方法,确保了从哈佛毕业的所有“金子”都能发光。比如,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学生仿佛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和力量,许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濒临破产的企业经他们接手后,便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并呈现出巨大的活力。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不仅是培养富有分析研究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才干的一条重要渠道,也是开放办学、研究实践教学的有效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更新。它的实质是一种创造性的教学实践。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新的课堂教学结构,不以课堂的活跃为满足,而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把案例教学看成课堂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结合点。

(四) 学习环境:营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



哈佛大学实行寄宿制和导师制,这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空间。寄宿制和导师制是学习英国剑桥大学的结果,但也有所发展,其目的是使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增加交流,发挥其重要的教育作用。哈佛大学每所宿舍都设立舍监,通常由一名教授担任,舍监全家都住在宿舍内,负责监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每所宿舍都设有餐厅、图书馆、活动室、文化娱乐场所和几间教室,各宿舍组织自己的学习和社会活动,这样宿舍就成了学生生活的基本单元和学习的重要场所。哈佛大学实行寄宿制度,目的是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的人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不同班级、不同类型和不同协会的本科生与导师们在同一个社区里生活,在同一个餐厅里就餐,全新的接触、惬意的交谈、深厚的友谊就会建立起来……提供了不同年龄本科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导师之间文化交流的机会,因而增强了对学术问题的兴趣,补充并强化了正式教育。”同时实行导师制,在哈佛,导师是一种工作,不是职务和职称,担任导师的不但有年轻教师、研究生,也有资深教授。导师的职责主要是在其专业领域以谈话和辅导的方式进行非正式教学,在学生学业上进行指导,这样就减少了学生正式上课的时间,增加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时间。同时,导师与学生的非正式接触将潜移默化地将学习态度、价值观、生活目标以及哈佛文化、精神等传递给每一代学子。“导师制不仅使哈佛的导师们树立起了更好的培养有抱负的学者的信念,也使学生们对学习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成绩,每个毕业班大约有40%的学生在专业领域获得了荣誉学位。”

二、对我国高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启示

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因素的制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学质量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借鉴哈佛大学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经验,我国高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应当牢固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育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教育的价值关系是以尊重人的自身价值为主体的价值关系,离开了对人的尊重,离开了对人的潜能的挖掘和人格的陶冶,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人始终应该是目的,以人为中心,高扬人的主体性,以个性塑造为目的的教育也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以人为基础的学习正成为21世纪国际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其主旨是尊重人的需要,弘扬人的个性,考虑人的兴趣特征,一切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高校的“本”应该是学生,培养学生是高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无论高校的功能如何扩展,也不管高校怎样改革,培养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始终是高校的根本任务。而社会衡量和评价一所大学优劣的基本标准,亦主要是看其所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以及人才现实的创造力与潜在的发展力。

(二) 构建“指导性教授与主动性学习”的教学模式



目前,我国高校教学还主要是教师传授、学生接受的“授—受”教学模式。显然,这种教学模式已远远不适应于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以及学生发展的内在需求。构建指导性教与主动性学的教学模式,充分发挥教师在教的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学生在学的过程中的主动性,也就成为高等学校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哈佛大学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学习思想的变化形成了一条稳定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如果允许我们做一个粗略简化的话,哈佛大学的教学从以知识



‘传授’ (transmission) 为基础, 转变为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我教育’ (self-education)。虽然这是一个简化, 但是它却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所谓“指导性教授与主动性学习”教学模式, 是指为实现教学目标和任务, 教师按照明确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唤醒学生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 引导组织学生进行主动性学习, 使之占有、掌握学习材料和内容, 并形成知识, 发展能力, 培养个性。在“指导性教授”的过程中, 教师的主导地位是确定无疑的, 离开了教师的指导作用, “指导性教授”将不复存在。但是指导性教授必须引发学生的主动性学习过程, 必须作用于学生的主动性学习并受制于主动性学习的特点和规律。在指导性教授过程中, 教师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表现、发挥, 是以引发和促进学生进行主动性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前提的。在这里, 教师的作用十分鲜明地体现在是否启发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教育的机制上, 是否成功地唤醒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热情, 是否挖掘出了每个学生的潜能, 是否有效地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了自主学习活动, 是否能给学生的主动性学习以恰到好处的指导。“指导性教授”是根据主动性学习的特点来进行, 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及活动方式、学习方式等因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 不是让学生去选择符合、迎合教师教授方法的学习方法, 而是选择符合学生主动性学习特点和要求的教学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教师迁就学生的行为, 恰恰相反, 它表明教师真正领会了教师主体、主导地位作用的真谛, 恰到好处、游刃有余地运用了教学规律和原理, 并使之不露痕迹地切合主动性学习的特点和要求, 达到了教学机智和教学艺术的较高境界。

(三) 改进教学方法, 重在启迪智慧, 引领探究

教学方法的改进首先是教学方法指导思想的改进, 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过程中应切实注重启发式教学, 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探究能力。“哈佛大学曾经持有这样一种观点, 一所优秀大学是一个社会中单一 (single) 和特有 (unique) 的学校。在特许状中明确地规定, 它的使命是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 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 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 这样他们将会终其一生而不断地追求学问, 领导社会向前发展。”高校教师面对的是思维活跃、有积极进取心的学生, 这些学生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 作为教师不应当再是系统知识的灌输者, 而是新视角的提出者、新问题的发现者、新思维的探索者。它可能是片面的、不成熟的, 甚至是偏执的, 但正是这些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才是真正鲜活的, 有生命力的, 某种意义上比那些固有的结论更加重要。教师的职责主要是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形成独特的思维, 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 大学课堂的关键是培养反省、批判、怀疑、提问、探索的能力, 与学生实现知识与知识、情感与情感的互动, 共同构建学习共同体。目前我国高校运用较多的教学方法还是讲授法, 固然, 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 但是, 面对大学生特别是处在信息化时代的大学生, 更多地应当本着发挥学生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教学目的, 考虑讨论法、实验法、实践锻炼法、案例教学法等在教学中的运用。

教学方法的改进亦是教师角色转变的过程: 由实践者转化为研究者、引导者。教师由实践者转化为研究者是指教师要做一个研究者, 使自己不再是“匠才”, 而是要成为“将才”甚至“帅才”。教师不再系统地阐述和讲解教材内容, 而是精心组织和再现教学情境, 指导学生进行感受和体验, 形成主动性学习的动机, 帮助学生习得知识、形成能力, 指导和帮助学生发现、处理、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教师要经常地对自己的行为积极反思、研究, 将指导行为与自身的研究融为一体, 逐步实现预定的教学目标。“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 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 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 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 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 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

(四) 使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学习是学习型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哈佛大学的理念认为：“让学生做一个更灵活、更有适应性、更聪明的人，聪明不只是具有好的分数，而是指学生能够看到机会，创造性地来组合、运用知识。”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等为特征的学习型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最大的职业流动性。为人们投入工作和实际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其目的应该较多地注意到把青年人培养成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岗位，不断地发展能力使他能紧跟不断改进的生产方法和工作条件，而较少训练他专门从事某一项手艺或某一种专业实践。这种教育应该帮助青年人在谋求职业时有最适度的流动性，便于他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或从一个职业的一部分转换到另一部分。为适应学习型社会的这一特征，应该使教育朝向关照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每个个体终身成长的方向发展，朝向学习的转换。“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学习正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每一个人……都应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人们为生存下去，为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为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为充分参与发展，为改变自己的生活质量，为做出有见识的决策，为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基本学习手段……和基本学习内容。”

学会学习是 21 世纪大学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大学生学习素质的集中体现。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波依尔博士认为，要适应 21 世纪的学习，教育思想必须实现 5 个转变：从强调教育的统一性转变为强调创造性和革新精神；从强调培养竞争转变为重点培养竞争与合作；从强调民族的狭隘观念和忠诚转变为强调民族与全球结合的观念和忠诚；从把知识分割过细、缺乏联系转变为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和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强调为个人私利而学习转变为强调为公众利益而学习，并强调个人发展，培养自尊和自信。学会学习理应包括学会自我学习，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会有效学习，形成自己的学习风格；学会探究学习，培养创造能力；学会合作学习，构建学习共同体。

（五）为学生的发展营造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

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形成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形成一个和谐的教育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师生会产生许多正向的互动作用，有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哈佛学生有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学习之外的空余时间也很多，所以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本科生到底学到东西了没有？自由也是祸福参半、毁誉参半的事情。1910 年的哈佛校长就被问到：‘你为什么觉得哈佛学生能学到很多东西呢？’他幽默地回答：‘哈佛之所以是一个优秀的学府，是因为新生进来的时候头脑里空空如也，大学毕业离开时又什么也没有带走，所以哈佛的知识越积越多。’”营造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首先要求教师把自己外在的权威转化成内在的权威，即去除外表的威严，注重塑造以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师德为核心的内在的具有亲和力的人格形象。其次应建立一种资源分享的伙伴性师生关系。当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时，不是自上而下的“给予”，而是与学生一道去探索，在主观上“分享”他们尚未获得的经验与知识。再次，教师应当尊重学生，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当然，尊重学生并不是对学生迁就，而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为前提。

作者：临沂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郭峰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